

第三卷第二期(三十年六月出版)

中
德
學
誌

沈
秉
士



中 德 學 誌

北 平 中 德 學 會 出 版

中 德 學 誌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輯 委 員

福 克 司

| | | |
|-------|-------|-------|
| 曾 一 新 | 方 志 澍 | 傅 吾 康 |
| 顧 華 | 楊 丙 辰 | 楊 宗 翰 |

中 德 學 誌

第三卷

民國三十年六月

第二期

論著

- 石太因.....狄懷特著 曹京實譯 169—233
- 石太因男爵略傳.....史得恩著 楊丙辰譯 234—261
- 政治論(德漢對照).....石太因著 關琪桐譯 262—277
- 處世箴言(續一：第三章).....叔本華著 關琪桐譯 278—393

“研究與進步”

- 大城市的問題.....海爾巴哈著 胡雋吟譯 294—300
- 法律學的現狀.....希培爾著 曾一新譯 301—306
- 世界人口增減問題.....步德菲著 金舞侯譯 307—309
- 五十年來之汽車.....麻綽著 董遂曾譯 310—312
- 德國學術協進會.....曹京實譯 313—318

特載

- 德國之勞作服役.....艾戴爾著 曹京實譯 319—335

書評與介紹

- 評“分類字彙”.....顧華評 336—338
- 評“明清畫家印鑑”.....羅越評 胡雋吟譯 339—341
- 評“德國詩中所表現的中國”.....霍福民評 胡雋吟譯 342—343

- 德國學術消息..... 344—345

- 會務報告..... 346—347

石 太 因

Stein

狄懷特 (Andrew Dickson White) 著

曹 京 實 譯

——編者案：本文與下一篇楊丙辰先生所譯之石太因男爵略傳並不雷同。此篇所注意之點為石太因如何的去抵抗拿破崙之侵略，解放農奴，改革內政，及在政治學上對於市政組織之貢獻等等。而石太因男爵略傳則對石氏之身世及與維也納會議的關係敘述較多。其他細節如石太因的信為拿破崙所得，在本文一語即過，而在下文便詳述其經過。為使石氏之整個面目得以充分表出，故從兩個角度攝照，如此，或者可使讀者對此偉大人物得到一個立體的形像了。

譯 者 序 言

戰勝黑暗，爭求光明，像似人類自不可考的遠古以來一個最高的努力目標。然光明雖不斷的實現而黑暗却也從未絕踪；兩方鬥爭，火花迸起，歷史乃絢麗堂皇的穿着鮮豔的血衣，無止無休的，在時光之輪上擺來擺去。

石太因便是這其間一位令人可歌可泣的鬥士；不，他不僅是鬥士，他是哲人；不，他不僅是哲人，他是人類當中曾真實存在過的吉訶德。拿破崙攻下了柏林，將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er Tor) 上表示凱旋的四輪兵車，及那帶翅膀的勝利之神的銅像搶走，送回巴黎；書商柏爾穆 (Palm) 因有一本愛國的小冊子，竟被拿破崙捉捕處以極刑。試想德國在彼時是遭受了何等的侵略與壓迫？

就在這個時機產生了石太因。

可是他是如何的去應付這個空前的危難呢？

國家，是十分的貧困；人民，是很缺乏愛國心（當法軍打敗普魯士，拿破崙

入柏林時，普人列街旁且爲拿氏喝彩)；法國軍力過於強盛；拿破崙手段非常毒辣；一般顯宦，王爵，爭向拿氏歸順，希得官職。而當此際，是石太因，他，看準問題，立定決心，以人類罕見之剛毅精神，排萬難，急建設，卒救德國於危亡。是石太因，他，以特有之遠大眼光，悲天憫人之宏大同情，解放農奴，化除階級，使極端專制之德國逐漸趨向民主。其功固未全竟，而其志則遠非一般之政治家所能及。筆者譯此文時，心怦然動，不僅敬石氏之爲人，且亦深感著者狄懷特氏對吾人啓示之良多也。

狄懷特 (Andrew Dickson White) (一八三二——一九一八) 爲美國教育家及外交家。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七日生於紐約州之荷默爾 (Homer)。一八五三年畢業於耶耳 (Yale) 大學。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在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爲美國公使館的參贊。一八五五——五六曾就讀於柏林大學。一八五七——六三曾爲美國密其干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之歷史及英國文學教授，後於一八六三——六七又在該校專授歷史。

他曾夢想要獨出心裁的建立一個大學。這個大學要具有以下各特點：(一)，延攬所有的各種學科之教授，使該校對於一切學問均加研究；(二)，有豐富的圖書館博物館及壯麗的樓房；(三)，不受任何黨派及宗教派別之支配；(四)，男女學生兼收。後來受到康乃爾 (Ezra Cornell) 等人之幫助，他所夢想的大學果然在綺色佳 (Ithaca) (紐約) 成立了。他曾爲現在的康乃爾大學 的第一任校長，曾將全副精力及大部金錢用在該校。

他曾代表美國參加去三多明各共和國 (Santo Domingo 在北美州之海地島「Haiti」，是黑人國家，爲美國之保護國) 之委員會，又曾出席委內綏拉邊界委員會 (Venezuela 爲南美州之一國)。於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代表國家去德國，於一八九二——一八九四去俄國。後於一八九七——一九〇三年爲美國駐德大使。於一八九九曾爲美國代表團團長出席海牙和平會議 (Hague Peace Conference)。

在德國耶拿 (Jena) 大學他曾得過博士學位，也曾爲普魯士王廷學術研究院——即今之普魯士學術研究院——之會員。

他的最著名的著作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一八九六) 及 Seven Great Statesmen in the Warfare of Humanity with Unreason (一九一〇)。本文即係其第二部書中之一篇。

著者曾在德國讀書，在德國作過外交官，曾參與德國著名學術機關，又係研究歷史之學者，故對德國之國難表出無限之同情，對石太因內政之改革能具與衆不同之透視眼光。研究石太因之著作甚多，此文雖簡，然可謂得其神髓者焉。

一九四一，一月，燈下。

正 文

在歷史上，有許多事件顯出專制政治固有的弱點，但在近世，沒有比普魯士的受辱及老德意志帝國受拿破崙的摧殘更明顯動人的了。

菲得利大王 (Friedrich der Grosse)^(一) 曾取得了他父親的軍隊 (除去「高大的禁衛軍團」而外全都得到)，他父親的寶藏，他父親的行政原則，——他以天賦的奇才發展並利用所有這些東西；但是在他的整個的事業中恰恰祇有一位得到充分發展的人——他自己。那是他，想出問題，立下計劃，推動工作，阻挫反對者；並且雖然難免也有他的種種錯誤及悖理可笑之處，但是對於所有這些事他均以其天才去作。

在他的指揮之下，貴族齊向死亡 (指戰爭——譯者) 或榮譽奔馳；中產階級製造工業品及經營商業以充實他的寶庫；農民捨業忘身爲他服兵役或作他的待遇薄而工作苦的農奴。個人分文不值，國家高於一切。

(一) 譯者注：菲得利大王 (一七四〇——一七八六) 即菲得利第二，爲菲得利·維廉第一之子，菲得利·維廉大選帝侯之重孫。他曾使普魯士國威遠揚，成爲歐洲一等強國。

軍官，大吏，僧侶，學者，都站在人民的上層。在大選帝侯(二)及比他更偉大的孫子(三)的時候，對於責任，榮譽，紀律的觀念都是很嚴厲的。現在的軍官們承襲了那種嚴厲觀念，但是其原來的制度及訓練却已殘缺不全了。在十八世紀的末年及十九世紀的初年之間，這些人們曾『什麼都沒學到，什麼都沒忘掉』。他們之中，有價值者甚多，可敬佩者不少，但可用之以處理大事者則寥寥無幾。他們的創新，指導，負責任的能力，漸漸的被不推根究底的一味的服從給代替了。在僧侶之中也有些出類拔萃的人物，然而就一般而論，他們多因自路德 (Luther) 死後所開始的新教徒之嚴守教義及其偏執頑迷不容異說而變成爲愚昧，懶滯，呆板了。近代的偉大的德國思想家們固然早就在工作着，並且是很有力的；但是似乎他們尙未能充分的把握住德意志人的心靈及其衷情：康德 (Kant)與釋勒 (Schiller)已經開始預示時代的消息，不過他們的整個的力量尙未顯露出來。

中世紀的混合物：會社，行會，及多多少少具有特權的階級，在市鎮中仍然存在着；但是牠們却早已失掉了那個具獨立性的老條頓精神。

在專制政治及各式各樣的中間階層的下面又存在着一個最低最大的階層——佔全人口三分之二，實際上是包括全體農民，仍然受着中世紀式的橫征勒索與縛束——並且，在這些農民之中有一大羣農奴。

甚至就是當於菲得利大王在世的時候，關於歐洲的困亂已經現出種種警告，法國哲學家們已經起始了他們的工作。佛祿泰爾 (Voltaire)已經在思想的潮流之中加入一種一定將要帶來大風暴的動力；盧梭 (Rousseau)已經散佈了對於專制政治極爲危險的新權利思想，不僅僅限於法蘭西而且普遍於其他各國；然而菲得利指引其國家之舟直向前駛，對於這些思想並不顧及——並且，實實在在的有時

(二)譯者注：即菲得利·維廉 (Friedrich Wilhelm) (一六四〇——一六八八)，爲普魯士之英主。於三十年戰爭期間他將普魯軍隊練得很強。

(三)譯者注：即菲得利·維廉第一 (一七一三——一七四〇)，他將普魯士造成一個完全的軍國。

還利用牠們。

但是在一七八六年他死了，而時代的情形却需要他的繼承人必須與他一樣的偉大，或者比他更偉大才行。使舊國家適合新的觀念，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偉大的統治者，而是要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一位僅次於奇蹟的天才；而在這樣的千載一時之際，菲得利大王的後繼人竟是菲得利·維廉第二(Friedrich Wilhelm II.)。

他是霍亨索倫族系(Hohenzollern)中最沒有價值的一位。從此之後專制政治的致命的缺點就顯露了——這種政體所需要的是：皇位之上永遠不間斷的要有天才的人們在接續着。但是這樣的接續，以往從未曾見過，將來也永遠不能見到。一般的看來，都是在一位菲得利大王之後緊跟着就來一位菲得利·維廉第二，在一位卡爾大帝(Karl der Grosse)(四)之後就來一位卡爾胖子(Karl der Dicke)(五)；在一位卡爾第五(Karl V)(六)之後就有位非利浦第二(Philip II)(七)；一位伊麗薩白(Elizabeth)(八)之後就來一串司徒鐸爾朝各王(a Line of Stuarts)

(四)譯者註：卡爾大帝 Karl der Grosse 即 Charlemagne，我國一般歷史書均譯為查理曼。

其父曾由法蘭克貴族大會選為國王，統一法蘭西——日爾曼。查理曼後繼父位，其在位期間為自七六八到八一四年。於八〇〇年之聖誕日由教皇在聖彼得教堂加冕為羅馬帝國皇帝。

(五)編者註：卡爾胖子(八七六——八八七)即卡爾第三，德國羅馬帝國皇帝。此處與原文稍有不同，原文稱菲得利·維廉為菲得利·維廉胖子，稱卡爾第三為卡爾笨伯；茲以維廉胖子在德國不為一般人所週知，而德國人却均知卡爾胖子，故稍加改換。

(六)譯者註：卡爾第五(一五〇〇——一五五八)為西班牙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於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加冕。後退位為僧。

(七)譯者註：非利浦第二(一五五六——一五九八)，為卡爾第五之子。卡爾第五退位將西班牙與尼德蘭傳與他。他努力保護舊教，其「無畏艦隊」為英國所敗，與尼德蘭戰也大失敗。——尼德蘭包括現的荷蘭和比利時兩國。

(八)譯者註：英國女王，在位期間為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她曾使英國國勢極盛，打敗西班牙「無畏艦隊」，崇尚文學，整理幣制，提倡工商業，為英國著名的英主。

(九)；在一位亨利第四(Henri IV)(一〇)之後就有位路易十三(Louis XIII)(一一)；在一位拿破崙第一之後就有位拿破崙第三；約賽夫第二(Joseph II)(一二)之後就有位法朗士第一(Franz I)(一三)；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sse)(一四)之後就有一位亞力克斯(Alexis)(一五)；在凱撒琳(Catherina)(一六)之後就來一位保羅(Paul)(一七)；尼古拉斯第一(Nicholaus I)(一八)之後就來一位尼古拉斯第二(Nicholaus II)(一九)。

(九)譯者註：司徒鐸爾朝第一個君王是詹姆斯第一(James I)(一六〇三——一六二五)，奢侈浪費，常因向國會要錢而吵鬧。至其子查理第一(Charles I)(一六二五——一六四九)時，情況愈劣，乃發生革命。後被當時所謂的賢尼會議(Rump Parliament)宣佈他為叛逆，於一六四九年正月三十一日被處死刑。英國乃成共和國達十一年之久——克命威爾(Oliver Cromwell)為此時期之執政。(有篇關於克命威爾之譯文發表在本雜誌二卷一期，一二六到一三〇頁，可參閱)。

(一〇)譯者註：亨利第四為法國國王(一五五三——一六一〇)於一五八九年即王位，當年即結束內戰，給呼羅恩諾特教派(Hugenotten)以信教自由權，並獎勵工商業及開拓殖民地。

(一一)譯者註：路易十三法國國王，在位期間為一六〇一——一六四三。

(一二)譯者註：約賽夫第二(一七四一——一七九〇)羅馬帝國皇帝，奧國國王。一七六五即位。其母為奧國女王馬利亞·德利撒(Maria Theresia)。

(一三)譯者註：法郎士第一(一八〇四——一八三五)為奧國的皇帝。

(一四)譯者註：彼得大帝(一六八二——一七二五)俄國皇帝，其政績為提高君權，歐化俄國，求海口，設學校……。

(一五)譯者註：亞力克斯(一六九〇——一七一八)，彼得大帝之子，懦弱無能，不為其父所喜。

(一六)譯者註：即凱撒琳第二(一七二九——一七九六)，俄國女皇帝，於一七六二年即帝位。打敗土耳其，瓜分波蘭。

(一七)譯者註：即保羅第一(一七五四——一八〇一)，為俄國皇帝。有瘋皇之稱。為凱撒琳第二之子。

(一八)譯者註：尼古拉斯第一(一七九六——一八五五)，俄國皇帝，為保羅第一之第八子。

(一九)譯者註：尼古拉斯第二(一八六八——一九一八)俄國之沙皇。他行加冕禮時因官吏之不小心，擠壓而死之人民達三千人之多。極無能力。

這位新普魯士國王，就其本質來看，很像法國的路易十五——或者是一位心腸較好的人，但是，以國王而論，無德無能之字樣尚不足以形容其愚劣。在這兩位君王的早年，都得過『很受愛戴』的頭銜；這位法國國王被稱為“Le Bien-Aimé”，這位普魯士國王被稱為“Der Viel-Geliebte”。這兩個人均有好的性情；均懶洋洋的願望他們的臣民能度好的生活；均堅信他們的臣民為他們而存在而非他們為其臣民；均是不可救藥的荒淫，並且同時又均是過度的篤信正教；結果均是因為與女人及與僧侶的消遣歲月而得到悲哀；每個人均是很急於去拯救他的靈魂，但同時却又貪婪的滿足肉體之樂——他們也急於去拯救他的人民的靈魂然而每人都是天生來的懼怕新哲學，並且又均以無效的方法去阻撓牠。

現在普魯士，其實是整個的德國，很快的腐化起來。使德國走向分崩的影響力之中有兩個是最有效力，這兩個力量大部都是由法國來的：一個是屬於舊法蘭西的腐敗影響，一個是屬於新法蘭西的自由影響。這就如同去分解花崗石先烘之以火次澆之以水似的。

在普魯士的歷史上，祇有現在這一時期是做着路易十五的樣子，大部分受着妓女們及嬖人們的影響。在七十年前，菲得利第一曾經顯出一些趨勢要學布爾邦的方法 (Bourbon methods)，但他由他的父親大選帝侯所遺傳來的良知阻止了這些方法得佔優勢；菲得利·維廉第一用野蠻手段排斥了這些方法；而菲得利大王則用常識；並且，設而這二人中有一位如作下惡事，他並不將這些惡事在他的人民之前誇張炫示。

這位新國王菲得利·維廉第二的內政，在其本質方面，很快的就變成曾經使法國陷於貧困的那種情形一樣，並且差不多德意志的所有的較小的朝廷及政府也改變了。他將公共的田產割給了他的嬖人及情婦，並且將過多的財寶，貴族的特權證，及武士品級也給了他們。他以身作則的散佈他自己的人生觀，先貫徹到宮廷及柏林社會，漸漸的便普及到全國的整個高等階級。腐敗來了，揮霍繼至，跟着便是欠債及喪德欺騙。有一閣員名吳爾額 (Wöllner) 者，他之顯露

頭角是由於一個與舊的新教徒篤信正教有關係的上諭所致，該上諭的大意是：姑且明明白白的准許僧侶可以不信新教，假如他們祇是自己不信而不向別人宣傳。但他對於印刷品的檢查却更加緊了，並且制定「教義測驗考試」及發佈特別訓令以阻止任何新觀念滲流入百姓之中。康德 (Kant) 是一位足以代表普魯士及德意志將來之光榮的人物，他在科尼斯倍 (Königsberg) 正苦心研究一種較好的哲學；他為道德立下新的基礎，這種工作在十九世紀中是人類思想上一個最偉大的精純力量；不過他所表示的有點兒傾向言論自由，因此乃從柏林得到刻酷的斥責；他被警告說他必須緘默，否則比這警告更甚的處罰將要惠臨了。

這位新王的對外政策也與其先人大不相同。偉大的菲得利曾集中精力以謀本國之安全與幸福；而菲得利·維廉第二則分散了他的力量，多少的有些模模糊糊的努力去完成一些在別的國家可以值得注意的事情。他干涉並且擾亂別的國家但是既得不到實力也得不到光榮。他派普魯士兵入荷蘭去幫助其當地的一黨派，也曾得了些小小的勝利；普魯士外交部雖努力的繼續菲得利大王以本國為限的工作，不過這個努力的結果竟成了一串的笑柄，其受愚弄的犧牲者有時是普魯士有時是奧國 (Oesterreich) (二〇)。

正當這個在進行之際，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浪潮衝破所有德國官僚制度所豎立的堤坊。在菲得利·維廉第二登極三年之後法國革命爆發了。這個革命所表現的不好之點尚似乎不多，而因其歌頌新真理却將歐洲全都燃燒並激動起來了。各邦的將軍們對國王及朝廷的反抗，及在表面上像似與君主政體相融洽之國會的成立，及貴族特權的取消，及賽葉絲 (Sieyès) 的論文小冊子，及巴宜 (Bailly) 與米拉布 (Mirabeau) 的演說，在在均使德國思想為之發酵。

對於應付這個大潮普魯士作了些什麼呢？尚不如不作。牠對於特權階級

(二〇)關於菲得利大王與菲得利·維廉第二的其他不同之點的簡單敘述，請看 Gneist, Denkschriften des Freiherrn vom Stein, p. 3。關於吳爾額 (Wöllner) 的發跡與騰達的有趣味的細情，請看 Guy S. Ford, 見一九一〇年一月之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在服兵役方面有些讓步，對於軍人在訓練上有所讓步由嚴格改爲溫和，因上層階級能發呼聲使國王有所聞乃將一部分負擔移給不能發言的下層階級。但是在普魯士及德國其他各邦中那一大堆重要的惡習却保留未變。

在普魯士王國，其政治活動無論對內對外，在此時期均是極無道德。雖然曾經保證保護波蘭土地完整，但並不顧這個誓言，對這個不幸的國家依然進行瓜分。無疑的，波蘭似乎不配如一個國家而存在；無疑的，在信奉基督教諸國之中波蘭政府是最爲乖謬邪曲；其貴族目無政府，行爲不法；其勞工階級欺壓僧侶，結果以至愚昧到無法救藥的地步。無疑的，所有受到奧國，普魯士甚至俄國統治的波蘭人都是在物質上佔便宜的人；但是在和平之時去侵犯及佔領一個獨立國却是一個創例，所以瓜分牠的列強乃有，並且至今仍有，理由去哀悼牠——且哀悼的很利害。

現在法國革命正走入足以威脅別的國家的情勢，而在此際普魯士又作了新的大錯。歐洲諸君王集在一起會議，到會者之中其特殊人物是德國皇帝雷歐波德 (Leopold) 及普魯士國王菲得利·維廉第二；由這個會議發出比勒尼芝宣言 (Pillnitzer Konvention)，這個宣言除了將法國在一七九二年對德國所生的憤怒又重新挑惹起來，別無他用。余貝爾 (von Sybel) 在他的可稱道的文章中有一篇曾宣佈他的意見說：是同盟的君主們發動向法國作戰。這個意見係一流行之謬說。余氏的此種論調，陋不足道，對於偉大的歷史家如余貝爾者似乎不很班配。以學術立場而言，這場戰爭實在是由法國發動，而是列強聯合起來去抵抗她：法國實實在在的是宣戰了，君王們的聯合宣言不過是使戰爭無法避免而已；在巴黎的共和黨人具有足以看明白此點的智慧，而在柏林及維也納 (Wien) 的保皇黨則沒有。

當時，普魯士及奧國的軍隊急去抵抗法國。在一起首是法國敗北。有些法軍陷於混亂：他們拋棄了軍器逃脫生命，那種情形與在我國內戰開始時聯軍侵入南部是一個樣子（譯者案：此指美國南北戰爭言）。就其本質來看，他們

在聖·門尼好德 (St. Meneshould) 附近的大混亂的情形，活像我們在布爾·蘭 (Bull Rum) 的大混亂的樣子。不過不久這種情勢完全變了。普魯士人與奧國人們都將力量消耗在瓜分他們的捕俘物波蘭的陰謀上了，及二者均想佔先的可憐的爭辯上了。最壞的，是他們發表了那個著名的卜勞恩史外宣言 (Braunschweiger Manifest)，因為受了這個宣言的恐嚇竟將奮命死戰的勇氣注灌於每個法國人了。在此時德國乃開始被擊退；法國的較優秀的軍官起來了，他們起始是在瓦爾梅 (Valmy) 及捷賣擺斯 (Jemappes) 打退了聯盟國，直到最後，一七九五年，普魯士由於巴塞爾和約 (Frieden von Basel) 方得逃出一切糾葛——因此她離棄了她的同盟奧國和允許法國佔領萊因河 (Rhein) 左岸及比利時及荷蘭，她所得的法國給她的賄賂是法國允許她任意處置德國各小邦，——吞併及壓迫，均可趁心而為。

當於普魯士像這樣的快法將菲得利大王留給她的力量與威望丟掉之時，這位「頗受愛戴的」菲得利·維廉依然追歡覓樂不已。我國的毛禮斯 (Gouverneur Morris) 在一七九七年獻身於菲得利·維廉之宮廷，他寫家信說：國王看着雖似強壯，但顯然的他的壽命是不久了。這位精明的美國人的預言果然實現，甚至實現之早竟出了他的預計，因為菲得利·維廉第二當年就死了，其子菲得利·維廉第三乃登極即位。

這位新王，除了道德方面，其餘在任何方面似乎更無可取之點。他是畏葸，拙笨，沒有決斷，遲慢迂緩。他所受的教育很不好，一部分得之於老頑固，一部分得之於酒色徒；他的精神為他父親的嬖人們所摧傷；在一起首他在各方面所表現的都是霍亨索倫族系所從來未見過的一位最可鄙棄而無法救藥的人；然而在他的心靈的深處却有一天才的火花，這個火花曾為霍亨索倫人造成了德意志帝國。當他即王位的時候，他也作了一些改革的嘗試，不過這種嘗試不是一貫到底而是忽作忽輟的：他將在他父親時代管理宮廷的李曲奴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Lichtenau) 逐走，將吳爾額 (Wöllner) 解職；但是不久，他雖然能夠擺脫

開他父親的那種環境潔身自愛，但他終於墮入他父親時代的老政治家的手中——那些狡猾之徒如郝格威次 (Haugwitz)，陸克細尼 (Lucchesini) 等等。

在此期間，歷史也在法國進行着，並且是一部大不相同的歷史。由法國大革命產生出來龐大的軍隊及偉大的將領，拿破崙便是其中之一。法國解脫了她的老桎梏，將教堂的田地及頑梗貴族的產業均從新分配，將農奴變成爲自由公民，並發展全國不顧生死的勇氣。

德意志與普魯士仍然握着老制度不肯放手；甚至人民也拒絕改良；奧國約瑟夫第二 (Joseph II) 曾盡力想改善其國家，但是很明顯的他從人民所得到的祇是詛咒而已。他竟傷心而死。特別是當拿破崙走到『人在馬上』的時候以後，法國人是很容易的去耍這套把戲了——自由的天然的歸宿是走入瘋狂；他們耍弄大陸各國使他們互相反目，乃趁機而賄此毀彼；對大國，阻撓，以免牠變成太強；對小國，把牠們分成集團，連合牠，使之附依於法國，俾法國得任其野心而爲——這樣來，在相當時期造出來一些王國如巴燕 (Bayern)，魏登倍 (Württemberg)，維斯特法倫 (Westfalen)，萊因同盟 (Rhein-Bund) 及其他各樣的小侯國。從此之後各小國都希望從法國獲得利益，而不再效忠德國了。在一八〇三年，除去這些較大的區域之外，德國大部都被分割當作賄賂使用了——因爲這位戰勝者（指拿破崙——譯者）以爲使用這樣的賄賂是攏馭德意志各君王最高的策略。五萬平方哩，三百萬人民，就那樣的被擲派了，並且在這種步驟之下有二百多個小德意志邦國之主權也破剝奪和消滅了。就像在六十年之後，在畢士麥時代，凡不肯愛國及不敬奉正義的王子均被具有『鐵與血』的人們打倒除根是一樣的。

奧國因未受到普魯士的幫助，乃不斷的失利而受到大的損失。她在烏木 (Ulm) 竟不得已而降服，這是歷史上最不名譽的一件事，所以由此她受到很大的恥辱。最後在一八〇五年在奧斯特利茲 (Austerlitz) 又被打得大敗，又被強迫簽訂殘苛的波累斯堡和約 (Friede von Pressburg)，由於這個和約她的全國境的

屏藩全都失掉。

從此，普魯士的一串的可怕的國恥乃開頭了。設而她誠心誠意的聯合奧俄以抵抗拿破崙，那麼她所得的結果要與現在大不相同。然而她坐誤機會，遷延時日，及到伯累斯堡和約成立的時候，她的理所應有的同盟國均失掉了，很明顯的是永遠失掉了。菲得利·維廉第三，在他受到困苦艱難的教訓之前，仍然與平常一樣因循遷延直到晚到無法挽回，在奧斯特利茲 (Austerlitz) 戰爭之前他曾派郝格威次帶着以戰爭作威脅的哀的美敦書 (Ultimatum) 去見拿破崙；但是這個會見竟擱置到戰爭已經起來才舉行，以致情形全變——拿破崙大敗奧國且將俄國擊退，郝格威次只得將哀的美敦書放在衣袋中，假裝着說他是爲了保持歐洲的幸福而被派遣來作調停的，及向戰勝者因其獲得勝利而來賀喜的。拿破崙知道郝格威次撒謊，郝格威次也知道拿破崙明白他是撒謊；但是因爲普王給郝氏一封私人信讓他負起這個責任，於是他們乃訂了順布倫條約 (Vertrag von Schönbrunn) 這個條約看着像是對普國極有益處，但是實實在在的是普國歷史上一個最大的羞辱。因爲拿破崙明明知道普國急需和平，故應許普國：如果普國與其聯盟們完全斷絕關係他可將漢諾威 (Hannover) 給她。這真是歷史上一件根徒奸行的傑作。假設普魯士對新的領土有所貪求，其地非他乃是漢諾威；而漢諾威者乃是英國統治者的所有物；普魯士如果去拿牠則英國必起而爲其勁敵，並且也使所有歐洲具有正義感的人們看不起普魯士(二一)。

(二一)關於郝格威次(Haugwitz)的惡行劣品的苛酷而扼要的論述，看 Pertz, Leben Steins, Vol. i, pp. 137, 138；但是德國的及英國的歷史家們都反對這位在普魯士反抗拿破崙的早期鬥爭中曾經佔那樣重要地位的人；他們作了一些刻薄的罵他的文章，但是讀這些文章時必須看看 Thiers 的見解與言論，他說奪取漢諾威 (Hannover) 的提議是拿破崙首先提出來的不是 Haugwitz；請看他的 Le Consulat et l'Empire, Livre 23。關於 Haugwitz 的善與惡請看載在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中的 Von Sybel 所作的關於他的生平。對於菲得利·維廉所負的真正責任，根據新近所發現的文件而作的概述，請看 Henderson, History of Germany, vol. ii, pp. 255, 256。

普魯士的政府對於拿破崙的打搶制度本來不願入夥；但是及見拿破崙日見強盛，及拿氏堅決表示普國如不接受這個條約，那麼再提出的條件尙要更壞，因此這條約乃被批准了。大概拿破崙是以使普魯士的國恥達到極點以爲取樂——因爲他將漢諾威給與普魯士僅僅是名義的，可是他竟當真的要起報酬來，他要普魯士許多別的領土，這樣以來，普魯士這次不光榮的代價畢竟是略勝於無而已。

然而此不過僅僅一開端耳。拿破崙的詭譎伎倆其天才之卓越足可與其軍略相侔；他使普魯士王剛剛一與他合夥，他便視普王如僕役，逼迫他將那既能幹且愛國的外交部長哈敦伯（Hardenberg）解職，而讓郝格威次回任，並且處置普魯士的土地就像處置法國自己的土地一樣。

更壞的是普魯士竟公開的被耍弄成爲一個受欺的老好了。當於拿破崙將德意志聯邦中的在萊因河以西各邦和一千六百萬德意志人劃歸法國之時，拿破崙爲表示安慰普魯士竟很慈惠的允許普魯士成立一個北德意志聯邦，以普魯士爲其領袖；但是當於普魯士試着去實行這個諾言時，竟遭遇從各方面來的遷延，反對，阻礙；不久乃發現拿破崙當於允許普國建立一聯邦時竟在背地裏禁止德意志各邦去加入。但這還不算，在這個以後他所作的欺騙行爲比這個更爲卑鄙。普魯士已經接受了漢諾威，因此乃與她的天然的同盟國，英國，絕交了，而與她的天然的仇敵，拿破崙，聯合了。她真是蒙着羞辱來這樣作的。當於這個條約完全實行之後——當於英國爲了這個條約在大海上嚴厲的罰懲普魯士之後；當於拿破崙也因此條約而從普魯士要求了許多的領土的割讓及對於國家的尊嚴有巨大的犧牲之後——當於發現了拿破崙正在秘密的與英國商議並且在各種條件之下情願將漢諾威歸還英國之時，請估一估對於這個可討厭的深淵所出的代價是多麼大？每個有頭腦的普魯士人都被擲入這個深淵之中而蒙恥了。很清楚的，於盜賊之羣豈可以講信義？

在凌辱之極端上拿破崙又給戴上一頂小帽，就是在和平之時他很侮慢的將其軍隊在普魯士領土通行，且公然的連國際公法的最簡單原則也不管不顧，並且他

讓他的將領揚言說與普魯士不久將要有場戰事。

在普魯士這方面呢也有種高而放肆的論調。據人傳說，有一位高級將領在柏林曾公開的說過：國王有數位大將，每位均與“M. de Buonaparte”（即拿破崙——譯者）一般優秀。此時普魯士同着俄國秘密佈置對抗法國，並且後來，在一八〇六年秋，普軍出動；僅僅在幾個星期之內，拿破崙出兵迎戰並在耶拿（Jena），在奧爾士大特（Auerstädt），在塞費爾得（Saalfeld）容容易易的就把普軍打的大敗，並且——從昔日之勃蘭登堡的選帝侯起（Kurfürsten von Brandenburg）到菲得利大王之死——多少年來費種種犧牲所小心翼翼建成的大廈現在竟置於戰勝者的腳下了。

拿破崙現在是直上青雲錦上添花；在市民的一片喝彩聲中他進了柏林；並且在普王的老宮闕中他提出了最嚴酷的條件；跟着他就帶兵向俄國推進；在埃勞（Eylau）那場可怖的大爭奪戰他保持住了他的地位未被擊敗，但在夫瑞得蘭（Friedland）他得了絕大勝仗，並且，就那樣的完全戰勝了俄普兩國。在一八〇七年夏他在美美爾河（Memel）木筏上與俄皇會見，乃締結了那著名的梯爾西特條約（Vertrag von Tilsit）。本此條約這兩位皇帝乃成爲同謀者，共同計劃出一種多多少少也算有點規定的方略，用以去征服英國和全歐洲，這樣以來，便將普魯士的舊的密切的聯盟，俄國皇帝，給離間開了，拿破崙乃得對普魯士爲所欲爲——他使普魯士的領土及人口減少了一半，他佔據了最必需的礮壘的大部，他將大批軍隊駐在普國，使用普國的軍隊，土地，錢財就如同他自己的一樣。菲得利·維廉第三現在退居在其國土的遼遠的西北角上，變成爲一種聲名狼藉的隱士王子了——他的國土由五千德國平方哩減到比兩千哩稍微多一點，居民由一千萬減到六百萬，並且豫期着將後還要有更多的縮減。

這還不算，比這個更利害的是這些失地所佔的地位：波蘭被搶走了，普魯士東邊乃失了屏障；埃爾貝（Elbe）及萊因河的中間土地均被奪走了，普國乃失了西邊的防守地；在其餘的國防線上最重要的礮壘均由法兵駐守，所以普國全境均

無國防可言。因此普魯士所轄的領土乃呈破碎瓦解，貧乏困弱；且門戶大開，只要拿破崙加以唆使，隣邦之兵隨時均可入境。法國向普國人民又索鉅額賠款，且向百姓用種種方法勒索，俾此賠款得以交付。更有其他小的弊政特別令人髮指。譬如在法國政權到柏林一年之內竟鑄銀質不足的貨幣達普魯士錢三百萬元之多，這個事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二二)

在所有這些擄搶行爲之外，還有其他許多苛政及令人憤怒之欺辱行爲。如柏林的主要裝飾品，那個表示凱旋的偉大的四輪兵車及其馬匹，與那帶翅膀的勝利之神的銅像都從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er Tor) 上取下來送到巴黎。拿破崙當着全歐洲之前陵辱普魯士之國王及其人民，其才智伎倆之高祇有其愚蠢差堪比擬。他將普魯士王后路易絲 (Louise) 牽扯入他的公報與信件之中，暗示她品行不端；對她散佈可怕而無定指的謗言，並且當他遇到她時他竟粗獷無狀——她對他惟一觸犯之處不過是由於她對於普魯士之愛國虔誠而已。她的天性之中像似有一方面頗具有藝術的才能，此點後來在他大兒子，次一位國王菲得利·維廉第四，的身上又顯現了，同時她也具有負責任，恆心，及虔誠愛國等意識，這種對國家虔誠心是命定的在她第二個兒子身上得以發展，並且發展的對於國家是那樣的有利益。她的第二個兒子就是戰勝法國光復德國的德皇維廉第一，他在那個時候尚不過僅是科尼斯倍 (Königsberg) 的一個小孩子耳。

拿破崙常常的喜歡虐待婦女。次於他的巨大的，巧妙的，不息的謊言能力，虐待婦女可以說是他的性格中最壞的一個癖嗜了；對路易絲王后他將這種特性表現無餘；最後她竟傷心而死，因此她乃被普魯士人民推戴成爲一種護國神聖。她的影像與畫像竟成爲大衆的崇拜物。在普魯士的農民心中由彼時起以直到現在直將路易絲后置在與德意志其他地方之農民們在中世紀時所崇拜的聖·伊利扎白 (St. Elizabeth) 一般地位；非止一次，由於記念這位殉國的王后所受

(二二) 看 Pertz, Leben Stein's, vol. ii, p. 110。

的虐待，竟感動無量數的德國家庭傾出勇猛的兵士向法國報仇。(二三)

但是還有比這更深的恥辱。拿破崙獲得勝利進入普魯士京城，就如同進入其他的城市一樣的獲得擁擠的民衆的彩聲；德國之失政，在各方面，都將愛國心給連根掘了。

然而在這黑暗之際，光明也起始顯現。菲得利大王的嚴苛的統制時期甚短並不足以摧毀所有的豪壯的元氣；菲得利·維廉第二的荒於酒色其在位期之暫也不足以摧損所有的道德；那些人人所公認的循吏現在竟公然顯出有政治家的品格了；那些人人俱知的僅是一些嚴厲的軍官們現在也都起始表現他們的軍事天才了；當此嚴重的國難時期在各方面都顯出天才，能幹，及深厚的責任觀念，但以普魯士所表現的爲最甚。當時英才羣起，足可使美國人想起那些『戰時長官』——偉大的軍人，有力的謀士們在我國內戰之時（此文著者爲美國人故如此云云——譯者）都是從那些近於可憎的一羣政客出身，且這羣政客都是因爲助長奴性而無可救藥的腐化之輩。

在那可怕的國難期間，在那些偉大的德國人物之中其最傑出的要算亨利·菲得利，卡爾·封·石太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Freiherr vom Stein)。石氏祖先們曾爲德意志帝國男爵。他於一七五七年生在距他祖先的老堡壘不遠的地方——石太因堡壘，座落在那騷 (Nassau) 城埃木斯山 (Ems) 之上，朗河 (Lahn) 之畔——他們同胞十人，他排行第九。他家住在那山岩之上已有七百年了，並且是由此山岩而得到姓氏（譯者案：stein 在德文爲岩石之意。）——直到三十年戰爭那堡壘才荒蕪——從那時起他們在那山下一小村中建立一宅第，直到今日其族人之代表者們尚居其中。在老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統轄之下，他們曾管轄他們附近的兩個村子，具有種種主權的屬性。石太因諸弟兄大

(二三) 關於拿破崙對於撒謊及甚至冒人筆跡及胥造簽字所具之傾向與嗜好，看 Lanfrey 著的 Histoire de Napoléon 中所舉的例子。在 Emerson 著的 Representative Men 中也提到拿破崙的不息不衰的撒謊習慣，甚至直到他死時；這本書措詞很敦厚但頗有分量。

部均顯有才能，惟有他在幼年時就被人所公認既具有好的品行又有天才，因此本着族約之規定他乃成爲其族姓之代表者——就是族長。他所受的教養極好，隨着老德國的樣子他被教導說真話，並且特別令他明白他的地位不僅是行使權利並且還要盡責任。這族的其餘諸人似乎都在他們能力之中摻加一些粗野與荒淫，惟有石太因一直本着正道而行——有丈夫氣，純潔獨立，自制，勇敢直前，精力充沛——這個力量是很關重要的。

他最喜歡研究的是歷史——古代的，近代的，特別是英國史。從一七七三到一七七七他在格廷恩（Göttingen）大學法學院讀書；但是他爲研究歷史所下的預備工作不是零碎的形而上學，也不是僅僅爲了好玩而治一點文學，他乃是澈底的研習憲法及歷史——主要的是研究其本國的和英國的法律及歷史。他敬愛偉人，他最崇拜卡爾大帝（Karl der Grosse）和路德（Luther）。他的古典學問中平無奇，但是他對於英文法文的知識却透澈而能應用。與他的歷史的研究連合在一起他細細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及與此相類似的各種學問，他對於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的新著作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印象特別的深；由於此點及石太因後來在普魯士所作的改革工作所生的結果來看，我們對於柏爾克（Burke）及巴克爾（Buckle）兩人認爲亞當·斯密斯的書對世界福利之貢獻爲以往的任何人所不能及的論爭得到了新的見解。

他在格廷恩住了四年之後便在德國作廣闊的旅行，不是爲快樂而是想研究「人」及實地的情形。他在瑞根斯堡（Regensburg）住了很久，以便研究德意志國會的立法情形；又在圍刺拉爾（Wetzlar）住，以便明瞭德國大理院的司法的實際情形；並且在維也納（Wien）住，以便在這全國的中心地對行政的方法有所瞭解。所有這些與實際生活之接觸使他不致流爲迂腐——一個祇記得一些公式的人；在所有這些期間，他注定目光廣看事實，一些爲一位想去爲國家服務的人所必須知道的事實。他又走到了國外；到過匈牙利（Ungarn）施台爾馬（Steiermark）後來又到英國，對於礦及工場細細觀察——在每個地方都研究其國力的富

源。

我們知道，在起首時他曾在德國某一邦中爲官職，這是像他那種地位的人，財富不多而野心極大的人所常取的步驟。好多位置展在他的眼前。德意志帝國中一些小邦每個均有其文官職務均需要有能力的人，差不多都像是對他有些機會。他的祖先是盡忠於奧國皇室的；但是他深知奧國過去的歷史也遠知其將來，他知道從奧國方面德國是不會有大希望的，因此，他再三考慮乃與他家族之傳統分道而馳，並且與那德意志南部反對德意志北部的作法與習尚的偏見相分開，他選擇普魯士的菲得利大王爲他服務的對象。在他思想的最深處是希望德國的統一，並且他見到祇有在普魯士領導之下才能完成這個希望。由於這種感覺他乃去到柏林，在那兒於一七八〇年他在管理礦務的行政機關當一名次級官吏——特別是管理維斯特法蘭（Westfalen）省的。他的職責是監督礦場，研究並報告生產的最善方法。他立刻即以對此極爲熟悉的態度去執行他的職務，他同着最好的教授對於化學，礦物學，冶金學作新的研究。爲了避免流入於書呆子的空論所以他作這種研究都是依照着實際的情形及實施的步驟作細密的觀察。他陞遷的極快，在一七八四年他已升爲維斯特法蘭省的礦場與工業的行政指導官了——由那時起直到今日維斯特法蘭成爲歐洲的礦業與工業的領袖區域之一。

此時，他很顯出偉大的幹材。維斯特法蘭的一般的官吏都是昏庸而無生氣；他推動他們，拉引他們，去促進公益；他的技巧，精力，及其爲公之精神到底爲大家所承認了。

在一年之後，他突然被召到與他現在的工作很不相同的方面去作事。菲得利大王正在結束他對奧國新開瑞的鬥爭時，他想要爲他的德意志君王同盟（Deutscher Fürstenbund）獲得那些老德意志帝國各式各樣的領袖人物——特別是想得到邁恩茲（Mainz）地方的大僧正選帝候（Kurfürst）；他擺脫一切的傳統，命石太因爲他的使臣去邁恩茲。這位青年雖然對於此類工作毫無經驗，但他斬斷那



石 太 因

些對於作這類事情所常用的小撒謊與欺騙的纏擾而以真誠去影響大僧正，並且以常識去獲得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對於像他那樣的年青的人而論他可以算是得了一個大的勝利。(二四)

但是當於他去接受這個外交職務時他是極端的遲疑——實在的，在起始他嚴峻的拒絕這個職務，但是他的榮譽及忠心的意識引導着他又接受了。現在他的職務解除了，他決心不再作外交的事情了。在他的言論之一透出一線光明說明他的動機，因為他說話不喜歡以「閒散與詭譎交相爲用，動作均加算計」——這句話將那個時期的整個外交情形包括無餘。

在一七八六年，菲得利大王剛死，菲得利·維廉第二便開始實行他的干預政策，他想得到石太爲他的使臣，先去荷蘭後去俄國。這些個官位是極其顯赫並且以石太在邁恩茲的成績看，他像是能够成功的：但一者這個工作毫無目的再者他不能改變對於這個工作的討厭的心情，所以他不當使臣而仍繼續在維斯特法輪所作的工作。有許多證據，證明他走上此途是受了丟格 (Turgot) 的影響。丟格一生所表現的不僅是他所治理的那一省，而是對於全法國，並且是對於全歐洲。建設工作，雖然是在一省裏，也比去執行宮廷或內閣所起的偶然之念偉大多了。

石太因在維斯特法輪的責任很快的就擴大了。他現在將全副精神均灌注在振興工業及大規模的開闢水陸交通。他發起一種改新的辦法頗使當時的人們震驚，就如同今日在我國有些地方也因某些改新而震驚一樣；因爲他開築的道路工程優良至極，但他不按封建時代的老樣子去強迫人民貢獻那不熟練的勞力，而是用科學方法去指導，並且給充分的報酬。於是乎就這樣的，石太因在一七八六年，像幾年前的丟格一樣，與一百多年以後的紐約州及其他美國各大州政府所取的是同樣的方法，所達到的是同樣的結果。

(二四) 關於石太因肩負這個使命所克服的種種困難，其惹人注意之細節，看Pertz, *Leben Steins*, vol i, pp. 44 et seq. 教會的選帝侯們的朝廷什麼都像，就是不像聖徒。

他對國內徵稅制度也有所改良，並且是那個樣子，在二十年之間他從事於這工作不是僅僅爲普魯士財政而已，而是爲了一般百姓的福利。

當普法第一次戰爭之際，這場戰爭是以巴賽爾條約(Vertrag von Basel)而結束的，他有理由去覺到柏林政治家們作了大錯，但是他仍然努力於自己的事業：愈來愈清楚，他覺得開發國家富源比參加外交工作的貢獻較大。他繼續不斷的捉執新的工作，延長重要的交通線，改良水道與陸路，激勵工業製造，撤退無用的官吏，停止侵吞公款；但是比這個更好的是他發展了公共教育，並且計劃對國家作一般的改革，特別的是取消品級制度與農奴。

他的成功使他的責任愈來愈多。他被請去監察因同法蘭西共和國所訂的巴賽爾和約所新獲得的土地歸併入普魯士的情形，並且特別的是去抑制部下人們想將普魯士的硬板而嚴酷的制度由首都輸入到新領土。

他的不斷的成功使他升遷爲全省最高長官。在一七九六年他被任命爲省議會的議長及維斯特法倫的全部行政的長官。在這次升遷之後，他的職分極易爲一美國人所瞭解，假設我們幻想一下，在我們最大的一州中有一位州長請他去奉行職務，不僅是行政而是司法，立法，外交，此外更加上華盛頓都城中那些重要閣員們的工作。這種制度無問題的是不好，但是他的天才使牠進行的很爲順利。他的力量與他的任務同陞；不久就感到他是一種勢力，人們應當向之服從，在他的力量之後是一種堅決不移的熱心，不是爲金錢，不是爲地位，而是爲國家的福利。

在一八〇四年他被調到一個比現在大的多的範圍裏去。他被任命爲普魯士的國務大臣；財政部，工業部，商業部，都由他管理——他作大臣的事業祇是在拿破崙當皇帝前的幾星期。在這個新位置上，所有他的一切努力都是被他那汲汲渴望由普魯士爲領袖去統一德國那一念所燃起：命定的他是法皇拿破崙的有力的德國敵人，他們兩人有同樣的內心衝動——拿破崙想打倒普魯士以阻止德國統一，石太因想使普魯士富強由她促進統一。

石太因的這種感覺在當時對於政治經濟竟結成一種新的觀念。普魯士同老的法蘭西君主政體時代是一樣的，也分成許多省，並且一般的都是每省有牠自己歷代傳下來的省境，各有其工商業上的令人煩惱及阻遏發達的障礙。爲了反對這樣的制度手格在法國很鬥爭了一陣，但是失敗了。現在全世界的人都見到那種制度是反常悖理，但是在彼時，一般的人則認爲那是天經地義，並且還真是重要的：政府喜歡牠，因牠可增加國家收入；人民喜歡牠，因牠可保護其省工業。石太因將這些最悖理的東西一掃而光，並將其全部的基礎暗中予以掘除。那舊的徵收國課的複雜方法，石太因將牠簡單化；不管有如何的嚴重反對，他拓展一種新制度，花費小，收入大，同時他勇往直前的發掘弊端，停止苛斂，並且改換各種管理財政之方法，因爲那些老方法日趨鄙陋不堪再用了。

但是現在反抗拿破崙的戰爭就在眼前了。因爲石太因是財政大臣所以他被召請，要他爲這場大戰預備款項。在已往各次戰爭普魯士已經採取常備戰金政策，這制度到今日依然存在；所以當她動員軍隊時在充分的財政條例制好之前立刻就有準備好了的工具去渡過那財政的混亂。這種制度在現在是一種次要的便利，但是在當時却是一種主要的依靠，因爲有牠便可不至於突然向人民加重負擔。因此在戰爭的初期普魯士因籌款愈多所以事情進行的也愈容易。但菲得利·維廉的愚昧行爲將那些財富都消耗光了，並且還多出虧空。於是乃考慮各種方策以爲應付。菲得利大王曾發行過劣質貨幣，雖然後來所付的代價十分可怕但在當時頗獲成功；石太因拒絕這個辦法，並且向國王談到國王的這位偉大的先人時措詞非常誠直毫無阿諛。雖然決定行使紙幣，但是這紙幣是小心管理着；那樣的『不兌換紙幣』自在我國得到普遍的擁護以來年數不多，所以在彼時尙未被想出，比較着說彼時流通的鈔票數目並不大——實在的，比國王與他的顧問官以爲可以允行的數目爲小；石太因是以十分安全爲主，一超過這個他便明白的加以拒絕；紙幣這個愚人天國，在法國確有好些大臣以牠爲娛情之工具，但後來都受了牠的苦惱，石太因是不願走進去的。

加在他身上的苦工是積壓重重。他用最不充足的機器必須造錢去打法國；但是財政在他的事業中是最微末的一端，因為他看出來如果政府的制度不大大的改變甚至不在根本上有些改變，則急速的崩潰就到來了。

郝格威次 (Haugwitz) 在外交政策上仍有勢力，他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可憐蟲，現在他完全為拿破崙的光榮所炫暈所昏迷；石太因毫不留情的反對他。與國王相接近，在國王與大臣們的中間有一種『廚房內閣』 (Kitchen Cabinet) 其中主要的閣員是龍巴得 (Lombard) 一個純粹的騙子，他是與那些曾經將毀壞帶給法國的人們屬於一類；貝麼 (Beyme) 有時是位好人，但意見謬誤，還有郝格威次和與他相似的人。對於這些人石太因與他們戰鬥無已。

由於研究一般行政，他發現：嬖臣，大臣，指導官，委員，部，局，官吏，這一羣混合物，戴着各類頭銜，品質良莠不一，所作之工作大部互相抵觸矛盾。由於研究全國一般的狀況，他發現：全國分成數種階級，貴族，公民，農奴——每一階級都被各種朽舊的限制所縛束，他們的人力財力均不能按照他們的需要及國家的需要去使用。爲了這個他乃想出改革來。

耶拿 (Jena) 那場戰爭其結果雖然可怕，但並未能動搖他的宗旨。雖然別的大人物都急忙的宣佈向拿破崙歸順；而石太因決不妥協；別人將產業放棄讓給戰勝者並在他手下爲官；而石太因竟將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東西均查封起來送到拿破崙的勢力所不能達到的地方，他拒絕將他自己投降於他國家的敵人，他隨着國王去到最後的避難所——全國中最陷於悲哀的一角地。

國王敦促石太因當外交部長，但他固執的謝絕了，國王向他所施的一切巧言奉承的諾言均不能搖動他；他之所以如此的堅決，一部分是爲了他相信他的同僚哈敦伯 (Hardenberg) 比他更合適，一部分是他在『廚房內閣』永遠取消之前他是不願在外交方面服務的。國王試用各種方法去使他回心轉意，但同時又堅持那老制度不肯改變，結果國王乃發了脾氣，給石太因一封嚴峻的信說石太因某一次的諫言簡直是一篇「吹牛皮的論文」，他稱石太因爲一『頑梗不馴，傲慢無

理，且不服從的官吏，自炫才幹，輕忽國家福利，純粹受心情之支配，行動以情感，仇恨與憎惡為轉移。』信尾上說：『假如你不傾心去改變你那不恭無禮的行爲，國家再不藉重你了。』

因此，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三日這位強項的愛國者由內閣辭職，回到了那騷(Nassau)的老家並住在那兒；他住在那兒並非爲了懶惰，因爲他立刻就起草他的各種改革計劃；這種計劃他認爲必須在排除專制政體之前在普魯士能夠實行方可，自從奧國在奧斯特利茲(Austerlitz)，普魯士在耶拿，俄羅斯在夫瑞得蘭(Friedland)敗仗以來專制政體對德國愈來愈可怕了——這些計劃之一是：以一個較優良的大臣會議去永遠替代那『廚房內閣』這個會議由那些著名的及有能幹的顧問官組成，牠不僅向國王負責並且向國家負責。

實行這個計劃及其他的好意見的機會來的真快，直出乎石太因所意料：哈敦伯因受拿破崙的壓迫而撤職，國王爲愛國心所驅使乃令石太因繼哈氏之位，並且以冷眼來看最可驚異的是這個意見竟爲另一方面所支持——是拿破崙他親自贊成。這位大戰勝者計劃着重重的由德國吸取財富，他歡迎石太因因他善於開發富源。就這樣的，石太因在他受辱的解職後十個月，他被國王請求就原職之外並且成爲首相，全權處理文官行政，且在軍政外交亦具大權——於是乃成爲普魯士的立法者，其職守在應付當前可怕的緊急需要，及爲將來創立一種較佳的制度。

當時有兩個大的委員會，他早就與之有所連絡，一個是民政的，一個是軍事的；這些委員們早已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他也設法鍛鍊他們向良善的目標去努力。在這些團體之中石太因變成爲第一偉人，在他身旁的第二位偉人是他的朋友沙恩荷斯特(Scharnhorst)將軍。

當這些人現在又從事於他們的工作時候，拿破崙給普魯士留下的這一半國土已成爲破損不堪之物了，富源典押給法國，捍衛干城之兵士受戰勝者之指揮，人民陷於窮困，流爲麻木。當此之時，石太因的精神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描寫的

極好：——

他說『我們先從一個基本觀念入手，就是喚起全國的道德的，宗教的，愛國的精神；就是以勇敢，自信，及爲國家之榮譽與獨立而準備一切犧牲去鼓舞國家使之更新；並攫取最先的合式機會去從事流血及艱鉅的鬥爭以求國家的獨立及國家的榮譽。』

在以起首他的朋友就承認他的品行，思想，工作的偉大了。但是當他的任務增加之後，他的計劃漸漸得以施展，他的腦力乃爲全普魯士所承認——不，被全歐洲——是反抗拿破崙暴政的中心。

他的才能，雖然增長的如此的高出於與他同時的政治家，但他不想去蓋過他們或摧殘他們。曾經有許多偉大的政治家，非等到大家對他們表示忠心並且喜歡他們時，便不滿足；非等到所有的同僚均失魂喪志的匍伏於他們的勢力之下，他們不快樂。石太因不是屬於這類的：其有決心一如往常，其易動怒依然時犯，由於他的活動之影響引起許多別的活動，並且這些活動他都喜愛且加扶育；在他的影響之下，其他有力而獨立的人物長進了且加強了；這些人們之中例如哈敦伯 (Hardenberg)，沙恩荷斯特，格耐色瑞 (Gneisenau) 和施香 (Schön) 便是。

當他用心應付那些從各方面向他逼迫來的複雜而難辦的事情時，石太因與他的同伴促進兩重革命。第一個是和平的，其工作在利於產生種種新制度，由此在德國人民中可以生出較好的精神；第二個是屬於戰爭的，並且，用了很多時間，秘密的且是反叛的——是一個反抗拿破崙暴政的革命，並且其爲國家爭取自由的奮鬥之誠篤，實實在在的與美國革命曾經具有的是一樣，或者，在其起首亦與法國革命相似。

這個「和平革命」自然的要先來到我們思想之中，因爲牠是第二個革命不可少的初步，石太因及其同伴忠實的想，忠實的作；不是旋作旋輟的，不是向鼓掌喝彩的廂樓震詞演講，而是安安靜靜的，百折不回的，在會議室中工作着；在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那個偉大的自由解放詔書第一次出現了，這個詔書有三個目標

——第一，去取消農奴制度；第二，掃除買賣土地的限制；第三，阻止那些大業主做着英國的樣子利用他們的地位和資本去收買小農田——那樣便將小地主給根絕了。在這些個目標之下，之上，之中，祇有一個偉大的思想與目的——想創造一個新的人民。

第一，對於農奴制度。這種制度是一罪惡之叢，其本質與法國農奴制是一樣，在法國牠對於引起大革命曾出過那樣的大力。陶魁維利 (De Tocqueville) 已經指示給我們由那已腐壞的封建制度所生的錯誤是如何的曾將法國分成各樣不同的人民，互相憎恨愈來愈甚，到後來竟都準備躍起而扼對方咽喉。這種程序在德國尚未走到像法國那樣地步。法國人心，因為具有其清晰及其將一些意見達到合乎邏輯的結果那種一衝而下的天性，所以比德國下層民衆的思想發動的快而遠；但是德國農民，並且實在的在貴族之下的所有的全德國人民，對於保障德國統一的那些維繫物愈來愈不重視了。當我們讀雍阿澤 (Arthur Young) 當於他見到法國農民革命已到了爆發之前夕時，他所記述的那種法國農民憤怒的情形，我們一定要以為法國農人已竟陷到一種比任何同類國之農民都困苦的地境；但是這裏有一個例子可作證據，證明彼時德國農村處境之不幸尤甚於法國農村。歌德在一七九二年同着軍隊曾到過法國邊境，他告訴我們在法國農民的小房裏有面包和酒，而在德國這樣地方祇有黑面包且沒有酒。至如那惹人怒恨的壓迫及其令人困惱的情形，設而雍阿澤到過普魯士領地，他將毫無疑問的要給我們一幅與從法國得來的圖畫是一模一樣。且拿普魯士的幾個大省來看。在勃蘭登堡農民之中約有六分之一，按着封建制度的佃田辦法，可以耕用一小塊田地，而其大部農民在實際上祇是日工。在施雷仙 (Schlesien)，普通的，農民都是受着嚴厲的農奴制度之管轄，被強迫的留在田間；必須得到地主允許方能結婚；農奴的小孩是一定的要留在田間為農工，除非地主特別開恩允許他去求別的職業。在民登 (Minden)，凡君主，王子，親王所統治的領土上每個農民死去時他所留的那很小的一點動產還要分給地主一半。在波蘭的普魯士 (Polnisch Preussen)

一般的情形是：農奴是絕對的什麼都不許有。他所有的是：他有個地主。就是那最少的封建制度下的義務，地主們都曾經設法去躲避；並且可以隨意的驅逐他們的佃戶。

普魯士的君王們很有些人曾經努力去減輕由這種錯誤所生的壓迫。菲利得大王，他顯着像是傲世輕人的樣子，但他曾研究去減小那毛病日深的封建制度的盤橫的勢力，並且菲得利·維廉第三也曾經表出願望要開始去為一些較好的事情作些初步工作；但反動力量是太强了，貴族們及僧侶們現在在清教徒的普魯士就如同曾經在手格(Turgot)時代的天主教的法國一樣，他們的演說家喊出他們的主旨，宣稱說：現在這所存在的事務的秩序是『一種為上帝所制定的制度』；祇有靠着這個制度，則貞德，榮譽，財產，方能得到保障；去改革牠就是等於放棄了他們的美麗的祖傳遺產。聽到這套言論，有的人要以為在這個制度之下，這個規則是由上而來的一種仁慈的待遇，且為下層民衆所愛戴；然而其事實則是那樣，當於地主的權利思想很愚蠢的將牠放大了時，他的責任思想差不多失蹤不見了；這種制度已變成爲可怕的壓制，並且人民對牠毫無信任，怨聲載道。(二五)

不祇於那開墾土地的農民是那樣的受了限制，就是土壤本身也是受了桎梏——凡出賣及開墾均受那已竟成爲悖理可笑的封建限制所羈絆。在老制度之下，這三個階級——貴族，城邑之公民，農民，——都小心的自守於自己的階級。由於伏於這整個的現象下面之理論所生的規則是：貴族一定不能從事城邑公民所作的職業；公民也必須與農民分開；由此，為達到這種目的，所有這三種階級關於他們掌握土地的權利必須受一些縱橫密佈的限制所管束。在這三階級之間樹下了各式各樣的障礙。很大塊的田地任其荒蕪，因為那般高貴的地主們沒有資本去耕種牠們，但是仍然不許出賣；大量的資本均閑置不用，因為那些曾經積聚了資本的城邑公民因受法律及習慣之拘束，不許他們向貴族所有之田地去

(二五) 關於普魯士的農民的情況，及德意志一般的農民情況的很清楚而詳細的敘述，看Häusser, Deutsche Geschichte, vol. iii, pp. 123 及其以後諸頁。

投資；商業呢，也遲滯而不活動，並且許多年青力壯的貴族們均遊手好閑，因為他們一定不許經商。所有這些個及與害物有關聯的種種弊病現在大部分一掃而光，但並非未遇反對；政治哲學家及演說家們想提出之理由充滿乎空氣，以證明這些改革之邪惡與危險；朝廷之貴族，軍隊中之高級將領，及地主們蜂然而起設陰謀詭計反對改革；約克 (Yorck) 將軍，為當代最好的最有力的人物之一，宣言道：新辦法離乎常規令人可怕。但是石太因堅持不移，並且本着上諭努力推行，在三年之後，一八一〇年聖·馬丁日 (St. Martin's Day) 卒從普魯士三分之二的人民身上將鎖鍊擊落，普魯士統治下的農奴乃永遠絕跡了。(二六)

以上這段不過僅僅是說：關於一八〇七年所頒佈的這個將普魯士全部的農奴都變成自由人的偉大的上諭和關於以後所制定的補助這個上諭的法律——凡石太因的各同僚們及輔弼們，特別是哈敦伯，阿耳敦斯坦 (Altenstein) 與施香 (Schön) 也應記念不忘才對。他們對於所有這些個改革也曾給過長期的艱苦的努力。他們曾經從他們的時代中取得了那個較優的思想並且使之成為有效果的體制，但是將他們那樣所生出的東西給以生命，和將他們的主要意見用力向國家的頑固守舊的勢力推行——先向國王推行——的令名當首先給予石太因。別人也像他一樣見到普魯士的衰毀的致因；別人對於計劃這個偉大的復興也曾貢獻有很可寶貴的意見；但是惟有石太因所貢獻的：是，將那必須達到的目標看得最為清楚的一副眼光；是，抵抗威脅，衝破所有的障礙的勇氣；是，由模糊之信仰及志願而生出了智力，由此智力發展出來基本合乎憲法的法律；是，他的比德國的別個政治家都強的道德力量，提高全人口四分之三的人民的地位，給他們一種對於國家的新興趣，和對於國家的福利的感覺，這個是在普魯士邦從前所從不曾知道的，這樣來，才對於啓發國家精神有極大的幫助。仗着這個精神才命定了在一八一三年的自由戰爭，在一八六六年的德國統一之戰，及在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才將每件東西均拂刷潔淨。

(二六) 看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ichte, vol. i, p. 281。

我們可以不承認石太因的這些貢獻，說他的根本思想是由亞當·斯密斯 (Adam Smith) 來的。這種說法是對的。我們不能否認亞當·斯密斯，像他那樣的深透的思想家，對於解放普魯士有大關係；不能否認他對於推動普魯士解放的思想列車曾加過動力；但是這個絲毫不足以減低石太因及與他一同工作的政治家們的光榮；且更有甚者，他們更應得到一種榮譽，就是由於他們的認識，發展，和推行這位偉大的英國人的思想方得證明這種思想的福利不僅散佈德國並且散佈於全人類。(二七)

二

石太因現在正起始作另一件偉大的工作，就是去改革城市政府。農奴的解放，大部分要歸功於一種改革精神，這種改革精神在一般的思想方面是由佛祿泰爾 (Voltaire)，盧梭 (Rousseau) 和他們同輩們所掀起的，在經濟學方面是由於亞當·斯密斯所掀起的。而城市的改革特別的是石太因自己的。市政需要改革，無疑的為許多人所共曉；促進這種改革之良策，亦可為少數的幾個人所明悉；然而其足以使改革生效的辦法則是石太因隻手所成。

這個制度，自從石氏時代以來對人民造福非淺，其主要原則與英國的制度很相似，但其不同之點也甚大。牠恰恰與法國制度相反，法國的制度是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給法國硬籬上的。像席雷 (Seely) 很公正的說過的：『法國革命是由上而起，創出一個全國中央立法議會，並給此議會以全權，城市及地方組織一般的看來其所有的生機均被剝奪，故各縣縣長及各市之市長們僅僅是一些由巴黎之中央政府所任命之奉公守法之官吏去執行首都之命令而已。』石太因的改革是

(二七) 關於 Adam Smith 的影響所作之很完全的討論，看 Roscher 在 Berichte der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1867) 中所作的；關於 Smith 對於石太因的影響，其細緻的敘述，看 pp. 5, 6。因為很明顯的 Roscher 將 Smith 對於德國的一般思想的影響故意縮小了，所以他所承認的斯密斯的功績愈更令人信服。

由根底入手，給城市以自治政府，訓練牠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訓練牠們監督自己的官吏，訓練牠們自己負責。同時也要使中央專制政體強而有力，他的最大的努力是將全國一般的公共生活恢復到合適地步：由於他的第一個改革，他曾將農奴們變成爲一種人，此人能夠感覺到在國家之中要共分責任與共享利益；由於這個新的市政改革，他曾設法使城市居民參加公共事務。

歐洲的老城市制度在數世紀之前，曾爲發展文化的重要機關：基佐 (Guizot) 宣稱，城市是由羅馬到中世紀的主要遺產；毛勒 (Maurer) 認爲城市庇護了宗教改革。羅馬帝國是由許多城市造成的。當於，除了教堂之外，所有別的東西均被掃滅之時，並且鄉村的村區都荒蕪了時，這些城依然存在，並且老文化中的許多好的部分也藉賴着牠們而得繼續存留，並且城市有一種功能，這個功能對於促進新的事物是有很大力量的，城市得以保存，所以這種功能也因而得以保存了。城市從封建主們的手中努力的爭取權利，爭得一種權利之後仍繼續再爭；城中的貴族與名人們與離他們甚遠的皇帝或國王聯合一氣反抗那些與他們有直接關係的站在他們上面的有封地的壓迫者；當封建地主們需要錢款去參加十字軍時，城市供給他們錢並以此錢買得了權利與特權。由於中世紀的商業，許多的城市均發達的很堂皇壯麗，特別在意大利及德意志；但是沿着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的發斯科·達·加馬 (Vasco da Gama) 的通路將與東印度的商業從地中海撤去大半；這些個商業城市，不僅在意大利甚至在德意志，有一個時期也失去了很大部分的繁榮。（譯者案：加馬於一四九七年發現此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路以後五年。）

在宗教改革時期 (Reformationszeit) 許多德國城市又恢復了力量，並且對新思想表示歡迎，在德國北部及中部屬於領導地位的各式各樣的改革者們都以大城爲避難之所，在這些城之中他們得到保護以與教皇及皇帝對抗。斯馬開德聯盟 (Schmalkaldischer Bund) 曾努力的去發動一切力量去破壞市民自由與宗教的自由。我們曾見到各領地的王子們憑仗着一個包括許多地方的邦聯以與好戰尙武

的城市相聯合；但是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毀壞了許多城市的中心，並且將牠們整個的威權也給減小了，於是，在一六四八年的維斯特法輪條約（Westfälischer Friede）之後，各王子的統治勢力乃大大的擴張了；僅僅少數較大的城市方能抗拒他們。

特別是政治自由，就是市民參與公衆事務之權利，在普魯士漸漸的消滅不見了。強有力的霍亨索倫（Hohenzollern）族有時本可以利用地方自治政府，但是他們一般的作風都是蹂躪且廢棄地方自治，事事均愈來愈傾向中央集權，到後來菲得利大王的天才與其絕對的大權似乎將與城市獨立有極關重要的一些最後存留的觀念也從人心中給卸除了。比較着說，單個的市民是毫不算數的；在本質上說，單個市民竟成了一個寄生物，他寄生在一個國家之中，此國的真生命全集中於皇帝之腦。因此而生出一種結果即無論誰如果在鎮市當權，他們的工作均衝突矛盾：這兒有一個各式各樣的自治城市的混合物，在牠們之中有皇家徵稅行政官，市鎮的領薪金而不負責的官員，行會，特權，風俗，習慣，例外的特免，禮法。這一套東西將市政府的整個組織攪的麻木不靈，除非像偉大的選帝侯菲得利大王那樣的天才當政方能衝破這些束縛。住在城市中的公民愈來愈不將公共事務當作他們自己的事情了。（二八）

普魯士的城市的活動竟減少到這種地步，雖然有各種樣的行會，會社，和具特權優待的人們作為名義上的主權人，然而那些領薪金的官員大部分則是軍中的老弱無用的人。試想，從普遍的國難時期，從像這羣人們所構成的市民階級及農奴遍野的農民階級的國家中還能有什麼希冀呢？一般對於普魯士及德意志之崩潰像似漠不關心及在勃蘭登堡門對拿破崙之喝彩，那還有什麼驚奇呢？

對於城市組織中的這一堆不合理的事實，石太因已思慮多年了。別的愛國的官吏對於這個也曾加過思考，到最後，在普魯士東北角的極遙遠處，正當可怕

（二八）關於 Grosser Kurfürst 及 Friedrich der Grosse 有時行為與這些城市特權，或者，如他們所稱的，【權利】，相違的明澈的敘述，請看 Tuttle, History of Prussia。

的危難期間，他們之中出來一些人爲他們自己的城預備一種自治政府的試行計劃。這種計劃大部分是受石太因的影響，不久就發展長成爲一種臨時的制度實行在各類各式的人附近的市鎮之中，並由於石太因的暗中建議，後來，這個計劃乃被送到國王。自然的，國王把整個的這件事又送還給他的偉大的大臣（指石太因——譯者）。石太因對於這個計劃直接的並且努力的去研究，由牠且發展出一種制度，牠不僅可以應用到那些曾經願意去實行牠的城市，並可用之於普魯士的一切市鎮。就這樣的，大部分是由石太因的指導，在市政改革方面乃成形爲偉大的市政條例。

由於這些個條例，普魯士的市政混合物乃一掃而光。市鎮乃分爲三等：『大城』，住民足一萬及一萬以上；『中城』，住民足三千五百及此數以上；此外均爲『小城』。每城均自己選舉其官吏，並且在所有的城鎮之中居民在八百之上的地方便可成一區，以下再分坊，每個均自有地方權。

一般的情形是，凡具有不動產或別的產業與本地方有直接可覺得的利害關係的屬民均認爲是自治地方之公民；但是兵，猶太人，門腦耐特派的教徒（Menno-nite）（譯者案：是福音主義的基督教新教徒之一小宗派，其領袖爲 Menno Sin ons，一四九二——一五五九。此派之信條爲濯足，僅與同派教徒通婚，對於暴行不加抵抗等。）及犯人均除外。長官及城鎮代表，照例是由市民議會選舉，議員數目由較小的城到較大的城是由二十四到一百。每個選舉人必須親身去投票，設若繼續不理這個投票義務必受到褫奪公民權的處分。議員中三分之二必須是居住在當地的家長。議員不領薪金，並且以他們與選舉他們的公民間之關係而論，在理論上他的每個人所代表的不是行會，不是坊，也不是各種較小的利益，而是整個的城。此點頗值注意。城的領袖是一位無薪水的市長，在他的周圍是一小羣議員，有的有薪，有的沒薪；僅是那些靠薪水的官吏才真正的以此爲業，將他們全副心身用到官事上。

市長由公民代表選出，再由代表國家的執政者之批准；但是在各大鎮市中的

正市長 (Oberbürgermeister) 則是由城代表之三人中由國王指定一人。這種制度之發展有許多方面頗值注意。現在就以最近的柏林歷史作個具體的例子。柏林或者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城市了。當此城之正市長一有空缺，那些被選出並且送到國王請求批准的人們都是在別的城市行政事務上顯出特殊才能的人，其中有的人竟從距離都城很遠的地方而來。我真是有好的幸運，曾知道有兩個柏林的正市長均是這樣選出的；二人均出類拔萃，更特殊如此的是其中有一位竟成爲並且繼續在皇家議會中成爲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一員。正市長在位期，實際上只要品行端正便永遠在位，薪俸甚高，住宅優適，地位榮崇，有退休金——像這樣選出來的人，先由選舉人選，最後又由國王挑選，自然可以希望的能够把他全副身心均放在城的公共事務上了；這是他整個的事業，他將一生的希望與野心都注入在這個事業中了。從這個大都城的偉大堂皇的發展上，吾人可以看出這個制度的結果：每件事務均是細心想出；每件事務均是按着商業原則管理；並且所有的這個城市的事業，由市民會議的幫忙，凡事均安安靜靜的處理，既有效率且又經濟，其管理之善在美國城市中亦可說是很少見過假如不是從來未見過的話。

在石太因所立的法令之下，這些城市的官吏一般的任期都長，由六年到十二年，照例祇要品行好都是繼續在位。一般的說來，每個公民按着法律都應該不領薪的服務六年，然而，如果有充分理由，在服務三年之後他可以請求允許退休。國家官吏，教士，大學教授，校長，執行的醫生，大部分都被免除去執行國家職務，但是別的市民如果拒決服務則要以褫奪公權及罰金爲懲。

在一八〇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石太因的計劃成了法律。有一點在現在看頗爲刺目，覺得牠是荒謬的，並且其主點現在已經不存，就是猶太人，門腦耐特教派的信徒和兵士均列在犯罪人一起均不適用於具有公民資格；但是另外還有一點看着也像似很可驚異，此點特別對於美國政治有興趣的人很值得細細研究。茲述如下。

按着慣例，普魯士的城市公民，他必須是一個在社會上有一定的並可感到的

利害關係（即指產業——譯者）的人。在歐洲古世紀，中世紀，以及近代的城市政府在理論上及實際上均通行着一個原則：每個城均被認為是一個會社——這個會社有事務去辦理，有產業去管理。現在文明國家處處通行一種原理，即：權分兩種，一種是所謂的公。民。權。及。政。治。權，另一種是所謂的市。政。權。公。民。權是享受人權的保障之權，政。治。權是參與一般公共事務之權。市。政。權是對於管理城的財產及決定城市行政的積極參加的權。關於市。政。權，一般人都覺得人民行使此權時，及請他管理和執行這會社的事務時，他在此會社之中一定要有些明顯的『底注』（即產業——譯者）。我們在美洲曾試行一種與此完全相反的制度。在我們的城市會社之整個的行政，我們應用普選制度，結果，在我們極多的城中不祇是不熱心公務並且還玷污了這種權利。在大的海口城市令我們最不滿意，因為在此等地方進來的人口極多，他們整個的生活都不適於他們去執行公共職務，他們沒有那一類的訓練，甚至沒有那一類的經驗足以使他們宜於管理市政。在石太因的制度中承認無產階級和在城中有產業的人們之分別，這種分別在人類歷史中有很深的根；並且除非等到在某種程度內也考慮一下這個區別，則比我們大部分美國現存的城市更好的制度似乎要永遠不能出現。這個區別是愛自由人民的歷史中所表現出來的並且是建立於公正的基礎上的。

這個意見是：公。民。權是每個人必須一定有的，因為牠具有天然人權的保障；政。治。權要分佈愈廣愈好，因為此權是參加一般政治管理的工作；而市。政。權則應當給那些與市政有實際及直接關係的及對於此事具有可寶貴的經驗的人們去負責，因為這權是對城市建議一些具體的新事業及管理市政，這大部分是一些實用的具有商業性質的事情。有一個基本法則似乎可以使政治權公民權及市政權兩方面都能得到完全公平而十分寬宏的妥協。這個法則所要的是：凡人口超過某種數目的城市要有一個市長和市參事部，這些參事每人均代表這整個的城，他是由普選而來；但是統治部的人員則是由直接納稅人選舉，凡關於財政的一切分配及與管理公共產業有關的一切問題，和對於選舉權之一切授予都必須經此部投票贊成

方得施行。

石太因所提出的制度正足以應付我們的希望。 貴族們及老派的官吏們誹薄牠嫌牠太急進，甚至說牠有過激急進主義 (Jacobinism) 的意味，況且在初作時又有很大的令人失望之處。 市中之人民在起初都表示並不渴望去參加這等事；他們早已對公事冷淡，漠不關心，寧願仍照舊樣，並且這個新制度也增加了費用。 但是石太因澈底進行，並且因時間之演進，此制度乃產生了石太因所希望的效果；城市中的人民起始對國事感到趣味；起始去思索牠們；在一代之後，起始在普魯士議會中積極參加工作，又過了一代在德意志帝國議會中也是如此的積極。 普魯士和德國的市政制度實在的是自石太因時代以來方有很大的發展以應付新的需要；牠的柱角石，在彼時與在現在一樣，是本地人計劃和實行本地的利益之權利。

有一點頗可注意，當這個觀念在這位偉大的德國政治家所想出的改革之法令之中如此的成形之時有一位美國大政治家竟注意到牠了，並且在美國也把牠推行了，因為牠曾給哲發孫 (Thomas Jefferson) 以很深的印象。 在他老年時他常常注意到對於處置內政外交的各種問題的一般民衆的力量。 這些問題與南部各邦相比，則南部顯然的對此殊為漠視，並且他認為這個力量之產生當歸功於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城的人民集會。 他宣稱：當民主黨人與聯邦派相鬥爭之際，當於新英格蘭的全城集會反對他時，他覺得土地在他的脚下都顫動了，而倭金尼亞 (Virginia) 邦的各州 (County) (譯者案：我國通稱美國的 state 爲州，但在此處有 county 一字，將此字如譯成省則與 province 同義，如譯爲縣則 county 之範圍似又比縣爲廣，因此乃譯爲州) 議會並未能給其足以與此人民相抵的力量，(二九)可見人民之力量是多麼大了。

(二九) 特別請看 Jefferson 給 John Adams 一信曾提到這個，該信見於他的較近的來往書翰。關於普魯士與德意志一般的市政府與行政的清晰而透徹的敘述，請看 Albert Shaw 著的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Continental Europe；第五章；及 W. B. Munro 著的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an Cities；第二章，這二著作或其中之一凡住於美國城中的每個肯深思的居民均應閱讀。

曾有人堅執着說：哈敦伯（時而是石太因的朋友，時而是他的敵人）對於發動普魯士，其實也是發動全德意志，的再生工作所佔的地位由起頭到末尾都是很大的，並且有時還是立於指導的地位。這話是十分真的，哈敦伯因為他在國家服務期間較石太因為久，他的工作又偏於外交方面，而同時石太因又是向來不肯妥協，所以他可以有石太因所沒有的機會。不過，哈敦伯沒有中心信仰，他有一個也許是比較強的信仰就是信仰自由貿易與自由製造。而石太因便不同了，那是石氏他由於其精力，大無畏的精神，及技巧，並且超乎一切的是他的品格之受人愛戴，才將基本的改革變成爲法律的形式，才在不喜歡這樣作的國王及漠不關心的人民間將改革實行出來。

當於推行這些急需的重大的改良使普魯士走上一個較好的階段時石太因對於散佈於各地的小的貪污也是一樣的澈底清除。固然這裏仍有許多封建餘孽就和二十年前將法國農民逼瘋了的餘孽是一類的東西；但是石太因不學着那克賽爾提的樣子（Celtic manner）用火與力去反對他們，而是細細研究每個癥結以理性處理之，這裏沒有陷於混亂及黑暗的野蠻的暴進，不過祇是將每個罪惡的餘孽對準牠的劣點予以處置就是了。（三十）

石太因及其同僚所見到的是那些範圍廣大較比普遍及較比有力的改良而不注重細節。現在在普魯士起始了一個新的世紀就是對於德國教育之改良。對於整個的國家教學注入一種新精神；起始是遲慢的，但無疑的是較比更有力量。雖然石太因所注意的是一個不同的方面，但是在整個的運動中都能感到他的影響。在一百年前陶馬秀士（Thomasius）所創辦的老普魯士的哈勒大學（Universität Halle）曾給普魯士造出許多有力量的人物，牠因為拿破崙在梯爾西特（Tilsit）的大搶劫也失掉了。但是這個災殃是偉大的收穫之先聲。有思想的人乃起始爲柏林計劃一個大學。有號召力的人被召請去爲此大學之教授。大

（三〇）關於應用在這一堆苛斂的改正方法，請看前面已提到的，Pertz的書，第二卷，第一百四十二頁以下。

學不是由磚與泥灰所造成而是由教授所造成的原則在這兒是完全被承認了。在美國有種很強的主張，反對將尚未得學位的學生送到大城去就學，石太因也有這種夙好；但是用新的教育中心地以已經刷新的教育制度去傳佈新鮮而有力的生命之重要性，石太因却很認識，並且他所作的活動對於啓發這個偉大的運動之助力也很大，這個運動是註定的要作出種種不可思議的事，不僅遍及於普魯士並且遍及於全歐洲。（三一）

現在立刻就要看見石太因實行所有這些偉大的改良事業其在職之期不過僅一年有零耳。假設他有比這更多的時間，無疑的他要創出一個國會。但是像我們就要見到的，命運反對他；他與拿破崙之鬥爭及他失敗後之反動將各代表機關之產生耽擱很久。然而到後來牠們到底產生了，牠們有了政治經驗以爲基礎，但這個大部分應歸功於石太因。這曾是我的幸運，當現在存在的主要的議會正開會討論之際我也曾在場，這些議會有：英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德意志的，我們自己的；並且以下列幾點來看：安靜的，通澈的，謹慎嚴肅的討論，不受黨人狡狴策略之縛束，及煽惑人心的政治領袖之演說的縛束，我以為在普魯士王國及德意志帝國的國會似乎可以在最前進的羣中佔一地位。我的信仰是如此，在牠們的前途有個偉大的將來，並且牠們特別之所以如此者是因爲牠們的根是從自治政府之原則中吸取生命，而這個自治政府是由石太因所推行的。

當於爲較好的城市制度立基礎時，石太因是必須要對軍事制度立刻的，直接的，並且緊張的也加以思考。在菲得利大王指導之下，老普魯士的陸軍會爲世界上一個奇蹟；並且牠的優越之點都成了大西洋兩岸的軍事正規教義了，但是最

（三一）關於石太因與哈敦伯的功績，請看 Zorn, Im Neuen Reich, 第二百十六頁以下，該文所作的比較是很用一番心思的。關於石太因與普魯士的教育運動的關係，看 Pertz 的書卷二，第一百六十二頁以下；及 Kuno Francke 的 Social Forces in German Literature。關於大學生活與愛國心的關係從來所寫的最好的書大概是 Paulsen 的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卷四。

盛行的還是在普魯士。不過普魯士的領袖們並未加改良。雖然由於國家的感覺及由於人權意識之醒悟而顯示出來一種新的力量，並且把這種力量已灌輸到軍隊，像在法國革命所見到的——雖然拿破崙將新的見解與生命注入到軍事學及軍事操練之中——但普國領袖們不管這個仍堅持舊制，以此自炫並且以此嚇人說要用牠打倒拿破崙。

但是自從大菲得利在歐斯巴何 (Rossbach) 征服邵拜斯 (Soubise) 以來，事情已經變了。在新革命時代法國的兵士覺得他們是一個偉大的共和國的一個公民並且是人權福音的傳佈者，與前世紀的那些可憐蟲們迥乎不同了。以往的那些可憐蟲們被送到戰場去死是由於陸瓦 (Louvois) 的陰謀或龐帕度 (Madame Pompadour) 的偶然之念所要求的。而法國的元帥們在民主國或帝國各種戰陣中所訓練出來的與可憐的邵拜斯所訓練出來的太不同了，而拿破崙的命令實在的與路易十五 (Louis XV) 所發的也是不相同的。

所有這些事，在德國均不留意的過去了，並且差不多費了兩世的工夫所建造成的，整個的普魯士的軍事組織竟在耶拿 (Jena) 崩潰了。這個事實是這樣，以任何現代的標準來判斷老的普魯士的軍事制度，都覺得這個老制度已經有了毛病。這個老制度所表現的專制政體的致命的缺點與在民事行政上所表現的是一樣；天才如菲得利大王者可用牠作出奇蹟，但其繼承人則不能運用牠去作任何好事。

除了很少的例外，官吏都是由貴族拔選出來的。平民當然也有軍事才能及對功業的野心，然而在實際上均被排除而未被注意。陞遷以服務年限或寵愛而定；家世勝於勞績；官吏中較好的那一等人們自炫淵博，不求長進；普通的那一等人們都是愚昧無知；不是從農人的家庭扯出來的農人之子弟便是從大陸各城中所來的廢物，募兵官們把這些人們雜亂的集攏在一起；所以當兵這件事業毫無前途可言——普通的服兵役期間是二十年，但無陞遷，且常常使用降級及污辱的刑罰；一個小小的中尉就可任着自己的忽然之怒氣用棍子打一老兵，並且打的原因

也不過是放錯了皮帶或是破了一個鈕扣等小錯。

這整個的是一種有組織的不公正的制度。這種不公正對於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均有關係。這種不公正正在菲得利大王時代尚算不了一回事，因為他的人民認為這是一種不可免的自然的東西。但是公正的思想現在已佈滿於空氣之中了，且甚至於到了德國農村的泥屋中了。農民階級納大量的賦稅，並且也是主要的血的貢獻者（譯者案：指當兵）；中產階級也荷負很重的擔負，但所有軍事的榮譽都沒有他們的份；作苦工最多者得榮譽最少，得榮譽最多者作工最少。區，市，人，所享受的免除賦稅，兵役，或其他的特權——這種「免除」在某一時尚有些理由，但現在沒有了——除了對於一般人的不公平之感覺更添波助勢之外沒有別的用處。此外還有一個不公平之點就是代替制度：富人的子弟可以用錢代替各種義務，而窮人的子弟則不能逃避。軍隊組織中的那一大堆老的特點均像神聖似的保存着——如拘泥循禮，軍官的峻嚴主義及殘忍；惟一奇怪的事是兵士們受着這樣的待遇與訓練竟不將他們的國家當作最可惡的仇敵。

在耶拿（Jena）戰爭之後第一個感覺以為有些人們曾做下了大錯，但不久就明白過來原來是每個人均鑄了大錯。代人受過的人自然是找到了，並且他們是即在目前並且非常之多。全國普遍的要求是：第一步要懲罰那些不熱心的，無能力的，醉眼矇矓的，無精打采的，懦弱的官吏，他們有時尚未交鋒便放棄了重要的命令，礮壘，城市。許多人受了責辱；有些人被裁判去住監獄或受死刑；但有思想的人不久就看出來這個毛病的根基較深不是責辱或裁判所能解決的，於是有很多人搜尋這場禍患的原因，但在這些人中以石太因研究的最為深透。由於這個研究使他去提倡種種辦法，打算去發展出來一種人民，一種不能夠再把他們當作像『不能發言，可以任意驅趕的家畜』的人民。

目前需要的是軍事改革：整個的軍事組織必須從新另造，並且要立刻就辦。為實行這個改革石太因有位最好的可能的同志——沙恩荷斯特（Scharnhorst）；並且在沙恩荷斯特的左右是一羣特別能幹而愛國的人，如格耐色瑙（Gneisenau）

及栢茵 (Boyen) 及格樓爾曼 (Grolmann)。

自羅馬的最好的時代以來現在的德國已到了最壞的時期，沙恩荷斯特像是專為應付這個最壞的環境而生；他是一件神聖的禮物，如同在法國之可怕的困難時期的卡爾竊 (Carnot)，如同在我國（指美國——譯者）之黑暗時期的林肯，施坦吞 (Stanton)，格蘭特 (Grant)，余爾曼 (Sherman) 之對於北方或李 (Lee) 將軍之對於南方一樣。他的眼光甚寬嗜好很簡單，很快的就能洞察要點，堅決，不腐化，並且最重要的是他對於國家之鞠躬盡瘁。他是農人的後代所以被他左右的一羣普通的官吏所輕視。更甚的是人們均認為他是理論家；他的真價值很少有人知道，——但在這少數瞭解他的人們中有一位是石太因。

對於他的再建新軍的計劃，他不僅是用了他的心智，而且還放進去他的赤心與靈魂。一個計劃挨着一個計劃他細心的推敲討論，他的計劃有：重建新軍，成立預備軍，發展民團；所有這些均遇着很大的困難，——如國王之遲疑不決，拿破崙之猜疑，國家之窮困，及有勢力的人因為自私自利和恐懼改變而與老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情性。

沙恩荷斯特的整個制度的基本觀念是：每個公民份所當然的必須去保衛國家，「特免」必須減到很少，不許代替；國家可以在牠國土之內索求一切才智技能，據此，則每個青年均有當兵的責任；軍官與兵士之陞遷不是根據人情，家系，而是根據功績，勇敢，品行。訓練外國人為兵士的制度已被放棄：僅僅在很短少的時機一個外國人方可被允許服兵役。沙恩荷斯特與石太因的計劃是：軍隊必須是為整個國家而設的學校，——一個為兵士與公民所設之學校。這個整個的軍事制度之種子在彼時已開始萌芽。同時入伍兵制，後防兵制，後備兵制（譯者案：後防兵 reserves 是在戰線後準備之兵立刻即能向前線開發增援者；後備隊 (Landwehr) 是已服滿兵役規定之年限，平日除偶爾操演外並不入伍者。）及戰爭時之義勇軍 (Landsturm)，像在今日所存在的，在彼時均起始顯現了。

但是即刻將這整個的意思施行出來是不可能的，因為拿破崙的間諜到處皆

是，德國稍稍表示一點恢復獨立與自由的渴望他立刻便注意到，其感覺之敏銳真是無人能及。德國此這種運動是德意志求自由的感覺之一表現，是由西班牙之興起而惹起來的。拿破崙見到此點，乃強迫普魯士又訂一新約，即梯爾西特條約 (Vertrag von Tilsit) 之一副約，在一些可恥辱的條件之外又加上一條限制普國陸軍在四萬五千人之內。

應付暴政的最好方法是用詭詐手段。所以老制度的許多外表都必預保存着用牠去遮隱真像。現在普魯士所用的手段是：凡兵士經過澈底訓練之後就給他們假期令他們離開軍隊，又另招新兵以補其缺，這樣來則所有的普魯士的青年人都可經過軍隊的訓練了。每件事情都要設法避免法國間諜的鋒銳的眼光，好幾旅兵士去演習而將很健康的人留在營盤中或醫院中，到後來，在名義上軍隊的數目是四萬二千人，但在實際上沙恩荷斯特已竟訓練了並且鼓舞了十五萬人。

雖然如此，仍然因猜疑而遇到種種困難，這些猜疑不止是起於法國而也是起自普魯士人自己。神經過敏的人，無耐心的人，輕浮的人，不斷的難免有造成大災難的危險。自私與偏見也是很活躍的，個人及家庭反對新制度的影響力有時也是重大的。軍隊中例行公事的人們都憤怒的反對沙恩荷斯特，並且稱他爲『校長』(三二)以表示他們的對他輕視之深度。

國家的貧窮也是一個大的阻礙，在施雷仙 (Schlesien) 的礮隊，因爲拿破崙的巡撫們把他們的火藥給携走了，以致有數月之久不能作有效的演習。有五年的光景，沙恩荷斯特一位最磊落而坦白的人，曾經拐彎抹角的，像一個被搜索的罪犯一般隱藏他的計劃與行動，直到國王受拿破崙的壓迫去侮辱他時爲止，實際上就是他辭職時爲止。

但是這個偉大的工作在彼時是不能停頓的，並且對於這些起碼的工作，不僅是由於在萊比錫 (Leipzig) 及幾年之後在滑鐵爐 (Waterloo) 所得到的光榮，均

(三二) 關於這場鬥爭的最有趣味及最有啓發性的細節，看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第一編，第二章。

要歸功於他們，就是在度浦爾 (Düppel)，沙道瓦 (Sadowa)，聖·浦萊瓦特 (St. Privat) 及獅丹 (Sedan) 所得的榮譽亦應歸他們。沙恩荷斯特本着石太因的建議與鼓勵，就那樣的開始造他的軍事制度，此制度後來由毛奇 (Moltke) 與羅恩 (Roon) 將牠完成。

但是當於石太因很堅決的並且懷着滿腔希望站在他的偉大的同僚之旁給國家以希望，並且立下抗阻拿破崙的計劃時，他仍然將全身心用在市政制度及改組一般行政上面。他曾採取各種辦法去取消各種壟斷——磨的壟斷，磨石壟斷，屠戶，烤面包者，小販壟斷及許多別的樣子的新壟斷。並且也曾盡力之所能及把所有的阻止婦女參加各種商業及與她們合適的職業的攔阻物給連根拔除。他的主要的力量是用在行政改革上。這個在許多方面，是所有的工作中的最偉大的工作，然而他在職的時間太短竟不克將牠們完成。

普魯士的一般的行政與其餘的一樣已竟變成混亂的東西，有好幾個會議，議事廳，指導部，部，內閣，行政大臣，土地大臣，這個大半都是按照着已經腐敗的需要及觀念和按照着那些拙巧有機會坐上皇座的人們的胃口及其偶然的興致而工作着。一個有力的國王如菲得利大王他做的事大半均用不着這些東西；一位貪樂縱慾的國王如菲得利·維廉第二讓這些東西亂紛紛的蹣跚而行如負重物，中庸的國王如菲得利·維廉第三在這個叢林之中竟不能看清他的道路，他不知有別的辦法祇有依靠着一小班嬖人，並且對任何應決定之事均盡量遷延設法躲避。

地方行政其性質與此相同。從這些個東西之中石太因發展出來一些個比這個較好的制度。他不試着去突然間改變人民的性質，無論什麼東西只要其中含着有益的分，他努力保存牠，並且特別的他想恢復一些菲得利·維廉第一所介紹進來的東西，這些東西在菲得利大王的影響下早已看不見了。

在他指導之下所起稿的上諭，是本着他的提議給整個的行政以最大的可能的力量與活力的，可是同時還與中央政府發生直接關係。這個計劃造的是很仔細而合乎邏輯；整個的說是很大的，在細點上是很準確的，牠將石太因的經驗均集

合在一起了——他的熟悉人情，他的勇敢，他的謹慎均應用在這個計劃上。

在所有的這些中的第一步是產生一個國家諮議會。牠是由皇室，大臣，傑出的樞密院顧問官，已去職的大臣，司長，部長們之中選出來的合適的人們所組成；但是其中有一個改變比這些個遠較重要，這個改變在現在看是非常的簡單，但在彼時則幾乎像似不可能，——就是指派幾個大臣管理全國的幾種主要的行政。這幾個大臣主要的是屬於內政，財政，外交，軍事，司法；並且用另外幾個有經驗的官員組成一個內閣去決定各種重大及一般的事務——同時又與國王成立一個諒解，就是在內閣與國王之間不能有嬖人黨存在，這個在現在看來是天經地義，但在彼時則似乎是虛空怪想。自石太因時代以來現在又增添了好幾部，每部有一個領袖——如商務部，農務部，另外有一部專管教會，教育，醫務；但是石太因的簡單的制度，整個的說來，現在仍然存在着並且與他原計劃的是一樣。

因為德國歷史與法國不同，同時石太因也不願德國陷於混亂所以他不願按着法國革命的例子去作。他讓地域的分界仍繼續存在。他任用合適的官吏，每官吏各有其職務，這些職務的執行均以國家之福利為準，但是不能對新制度有所損害。地方制度的一般情形他也仔細的研究了，故一切改革均按着經驗與健全的見解而開始。石太因原本希望更深入到較下層的地方組織，但是他被逐出職位是太快了，未有時間去作。他的後繼的人曾試着去作一些下層地方組織工作，但在某些方面作出毛病，但在別的方面又改進了些；不過以整體來看，石太因所發軔的工作是偉大而有實益，並且這個制度竟發展的使普魯士成爲世界上管理的最仔細且最公平合理的國家，——當然，其中也有缺點——如干涉與統治的太多，個人創造的機會太少。但是，畢竟其管理的是出奇的良好。在近代，如果將這個制度加以比較將要成爲一個對於專攻政治學的思想家最有趣味的研究題目，就是一方面似乎主張「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多的政府」，另一方面在理論上主張「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石太因的目的想在整個的行政中保持統一，有生氣，和負責任。從他的信

札及論文中可以看出，他將來要提議一種議會制度，具有兩院；在此兩院之中將較好的國家精神可以應用在一般的國事討論上，及應用在專制政體的開明的傾向之支持上。上諭將他的計劃實行了。所實行的是以他於一八〇八年最後幾個月所能够發展的深度爲限。但是再想向遠處去發展便被一個災難所阻撓了。在這一整年之中，拿破崙努力的想從他的事業中的可怕的糾纏擺脫他自己。直到此時，他所征服的東西已竟比較簡單容易。奧國，普魯士，意大利均被置於他的脚下。他現在正試行一種征服西班牙半島的政策。在西班牙他一生事業中的第一個大愚蠢行爲開始了。西班牙是愚昧，腐敗，爲僧侶所操縱，並且牠是由許多政府所組成的極不堅密的一個集團，像德國似的。然而牠雖具有牠所有的缺點，但牠也是一個國家，並且牠所興起的反抗拿破崙的努力是反抗拿破崙革命的一個開端。在西班牙中每個重要地方拿破崙的元帥們均被敗挫，而在貝倫 (Baylen) 又遇一場大辱，在他的歷史中這是第一次他的軍隊之一部被迫而投降。在這半島上的葡萄牙這方面，其人民受着英國的援助，他也遇到了同樣的頑強的抵抗。這位皇帝的兄弟不能不從西班牙的王位上逃跑，到後來這位大戰勝者覺到他必須自己立在陣前去抵抗西班牙人民；雖然在某一期間他打倒了所有的反抗，但這個西班牙的革命給全歐洲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是：假如一國的人民如果能連合在一起畢竟能够排除掉拿破崙的暴政。這個思想在德國散佈的比任何地方都普遍深入。而在這些最深受影響的人們中之一便是石太因。

在他的市政改革，行政改革，軍事改革工作的中間，石太因以全副力量用西班牙的例子去影響其國中的領袖人物。特別是用信件，但後來竟有一信落在拿破崙手中。無論是誰，無論其人的地位有多麼高如果觸怒了這位大戰勝者，真是特別危險；但是石太因的危險到什麼地步，只有到最近才顯露出來。因爲在最後十年中，世界會得到關於拿破崙暴政，特別在德國，的一種揭示，這個可以使我們明白無權勢的專制的意義是什麼及石太因挺身去反抗牠時所要遇的是什麼樣的危險。在第二個法蘭西帝國時，有一個誇大的委員會被組成了，約在十九世

紀中葉，受拿破崙的最小的弟弟捷老每王(King Jerome)之子拿破崙王子(Prince Napoleon)所指導，這個委員會陸續刊佈其所謂的拿破崙信件全集。但不久就發現這個全集已經很謹慎的經過刪除，並且從那個時候起各門的研究者曾將那官家委員會所刪掉的信又都公佈於世。無限制的權力所產生的專制政體真是可怕到極點。這位戰勝者曾經認為凡對他的計劃或甚至對他的心願如有抗拒就是犯罪，其罪值得處死。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如何的曾命令翫吉翫(Duc d'Enghin)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受死刑，而他所犯的罪實在是無辜，並且拿氏是如何的命令女恩倍(Nürnberg)地方的書商柏爾穆(Palm)處死，祇是因為他具有一本簡單而高貴的小冊子；但是賴克斯特(Lecestre)，布魯東尼(Brotonne)和別人所公佈的這些信件告訴我們「殘酷」已經變成爲拿破崙作事的有力原則。特別是在他倒楣以後。

從這些信中我們見出這位偉大的征服者他雖將他的手足們放在數國的王位上但是他對待他們就如同是他的僕從一般——公然輕視他們，對於他令他們去統治的人民所應盡的責任他是一點都不認識。他給他們的信件所用的詞句常常是自尊的人向其僕從所不屑用者。在這些信件之中也有向他的駐在德國的司令們所發的簡單的倉促間所寫的訓令，這些訓令簡直是命令他們去從事暗殺。這是一貫的老套，當於皇帝的間諜報告說某人討厭令人可慮，便立刻回來一道具有實效的將冒犯的人處死的命令。在德意志及西班牙鎗殺這個那個不遂他心願的愛國志士是數見不鮮。但是殘殺最高表現是他給糾偶(Junot)的一封快遞的文書，拿破崙向他寫道：無疑的這位將軍已竟將里斯邦(Lissabon)解除武裝了，那麼『鎗斃，大約，斃六十人罷』(三三)。

就是在這種心況之下，拿破崙讀到石太因的反對他的信件，他的盛怒立刻變

(三三) 拿破崙因受人之反對而發雷霆的信件例子，可看 *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An. viii—1815); Paris, 1897, 並且特別是給 Junot 的信，第一三六頁。及 de Brotonne, *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Paris, 1898。

成爲恨憤惡毒了。在起首是稍微的有點掩匿真情，大概他是很想把他的犯人引到他的勢力可以擊到的距離。在一八〇八年九月八日在 Moniteur 報所載的關於此事的佈告僅僅是藐視侮慢。但是這是要對普魯士採取更嚴厲步驟的先聲。並且在三個月之後拿破崙從馬德里 (Madrid) 的營地發出敕令不僅將這位政治家置於德意志帝國禁令之下並且將他列在全歐洲犯法者之內。

這個敕令在一開端很輕藐的提到石太因的名字說『一個名喚石太因的人』，在這個敕令之後附帶着一個公告，這個公告說石太因所有的財產凡在德國及法國者一律充公，並且在結尾是一道命令『無論在何地，我軍或我們的同盟都可以逮捕他』。此上諭在德國各地張貼，甚至在波蘭。自從石太因的信第一次爲拿破崙所發現，石太因雖然一定已見出這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但他仍冒險而作不顧一切危險。他的心全置在關於行政改革的上諭上面，對於這個他以全力促成之，卒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國王被他所勸誘而簽字了。石太因遷延着不即去職以便向別的行政方面效力，直到他的家庭朋友都陷入全然的痛苦，敦勸他令他考慮自己的安全以及他將來仍可爲國服務時，乃在一八〇九年二月五日晚他坐着一輛雪車由普魯士出亡到柏門 (Böhmen) 的雪山中，並且三年之中日與窮置，疾病，痛苦爲伍。雖然仍繼續活動，但就世界一般而論，他是不再爲世所聞了。這個就像路德 (Luther) 在瓦特堡 (Wartburg) 所遭遇的一樣，其人格與影響完全被塗抹了。

石太因的逃亡對任何改革的事業均不算太早，這個簡單的事實是這樣，拿破崙認識石太因是個澈底瞭解他的政策的一個人；石太因知道那最末的細微之點，整個的經過，不僅是梯爾西特條約 (Vertrag von Tilisit) 就是拿破崙違反這個條約以及並非根據條約之保證而來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搶劫，他都知道。自訂這個條約之後德國不得不忍受拿破崙這些行爲。更有甚者，拿破崙看出石太因這個人，他的對德國的愛國心是不能克服的；石太因是一位看出拿破崙的征服制度中的可以進攻之點的人，當拿破崙在馬德里 (Madrid) 公佈反對他的敵人的佈告時必定也

早已見到此點——石太因還有一種天才就是他能將自己的愛國精神注射在別人身上。就是因為這個，拿破崙在起初曾敦促普魯士王任用他，因為他有理財的本領與天才，可以發展國家富源以供給法國兵用，而現在又使石太因成爲一個犯人，並且一定的，假如他能捉住石太因必把他處死。

這與普通的犯法情形不同，並且帶來一種結果，這位戰勝者預先並未十分看得出來。這個使石太因在德意志人心中佔一堅固地位，一個由他的廣大的勞力都未曾得到的地位。這個使他由皇宮直到農民的茅屋均認爲他是全歐洲的領袖。這個使呆者憤，庸者辯。關於此點在每個好的歷史圖書館都可找到一個惹人注意的例子。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樞密顧問官波爾次 (Pertz) 博士，他以歷史的深刻研究而顯露頭角，他是柏林王廷圖書館的指導官，他曾將他著的『施太因的生平』公佈於世。那是七部八開本的書，印的很密，這個集子加賴爾 (Carlyle) 將要譏謗牠說牠是魔頭槁如塵 (譯者按：Dryasdust 是一虛構的人名，言其 dry as dust，在此係指煩瑣無味的歷史家言) 的手筆。但是牠雖然太瑣細並且幾乎精細過度，但是牠表露出一種良善的熱心。通過這整個的七部書，這位博學的樞密院顧問官很約束自己；但當他寫石太因的歷史寫到現在這時期時，立刻在這整個的大部著作中迸發出流暢動人的憤恚。當他將拿破崙的上諭寫出之後，此上諭是在馬德里 (Madrid) 營地所發佈的，這位歷務家曾發表如下的感想：——

『在艾府 (Erfurt)，馬德堡 (Magdeburg) 及漢諾威 (Hannover) 法軍所駐在的各地點，人民讀到這個戰鬥宣言時都感到驚訝與憂愁，因為由於這個宣言這位在瑪倫哥 (Marengo)，烏爾木 (Ulm)，奧斯特利茲 (Austerlitz)，耶拿 (Jena)，夫瑞得蘭 (Friedland) 及圖德拉 (Tudela) 的戰勝者，法國的，意大利的，荷蘭的，瑞士的，半個德國的，整個的西班牙的統治者從其無數的同代人中選拔出一個無保護的人並且譏罵此人是他的生死的仇敵。但是由於這種盲目的情緒而生出來的辦法是不能達到目的的，牠走到中途距達其目的尚遠之際便要返過頭來去反對那

個出主意的人了。所以由於拿破崙的恨怒竟將他的仇敵們的主要的希望給揭示了出來。在當時，有無數的人是第一次讀到石太因的名字，但是這個犯罪的情形立刻給石太因的頭部周圍放上殉道者的光環。在德國的各部分中，所有的渴望自由的人們現在已得到了一位活的有生氣的領導者。他立刻變成了一個人物，對於他就是遠在普魯士國境之外的受壓迫的人民也都把他們的希望與希求寄放在他的身上；並且，這個地球上的這位最強有力的人（指拿破崙——譯者）在六年之後從『名喚石太因者』這個人果然得到了對於永恆的正義應當敬畏的結果。這位歐洲的罪犯（指石太因——譯者）的思想是從敬畏正義而生，後來這位百日皇帝到底對牠屈服了』（三四）

三

但是一個黑的帷幔遮住了這個報復的將來。地球上有權勢的，或法國人或德國人，認為拿破崙的這個憤怒之爆發的上諭足以摧毀石太因的整個前途。但是拿破崙的盛怒尙不是石太因所不能避免的遭遇中的最壞的；更對他的精神有害的却是德國的廷臣和貴族的反對，特別的是在拿破崙政權下當官的人們。這些人將那最刻薄的字句無所顧忌的向石太因射放。在朝廷及政府中的官吏們罵石太因為君主政體最壞的仇敵。這類罵法已成家常便飯了。拿破崙時時的根據那個認石太因為犯人的上諭攻擊石太因說他是過激急進主義（Jacobinism），不僅在普魯士並且在整個的德國。在奧國的首都，因為石太因抬高普魯士人民的較低的階級，更給這個攻擊增添了力量。他努力使人民要有國家意識，但他的這種意見竟有人認為：其危險性之烈比拿破崙的最壞的苛虐尤有甚焉；一大羣有勢力的男女用全副力量在各方面設法阻撓他的努力，並且有的人將關於石太因的事情都報告給拿破崙。這個更幫助災難的蒞臨了。席雷（Seely）在他的『石

（三四）看 Pertz, Leben Steins, Vol. II pp. 319—320。這是一個很惹人注意的事實，Pertz 當於讀到拿破崙放逐石太因的佈告時是第一次聽到石太因的名字。

太因的生平』中很猶疑的去相信這種現象，但是任何人讀到波爾次 (Pertz) 與特雷持克 (Treitschke) 的書都要相信許多的石太因的德國仇敵能够陷害他到什麼程度。

在這些人事的困難之中，他繼續不斷的圖謀樹立德意志反抗拿破崙暴政的方法，不僅這個，並且還舉行新的改革以加強民力以爲將來鬥爭之用。剛剛在他離職之前，他把他的意見作一總論呈給國王，這個在歷史上稱爲『石太因的政治約書』(Stein's Politisches Testament) 在這個總論中他清楚的說出他希望在整個的大廈之上加上一個立法的組織，並且用一個憲法來縛束這個結構。當他將農民由農奴改變成爲自由人，將城中住民由無關重要的人民一變而成公民，並且將整個的行政制度由一個破機構改到有力的活組織時，由此可很清楚的看出他的目的是想把老的普魯士專制政治變成有限君主，以一個全國之代表機關調和之，這個就像在普魯士四十年後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所成立的是一樣。

在當時那一期間，因爲拿破崙加給石太因這個不可饒恕的罪名，以致所有的這些個努力均化爲零：石太因所犯的罪是他檢查，並討論拿破崙制度中可攻擊之點，——亞克力士 (Achilles) 的脚跟。這是石太因，他，比別人都利害，在他給德國領袖人物的私人信中偵查並且揭示出來西班牙在一八〇八年起來反對拿破崙所含的意義，並且那是第一次給歐洲一種觀念，讓他們知道可以推倒拿破崙暴政的方法。爲應付石太因的這種行動，拿破崙絕不以爲僅僅將石太因逐出官位及威脅他的生命爲滿足，他的次一步驟是強迫普魯士訂一個新的條約，苛待德國北部人民比以先更爲悲痛惡劣。

在石太因出亡的期間，其實是在其全個的被逐於法律保護之外的期間，他不顧他家庭的毀壞，不顧命運是如何的威脅他，他依然如以往一樣，保持寧靜，深思，堅決。他認爲羣衆已預備好了去抵抗外國的侵略，並且人民急於獲求政治的獨立的信心毫未動搖。就在這種危機之中他寫道：“人民之精神極爲煥發；對於真正動人而且美麗 (wahrhaft rührend und schön) 的好動機，各階級的人

都普遍具有一種自我犧牲的虔誠而欣然嚮往。”他在麥輪(Mähren)及柏門(Böhmen)所過的三年，他把這段時光應用在最好的可能的宗旨上面：雖然沒大有喊大叫的活動，他仍然是那些要使他們國家能有一個較好的將來的人們所信任的指導者及顧問。他的無形的愛國心的影響一直的增長。拿破崙在一八〇九年與奧國的新戰爭現在很清楚的漸漸惹起來了。設而石太因仍留任在柏林內閣之中，歐洲的歷史路程要迥不相同。六年多的大規模的戰爭無數萬人的生命，都無疑的可以省下了；但是，雖然石太因留下許多好人並且忠實的在柏林內閣服務，然而他們沒有石太因的力量可以克服國王的致命的不果決，因此奧國只有依靠他自己的命運了。

當他陷於苦惱境地而德國與歐洲在拿破崙壓迫之下又顯然的沒有希望之時，真的，曾有一個短時間他也轉向消極。有趣的是他在一八一一年對一位美國人寫過一對信說，“我是誠心誠意的對生命厭倦了，並且希望牠快快完結。爲了享受休息及獨立最好住在美洲，——在 Kentucky 或 Tennessee；在那兒將能得到清美的天氣與土壤，絢爛的河流，和休息並且還有百年之久的安穩無憂，不用去顧及這一大羣日爾曼人——將 Kentucky 的都城命名爲佛蘭克府(Frankfurt)罷”。

但是這種情調像是僅僅一短時期就完了，並且不久他又回到他的愛國工作如以往一般，他永遠不急促，但也不停頓。他與德國奧國最好的人物協力同作，——他仍是他們的最有影響力的領導者。

受他的例子所鼓勵的偉大的人物重新在普魯士許多方面建立基礎。威廉·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把整個的公共教育制度重新加以組織，將比先前好的教育賦以新的生命，把同時代的第一流思想家的最好的意見與他的工作結合在一起，並且以柏林大學爲其極頂。這個大學直到現在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好大學。菲希特(Fichte)發表他的忠告德意志國民書(三五)(Reden an die

(三五) 編者註：該文中有數篇已譯成中文刊登於二十九年北平中德學誌第二卷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

Deutsche Nation) 這個給整個的正在列隊而來的富有勇壯氣的青年一顆新的心。世萊瑪哈 (Schleiermacher) 宣講他的道理，他將那僅是普通的正教的皮殼棄置不顧，他所啓發的不是那些僅是或主要的以拯救他自己的靈魂爲目的的病態的懦夫而是願努力爲善以其善故——願意爲國而死的人們。阿倫 (Arndt) 寫時代之精神 (Geist der Zeit)，再版達十五次之多，及到較後一時期，他的偉大的德意志的祖國是什麼？ (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 爲德國的統一與自由挑惹起一種熱情，其力量之難以抵抗爲希望作壓迫的人所從未見過。放流的亡命者石太因愈來愈成爲思想的中心了；“無論他到那兒，他都是首坐”他的在普魯士政府的著名的繼承者，哈敦伯 (Hardenberg) 祕密的到里森大山 (Riesengebirge) 去見他，他向哈敦伯建議，不久他的意見在憲法與財政方面的新改革上都具體實現了。天主教及基督新教徒的老宗教捐款曾吸收很多的財寶，現在強迫他們借出大款；這樣來把死的資本弄活了，並且商業與工業也由重稅中解放出來，這個重稅曾經毀壞所有的商業命脈。一種代議制度，地方的及一般的，也更愈來愈清楚的有實現的預兆了，並且因爲受了石太因的前例的激勵，哈敦伯甚至竟跳到石太因的計劃前面去了：普魯士全境凡他所能直接管轄的地方他努力將佃農變成爲土地的所有者。

在此期間，不幸的災難忽然而來。奧國雖未得到普魯士的幫助，但卻拼命抵抗拿破崙，並且後來不管其官吏是如何的蠢笨，懶惰，竟表現出一種在牠以先的戰事中從未見過的抵抗力量，特別以在梯落爾 (Tirol) 所表現的爲尤甚。這種國家精神和西班牙曾給拿破崙以嚴重的打擊和德國第一次在亞斯破恩 (Aspern) 打敗拿破崙所表現的那種力量都是一類的。假設石太因在菲得利·維廉第三的身旁普魯士必要加入這場鬥爭；但是在普魯士王打定主意之前奧國在瓦格蘭 (Wagram) 已被壓服了，首相施塔第昂 (Stadion) 被迫辭職由頭號陰謀家梅特涅 (Metternich) 繼任，顯然的拿破崙的時代現已登峯造極。梅特涅將奧國皇室之一女嫁給拿破崙，歐洲由此便一同帶來了另一長串犧牲與愁苦；由於令人傷心的陰

謀，政治的無道德及反動，竟使拿破崙多延續了三十年。

在這最黑暗的期間，石太因從未失心喪志，但在其心中卻造成一個大的改變——他愈來愈不是普魯士人而愈來愈甚的成為德國人了。他不能向他國家的侵略者屈服，而在奧國又不能安全，他乃又逃亡。

在歐洲大陸除了一國而外，所有的大國均落於拿破崙手中。俄國的亞力山大(Alexander)不管他是在訂梯爾西特條約時是如何的可羞但是當拿破崙試着去吸引他去作別的惡行惡事時他卻畏縮不前。拿破崙從來不許別人對他的計劃表示不同意，所以戰爭乃迫近兩強之前了。這事原是如此的，就像國王菲得利·維廉在普魯士崩潰之後去找石太因的幫助一樣，現在亞力山大皇帝也在一般人都認為俄國的崩潰就要到時去找石太因的幫助。石太因由於個人的深思，慫恿他在那安安靜靜的呆着，去讓他自己被世人遺忘，等待較好的日子。他自己挺身去反對拿破崙誠然對於他那是危險的，甚至在俄國亦然。因為當時的俄國是和現在一樣的貧窮，她的政策譎詐，她的官吏腐化，她的統治者懦弱。拿破崙是世界上所曾見過的一位最偉大的戰勝者，他在那個時機，帶着五十餘萬顯然無敵的軍隊跨過了國境，並且，假如石太因在俄國很活動的反對拿破崙則法國的勝利一定要把他送上斷頭台或者長期的逃亡。拿破崙如何的對待那些反對他的人——他曾有效的藐視過的人——可以由他給戰地軍法裁判處的命令中看出來；這些給他駐在德國各地的使者的命令其次數比以先更煩煩了：只要他能捉到石太因，他將要一定如何的對待他，可從這位皇帝給他大臣的信中看出。

但是石太因對這個視若無物。他立即參加到亞力山大的總司令部並且這位皇帝立刻就給他關於財政或公共教育的很高的位置。但是石太因把這些個都謝絕了，他很坦白的宣稱他的主要的目標，是為德國的利益而作。至於關於俄國的，他的使命是維持俄國皇帝的勇氣；關於德國的，他的特別的努力是挑播俄國使用武力，這樣可以將拿破崙的軍隊與法國的連絡割斷。石太因就向這個方向努力，他與歐洲各地的愛國志士通信甚勤，比以往勤多了。他促進愛國心或壓

制愛國心都視需要而定。他答覆詭辯者。他召阿倫特 (Arndt) 到他的身邊，鼓勵他寫出對於愛國心之呼籲的文字，這個將整個的德國人民的心都煽動起來了。

雖然如此，在整個的德國，在各朝廷中仍然有一大部分人雖然他們很怕拿破崙但是他們更恨石太因。石太因對於人民的呼籲對於這些個所謂的守舊黨仍然似乎是革命的。他們以為：石太因所作的事情一定要把生命與思想輸入給人民，固然，人民們在開頭要被引導着去反對新的法國侵略者；但是以後，人們或者一定要反對他們舊德國的壓迫者。持此種觀點人們中的首腦人物是奧國的老王和他最信任的大臣梅特涅。

在俄國對於石太因的反對是另一類，但是其嚴重性並不較弱。拿破崙的種種成功佈滿了宮廷。當於法國侵略俄國，俄國所犧牲的比拿破崙的兵所犧牲的少的也不太多，這個使俄國領袖們的家庭充滿愁慘。法國兵一往直前，勝一仗又一仗，並且後來竟打進莫斯科 (Moskau)。那般主張不惜以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的論調極端得勢。由皇太后及其他皇室所領導的那個主和黨更囂囂鼓噪。拿破崙早就預先見到自己的危險，並且知道亞力山大的猶豫性格，乃送給他一些富引誘性的通牒，用的是最富誘惑力的理論；並且獻出引誘之餌說：將這個已開化的世界由兩個皇帝平分罷。

為反抗這個壓迫，石太因堅守立場，並且比別人更可取的是他也使歷力山大堅決。他的儼然政治家之眼光早看出拿破崙的真正的地位，並且他也使俄皇看清這個；他煽動起俄國的愛國者的勇氣，並且冷化同情法國者的熱心。他用全副力量不留餘地的反抗他國家的仇敵；此點雖然重要，但是他仍然是老德意志的剛毅的男爵——僅僅作個廷臣他是完全不肯的。他這樣的坦白，直截了當，無恐無懼，在俄國以往及由彼時以來尙未見過像他這個樣子的。在某一個機會，皇太后，亞力山大的母親，在朝臣們之前，從他竟得到一個教訓，直到現在仍是俄國歷史上奇事之一。在包羅丁 (Borodin) 戰爭之後，這位皇太后的熱心忽

然發作，她在石太因的面前喊道：“假如現在有一個法國兵能從德國邊境逃走，我將感到羞愧去承認我是德國的後裔”。宮廷的記事官告訴我們，石太因的臉突然一紅一白，整步走向皇太后屹然立其前，大聲說道：“陛下用這樣的口吻去說那樣偉大那樣真實那樣勇敢的人民——你有良好命運生而屬於其族的那樣人民——你的這樣說法是太不公正了。你應當說：‘我感到羞辱，不是由於德國人民，乃是由於我自己的弟兄，堂兄弟，德國的王子們，設而他們曾經忠於職守，一個法國人都不能越過埃爾貝河(Elbe)，歐得河(Oder)，維希色河(Weichsel)’。”任何一個人如果熟悉恰恰在俄國宮廷所風行的拜贊廷(Byzantine)的溫順謙遜風尚就可以明瞭由這些坦白字句所引起在場者的驚惶失措是到什麼程度；但是，很幸運的，皇太后尚具有些由德國的較良觀念與訓練遺傳而來的好點，她答道：“男爵閣下，你或者是對的。我謝謝這個教訓”。

在這個期間，石太因的整個的行為及他最後這些年在職的整個生活，都是由於對壓迫他國家的人之憤恨所致，及深信拿破崙的事業是對於上帝之挑戰所致。因為拿氏違反上帝所以他的事業不能再繼續下去。石太因很熟悉的注意到那些崇拜拿破崙的國家為他所出的犧牲是多麼大。對這種犧牲拿氏毫無畏懼與憫惻。當拿氏即位的時候他的臣民為抬舉他而死亡的數目竟超過二百萬人。這種虔敬等於毀滅。每年這位皇帝不斷的要犧牲二十萬人，並且這些人都是法國所能貢獻的最有精力最有希望的人。這個，石太因看出來是不能長久的；並且他有一個深的自信，就是拿氏這種行為雖然能夠存在，牠也是反對上帝意旨的大罪惡，應予以懲罰(三六)。

在莫斯科大火之後，亞力山大拒絕與拿破崙進行任何商量，這個功勞無疑的要歸於石太因不能歸功於任何其他的人；並且由於這個拒絕才把拿破崙毀了。這

(三六) 關於石太因在地球上強者之前所作的那種大膽的言辭其他顯著的例子，可看Pertz, vol. iv, pp. 152, 153。關於在拿破崙帝國對法國死亡的生命的計算在 Alison, History of Europe 有很仔細的敘述。

位戰勝者信任亞力山大的柔弱，像他曾在梯爾西特（Tilsit）及別的地方所見到的，但是他未計算亞力山大被德國志士中最偉大的一位所鼓舞出來的堅決意志。

（三七）

現在遇到了所有問題中的最困難的問題——俄國將要作些什麼？這是極重要的一瞬——千載一時之轉機。在俄皇左右的口若懸河的外交家們以皇帝顧問官為首，他主張俄皇應當倉促講和，應向拿破崙求恩乞憐，並且那樣作也可以用德意志及土耳其為犧牲而能增加俄國領土。德國的危險即在目前——法皇與俄皇在梯爾西特老聯盟的危險又要恢復，這樣來去搶劫德國人及抹除德國愛國心，比以往更要有效力——事實上就是要使普魯士變為波蘭第二。石太因此任何人出力均多設法躲開這個危險；他從俄國顧問官會議中將這個主要的陰謀趕走，他用一種意見去充實俄皇的幻想，即：不要作德國的搶匪而要作歐洲的救主。自從律希魯（Richelieu）使柔弱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成為統一法國的英雄並且是反抗歐洲的奧國暴君的領袖以來，直到現在從未有政治家曾表現像石太因這樣的能力將一個大國的君王轉向他自己的高貴目標。他所遇的一些事情現在也幫助他。譬如石太因在普魯士的最壞的敵人約克（York）將軍也轉變了；他本來是同着普魯士的同盟國援軍趁着莫斯科陷入災難的機會被拿破崙拖入到俄國的；但是他忽然不顧國王的公開的反對，竟甘為大逆而冒死險，轉過身來去反抗拿破崙，並且有一時竟公然反對他自己的君王菲得利·維廉第三的形式上的命令。

石太因的勇敢並不下於約克。以科尼斯倍（Königsberg）為中心，俄國曾征服了很大一塊地方，對於普魯士全都是很可珍貴的，石太因偕同一位俄國委

（三七）對於我像是很清楚的，即席雷教授（Professor Seeley）的Life of Stein雖是很可欽佩但是他寫這本書時為學者的風度所限，以致他不能對於石太因在這個危難之期所給的影響作完全的鑑賞。他的論調說國民的公論使俄皇亞力山大（Emperor Alexander）堅決心增高。這種論調以熟悉俄國官場情形的人來看是顯然的理由不足。曾有兩次，為公務而駐劄俄國，均正當其苦難之期，那種經驗告知我，直到目前在俄國的“公論”永遠是沙皇（Zar）的個人意見，假如這個沙皇配有一個意見的話；設而他沒有意見，所謂“公論”也不過是一些特殊有勢力的人或黨派的意見而已。在現在所提到的這個時期石太因是亞力山大的顧問會議中最有力量一位。

員，實際上就像是俄國總督一般，走進到普魯士邊境幾省去；不顧普魯士王的反對，因為普王在名義上是拿破崙的同盟者，他管理當地的人民，並鼓舞他們去反抗拿破崙。並且比這個更甚的，是沒有國王的命令也不經國王的允許竟招集一個國會，這個國會可以向法國的壓迫者宣佈開戰，這種行爲在當時的普魯士國中算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

這種無法無天的大膽是漸漸生長的。國王菲得利·維廉和他的衆官員們雖然因此而得到利益，但他們不能忘了這種越法行爲。石太因後來從普魯士得到了榮譽賞典，但是卻再不令他在普魯士政府服務了。對於菲得利·維廉而言石太因像是德國人中最危險的人物。對於拿破崙而言他當然是危險的了；因為這位皇帝從來不失機會去向他投射譏諷，去表示對他的恨怒，去稱他爲過激急進主義的改革者，就是當拿破崙的權力達到最高峯時對於石太因也是如此。他對於哈布斯堡帝系 (Habsburger) 及霍亨索倫帝系 (Hohenzollern) 之危險就如同法國的過激急進黨人對於布爾邦帝系 (Bourbons) 之危險是一樣的。

於是其結果乃是當於德意志的君王們，大臣們，嬖人們藉着石太因這位組織者的廣大才能而獲益而喜悅時，他們也不能忘掉他對德國人民所作的呼籲及他爲提高這些人民地位的努力。甚至就是國王與他的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在名義上又重新合作之後的那一期間，普王仍是設法不請石太因去赴宴會，並且當於這位老政治家在布累斯勞 (Breslau) 病臥在旅館中的頂樓中時，國王甚至連費點心思去打聽他的健康都不肯，連送給他一封溫婉的慰問函都不肯。

普俄兩國反抗拿破崙的最初幾次鬥爭在莫斯科崩潰之後其結果是成功是失敗尙不能定。奧國與薩克森 (Sachsen) 袖手旁觀，盡力與拿破崙會商以犧牲俄國爲要價還價之資料。假如拿破崙肯放棄再建卡爾大帝 (Karl der Grosse) 帝國，奧國及其同盟國便給拿氏一些最可驚的代價。由於萊賢巴和條約 (Reichenbacher Konvention) 奧國與俄國同意，其實也是與普魯士同意，去提議使拿破崙爲一帝國之首，此帝國比任何歐洲國家的大的多多，包括法蘭西，意大利，荷蘭，比利

時及德意志在萊因的各王國與親王之封國，並且在此之外還許給拿氏有許多別的好處。但是拿破崙拒絕了。於是，現在不僅俄普就是奧國也轉過來反對他了。英國更作有效的援助。世界都討厭拿破崙的暴政，乃於一八一三年德國崛起與法國以外的歐洲三個大軍事帝國聯盟。石太因及其一同工作的人創造出一個德意志的人民，沙恩荷斯特 (Scharnhorst) 曾給這個人民以軍事訓練，阿倫特 (Arndt)，世萊瑪哈 (Schleiermacher)，菲希特 (Fichte)，賈恩 (Jahn) 及數百別的人，不，是幾千別人，曾鼓舞此人民各具努力鬥爭不勝便死的決心。拿破崙拒絕了奧國的很中平的條款乃用新兵侵犯德國，在起首頗為成功，但是這個復興的德國是努力的反抗他。於是在來比錫 (Leipzig) “數國大戰”打了起來，由此便要將打倒拿破崙這件事結束了。

爲了達到打倒拿破崙這個目標而去將歐洲連成一氣，石太因不能不作出大的犧牲。他曾力勸德國徵集國民軍；但是奧國不聽從他。因爲這裏仍有一個舊的恐懼在盤據着，就是：人民一旦被徵集起來去反抗法國皇帝，他們將要學得他們的力量，以後便要再起而去反抗奧國皇帝了。因此石太因的顧問官們，正當於他們極端有價值的瞬間，便被取消了；並且石太因不得不服睜睜的看着領導權落於像梅特涅那一類人物的手中。

但是當於聯盟不給他能使他聽取他的顧問官的建議的位置之時，他們乃不得不給他一個行政上的位置，這個位置比歐洲任何其他大臣都重要。他們創立一個大的中央委員會管理普奧以外的德國各省。並且只要由拿破崙手中將地方收回便急快恢復秩序及組成良好政府。他們位置石太因爲此會之首領。現在他的行政工作是太龐大了。他甚至被人起個外號叫他爲“德國皇帝”；真的，有些人很鄭重的提議說恢復德意志帝國以他爲永久的領袖。他被聘請，不僅去治理歐洲中部及所征服的法國地方，並且去重新組織這些領土；去把牠分成爲易於管理的省分；去任命治理者及顧問；去爲聯盟各邦從這些地方吸收錢款及軍隊；並且在其餘的萬事之中還要照顧那些傷兵，這些傷兵都是從現在繼續不斷的各門

爭中來的。在來比錫戰爭之後其中有三萬四千傷兵由石太因負責照顧。

在位的王子們常在他的前廳等候着他，但是這位倔強的老男爵對待他們很少禮貌：對於他們大多數他從不能隱藏他的輕視，並且一般的看來，他對他們的待遇很像畢士麥（Bismarck）於五十年後在凡爾塞（Versailles）對待他們的後人是一個樣子。在石太因的時代德意志的幼小的王子們喜歡奢侈而不顧榮譽；他們曾表示過他們已準備好了去仰奉拿破崙或者那些與拿氏同盟的國家，因為如此作才可以得到他們的安樂與利益。而石太因的大丈夫氣的威嚴却浸透了他的整個思想，對大事如此，對小事亦如此。一位具有領土管轄權的大人物威瑪大公（Grossherzog von Weimar）其爵位僅次於國王，在一個石太因蒞臨的賓客集會上，這位大公試着去作一種鄙陋的玩笑，石太因以莊嚴及坦率的態度叱責他。所有到會的人都被石氏的大膽所驚嚇，但是這位威瑪的“閣下”（譯者案：his High Transparency 等於德國的 Durchlaucht 是一種談諧而諷刺的頭銜）由此乃不得不改變他的作風了。另有一回，一位地位崇高的人物因為處理政府的事務舞弊，石太因就要將他下獄。但他竟由國王得到了赦書，乃去見石太因去呈示他的赦書，石太因竟舉起手杖將他趕出去。在柏林的一個宴會上，一位大貴族也在座，此人之名設而宣佈則為卑鄙所污故姑隱其名，石太因一見有此人在座不願所有的規勸，離開了這所邸第，他聲言他永遠不能同着那樣的東西在一屋中同坐。

在奧國與普國之外，他的“皇帝”外號在那個時期確是實在的情形一種表現。新危險起來了。拿破崙的繼承者是奧國皇帝之外孫，並且在許多時候奧國都表示願意保存拿破崙在法國的統制權，但是以限制她在她的天然邊界之內為準，在當時就是指萊因河而言。但是石太因雖然不是當時似乎有決定政策權的中央會議之議員，然而他的影響繼續的使亞力山大反對奧國的這種意見。當於巴黎最後為聯軍攻下時，假如說使這種勝利之實現任何人的功勞均不及石太因，這種話並非誇大。然而在彼時，任何大人物都沒有像石太因所得的稱譽那樣的少；三

位皇帝，梅特涅，塔雷蘭 (Talleyrand) 的名字所受的頌歌讚詞充滿了歐洲；而這位剛毅的政治家，他的品格勞績遠遠的高出別人，反而漠漠無聞。

以後，自然，當於有思想的人及公平的歷史家，回想起那個偉大時代的事蹟時，要起始對他有公平的酬報的。近代最偉大的法官將要用慎重考量過的字句宣佈：“在一八一二——一八一三年，以英勇的決心帶着勝利的俄軍從邊界打向西方將俄軍與無連絡的德國人民及返老還童的普魯士軍隊聯合在一起，推動牠一齊向西方進攻，並且由於這些人及同盟軍將拿破崙打的節節敗退，一直趕出德國，這是一件天才的工作；此天才帶着亞力山大的遠征軍從西伯利亞的邊界打到 Montmartre 山者，其人非他乃係天才石太因男爵是也。對於歷史而言，這已爲人所週知不再是什麼祕密了。由此，他乃達到了他歷史的使命的絕頂。”(三八)

在拿破崙退位之後，跟着有維也納會議，(Wiener Kongress) 在該會議上石太因將他的全力均用在求德國的統一上及爲普魯士得一個合適的地位。這個自然爲梅特涅，塔雷蘭及所有那一類的政治家所反對。當拿破崙由埃爾巴 (Elba) 島回來時，石太因的意見在那些將拿破崙拘禁起來的人們中很爲重要，並且最後將拿氏的事業給完結了。在維也納會議的整個期間，石太因盡其力之所能作到的是要將德國的實質的統一置於一個憲法之上；他將要恢復德意志帝國，將要引用思慮週密的議會，並且要向這些個幼芽之中注入一種與老“德意志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大不相同的東西。這個帝國在拿破崙將牠壽終正寢之前實在是早已等於虛設。但是梅特涅的地位是太穩固了，並且奧國對於德意志諸小邦的影響勢不可遏：聯邦是被創出了，但這個聯邦被政治的卑污拉扯了數年之久直到畢士麥方告完結。石太因也試着將埃爾薩斯 (Elsass) 羅丁根 (Lothringen) 復歸給德國，但他失敗了。這志願，在半世紀之後，由畢士麥用了數萬可寶貴的德國生命的代價方得實現。

法國的暴君到後來是被逐出德國了，然而石太因也不再被在位者所聽信了。

(三八) 看 Gneist: Die Denkschriften des Freiherrn vom Stein.。

他乃由政治退休，——他對於所留下的偉大的工作未能作完深為抱憾，但對已作的偉大工作尚覺歡欣；他清清楚楚的見到從反對勢力而來的惡魔，就要接踵而至，但是有一信念尚可使他安心，就是他認為較優良的顧問官們到後來是將要佔勢力的。直到他生命的結尾，他繼續的保持那同樣的獨立與無畏，這點使沙恩荷斯特說：石太因和布綠歌（Blücher）是他從來所遇見的唯一的兩位不懼怕任何人的。固然，普魯士曾獻給他一個高的位置，請他為普魯士到佛蘭克府（Frankfurt）立法議會的代表；但他的強的良知阻止他去接受這個位置：他見到反動勢力正佔上風，及由於奧國對於普魯士的嫉妬，在那個時候不能有較大的進步可作。去回想這個是很足以啓人深思的，就是石太因所拒絕的這個位置，畢士麥竟由牠而向世界表現出其真實的才力，並且最後，為新的德意志帝國去索還挨爾薩斯，羅丁根兩省，這兩省也是石太因曾想給老帝國要收回的。

另外有人向這位老政治家也要供獻一個位置，這個看着像似出乎人意料之外。這個或者是他的品格與能力的最大的證據，因為這個位置比在佛蘭克府的德國的議會當議長絲毫不次；並且這個是由於世界全人類當中的那位曾為德國最討厭的敵人梅特涅來的。當然用不着說，石太因謝絕了，像他謝絕各種其他的從他不信任的方面來的榮譽一樣。（三九）

一直到他的末日，他仍是以一貫的決心憎恨那些思想卑鄙與不愛國的人，而與那些他所認為真誠及有智慧的愛國者作經久不變的朋友。他的宅第距其祖先的已頹蕪的堡壘很近，此老宅第現在仍然存在。並且這個宅第的最有趣味的形色是牠有一個塔樓，他將這個塔樓加到這所宅子上作為他所助成的使公理與正義獲得偉大勝利的紀念物；並且把牠當為一個為了德國自由而戰爭的那些曾在他身邊一同工作的人的肖像和別的紀念品的收藏所。

作者曾訪過兩所宅子，這宅子都顯示出一個培植公理與正義的真誠的愛國者

（三九）關於梅特涅（Metternich）所進獻的位置，看 Seely, vol. ii, pp. 409, 410，從牠還可找到一封梅特涅給 Von Gagern 最古怪的信，這信是在施太因逝世後寫的其中對施太因的功績有極顯著的推崇。

就是當他很明顯的將一切權利均被褫奪了時他所完成的是些什麼工作。這兩所宅子的第一所在那騷 (Nassau) 是石太因的。在他的晚年由這所宅子發出他給夏哥爾恩 (Von Gagern) 和別人的信，這些人都是正在領導德國國內為正義而作的各種奮鬥。另一所在門提賽羅 (Monticello)，由此處哲發孫 (Thomas Jefferson) 當他解職之後許多年他發出給馬迪孫 (James Madison) 和別人的信，這些信在美國國內對於正義有甚大的幫助。

這裏很有些事情足以刺激石太因作這些最後的努力。普魯士的國王菲得利·維廉第三在他的困難時期，曾經給過莊嚴的諾言去建立一個立憲政府；但是當於和平及繁榮恢復了時，反動開始了時，國王的顧問把他與遁詞詭辯纏擾在一起時，乃引着他在實際上將諾言破壞了。石太因不斷的且熱心的寫信反對這種食言行為。寇次布 (Kotzebue) 被商德 (Sand) 所暗殺更助長了反動。一般的暗殺所生的影響大概都是如此。但是石太因仍然保持中平與前進的態度，仍然催促人們為普魯士立一憲法及有一代議制度。最低限度也要起始在德國有些自由的組織。誠然他不是現代義意下的維新家。並且在當時他所要求的憲法也是專制的和屬於貴族政治的；不過在其中卻置有多數人民代表，並且由這些種芽一定要發展出來一個比現在寬闊得多的自治政府。他不是“傻的改革家”，他知道如何去估計圍繞着他的事實及可能性。他不希望種樹當天就結菓；種一棵好樹將來一定能生良菓那對於他已算是足够了。

事實對他已甚明白，在彼時他的顧問們是不能為國王所繼續採用，於是在他晚年乃回頭去作歷史研究。但是他覺得不能夠得到重要的史料，於是乃想起一種意見，想建立一個會社去保存德國過去的史料，去為歷史拯救這些史料。並為免去這些材料的湮沒，乃將牠們出版以為保存。這樣的，在石太因死的前數年，德國學者們已起始作這個工作了。像出版德意志史料彙編 (Monumenta Germaniae) 這樣極偉大的歷史工作為任何國家均未曾作過；對於這個他捐一筆款，照着他的中平的財運來看他所捐的數目算是很大了。從一八一九年直到今

日這個大工作仍繼續進行；這個不僅對於學者的研究有幫助，並且對德國之愛國心亦有大用。(四〇)

德國的或普魯士的會議均希望他去作領袖，但他均謝絕不去。因為他看到當時握政權的人對於會議所加的限制太多，所以他也不想去。但他常常被請求作一些重要的報告及有力的忠告。他反對集權的分部政治，所以這位老政治家爲了省憲法及行政問題還向皇太子，即後來的普魯士王菲得利·威廉第四，發表一篇很可敬慕的言論。他的住處與朝廷及當時的顯貴們距離很遠，但是就是在這質樸的住所中他也從未停止效忠國家。並且在他最後幾年在維斯特法倫各邦中對於事務的考核方面他也佔一有用的地位。

他的宗教簡單而有大丈夫氣概。誠如爲他作傳的那位卓越的英國人所說的「對於將來無畏縮，無恐怖，無戒懼。與罪惡有關之事從未作過。」他是位信心極篤的基督教徒，並且認爲假如他的靈魂值得拯救，則牠將要被救。在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他死了——據他一生的事蹟看來，死了一位偉大的直誠的基督教人。不是普通所說的博愛家，不是愛國家，不屬於任何一時情感衝動的舉旗吶喊的人，而是一位頭腦清楚，心志堅決，建樹公理的工人。其所以建樹公理與正義者，蓋以此二者爲國家偉大之基礎故也。

他給德國及人類所留的遺物是他的工作成績。然而更會我們懷念不已的是他的品格。他的品格比他的工作成績尤足感人。其力量之大不能形容祇有意會，並且在事實上所表現的是那樣的安靜那樣的明顯。此等品格的價值除了我們的華盛頓具有之外，其他人是很少看到的。這位偉大的法官（即指上段給石太因作傳的英人言——譯者）用有分寸的詞句曾向我們指明：將拿破崙這個討厭的東西趕出歐洲，石太因的功勞比任何德國人都大，並且實在的比任何人都大。關於石太因他曾說：“他的最大的功績是行政的改革，這個改革是發動於他的高

(四〇) 關於 Monumenta Germaniae 對於傑出的歷史家的訓練，其價值可看 Paulsen: 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pp. 67, 70. 該書對於此點曾作詳盡而有趣的敘述。

尚的品格，及他的合乎道德的，純潔的，不自私的，有經驗的，有力量的信心。因為有這個信心所以他敢於去反對各省的貴族及那一大羣廷臣。在耶拿大戰之前，甚至菲得利·維廉第三都接受了石太因的意見。他之所以能堅信這些意見及這些意見之能被實行出來都是因為他相信石太因。而哈敦伯便不能夠使國王生出這樣的信任心”。(四一)

因為石太因有良好的品格，所以俄國的專制君主也願信任他。信任他以去抵抗拿破崙整個的強權與誘惑。歐洲的領袖們，雖然不信石太因對於民權的信仰，但是他們卻尊敬石太因的品格，所以他們終究還是聯合起來反抗歐洲的暴君（拿破崙——譯者）。創造新德國這種意見，當歸功於這位安靜的，有強力的，忠實的，固執的，自尊的政治家。他的功勞比別人均大。他之所以能夠如此，也是由於他的偉大的品格所致。他的品格是屬於人類編年史上所能夠表現的種種好品格中的最偉大的一種。

這位老國僕葬在距他名之所自得的岩石很近的地方。在他的墓上有一碑銘，如下：——

亨利·菲得利·卡爾·男爵·封·石太因，

生於一七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死於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長眠於此：

為其武士族中最末一人，該族統治

朗河之畔達七百年紀；

在上帝前謙虛，在人前心腸高貴，

為不誠不公之敵，

富真誠榮譽，

(四一) 看前面所提到的 Gneist 的書第十六頁。

不因流放逃亡動搖，
爲祖國屈服期中不屈服之子，
爲求德國自由而參加戰役得勝利之
兵 士。

“我懷一願望逝去
並將同基督一起。”（四二）

大約在四十年之後，石太因的意見終於起了作用，普魯士王現在成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皇帝，在他蒞臨之下給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的彫像行揭幕禮；並且在像的基座上，在石太因名字的上邊有一句人人皆知的雙關語，這句話早就成爲流行的諺語了：“Des Guten Grundstein; des Bösen Eckstein; der Deutschen Edelstein（良善之基石；歹惡之阻石；德國之寶石）。”

後來，在普魯士的首都，命運註定牠變成爲德意志帝國首都的地方，也對他作了些相當的榮耀。在普魯士立法院之宏壯的建築之前，聳立着一個銅的，高貴的紀念品，這個或者是出自德國現代最偉大的彫刻家之手。該銅像表現石太因到極致——衝着從任何方面吹來的風，他都堅決，方正。在他的周圍是一些巨大的彫像，象徵他的美德，這些都是他所召來抬舉他的國家的。在基石的周圍刻着許多連貫的最偉大的景象，這景象是表示他的生平，表示他是如何的出力去拯救普魯士的德意志的及歐洲的文化。

以上這兩個紀念像都是菲得利·維廉第三的兒子菲得利·維廉第四及維廉第一立的。除此二者之外，這位忘恩負義的國王的孫子也給石太因立個石像。這個可以說是石氏的最後的紀念物了。當菲得利·維廉第三之孫維廉第二爲普魯士國王及德意志皇帝時，他在柏林的勝利街（Siegessallee）列一長串彫像代表過

（四二）現在的作者曾用以上字句替代席雷（Seely）的譯文，此係在當場記錄下者，似乎有些細點更較正確。

去千年中曾統治其領土的歷代王子——共三十六人。在這些君王的每人的身旁都有些巨大的大理石的半身像。這些像都是對於國家之富強出力最多的人——在維廉第三的像旁邊置有這位偉大政治家的半身像，這位政治家是維廉第三負恩最多而報答最少的。

但是比大理石與銅的紀念較好的，比最前進的德國演說家們所驕傲去發表的頌詞更好的乃是有思想的德國人無論何時提到石太因的名字時永遠在心中所立之紀念物及常常在脣邊所道及的頌詞。

以時間來論，從宗教改革以來他是德國三大偉人中的第二位。此三人中的第一位是陶瑪秀士 (Thomasius)，他主要的事業是一位出版家，所以與其餘這二位無法作比較，他的工作範圍及方法均與他們的不相同。如果將較後這兩人作一比較，世界上一般的人無疑的均要將第一席判給畢士麥。以整個事業看，畢氏的工作更比較驚人，他所得的勝利給人的印像也較深。但在另一方面看，必須說畢士麥所持以成功的元素：如——國王維廉第一，不顧一切陰謀與反對，由始至終都堅決的與畢士麥佔在一條線上；如——毛奇 (Moltke)，他是自拿破崙以來的最偉大的軍人；如——羅恩 (Roon)，他是最偉大的軍事組織家；如——最完備的大量軍隊；如——一種德國的可驚的覺悟，這種覺悟與石太因曾經費無限力量所鼓舞起來的是一樣的。以上都是石太因所缺少的，都是普魯士為爭自由而反抗拿破崙時所缺少的；但是畢士麥卻可自由運用這些力量。

況且石太因所作的工作更較深遠，方面更多，於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及情勢更費精力。如把這些事實——陳列則足可以與畢士麥的那些寬廣的，印象極深的勝利相平衡了。畢氏的工作有時其遠見其力量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像石太因從已被踐踏的農奴中創出自尊的人，從被人看不起的市民中創出自尊的公民，並且將議會制度貢獻給國家的各方面，這些點都是伸入現代政治學之中心的工作。像此等富於哲學的，深刻的洞鑑力是畢士麥所沒有的。在這方面他比畢士麥強多了。在歐洲人之中，在思想之深遠及目光之廣闊方面，以現代的社

會觀點而論，惟丟格 (Turgot) 與加富爾 (Cavour) 二人差堪與石太因相比擬。

況且，這兩位現代的德國偉人之品性更有顯著的不同。二人均易怒，甚至專權；二人均幽默，機警，具誘惑力；但是以勇往直前，坦直，尊重公權而論，畢士麥是不能與石太因相比的。並且石太因所表現的可驚異的行政能力，如：在同盟國聯軍後方所作的去組織獲得的領土工作，及先在德國後在全法國收集軍隊，徵集錢款，調養傷兵，調停各元首間的令人煩惱的問題，這一切行政方面都證明他的才幹可與愷撒 (Caesar) 及拿破崙相等。而畢士麥卻未表現過這種能力。況且最遺憾而必須直述的是畢士麥的晚年，以偉人而論，是決然的不如石太因有價值。石太因安安靜靜的住於朗河之畔的祖宅中，在各方面都盡力的，沈着的，去促進普魯士及德意志的發展。他莊嚴，深思，被人所忽視但欣然接受毫無報怨。以上這些點，必須說石太因似乎比畢士麥矜重多了。畢士麥在退休之後曾表現出他的性格之缺點。但是那些景仰他的人們喜歡在這些缺點之上遮上一個面幕，以使真像隱蔽。

因為畢士麥的工作範圍寬遠且常變換，因為他彰明卓著的創生出一個新德意志帝國，因為他的果敢的帶戲劇性的性格，所以在一般人心中將要長期稱揚讚美他，說他是一個比石太因更偉大的政治家；但是有思想的人，則不能不在畢士麥的身旁給他一個並列的位置，——以對德國人民之功績論，二人相等，以對人類之功績論，石太因比畢士麥卓越。

石太因男爵略傳^(一)

Biographie von H.F.K. Freiherr vom Stein

史得恩 (Afred Stern) 著

楊丙辰節譯

亨利·菲得利·卡爾·封·石太因男爵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Freiherr vom Stein)，於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於德國之納騷 (Nassau) 城，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卒於維斯特法倫 (Westfalen) 省之可本倍 (Cappenberg) 城。他出身於萊因佛郎掣 (Rheinfranken) 地方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為邁恩茲之選帝公國之樞密顧問官 (Kurmainzischer Geheimrat)，名：卡爾·菲力普·封·石太因男爵 (Karl Philipp Freiherr vom Stein)，係一心性堅定正直，而富有毅力的人物。他的母親，名：亨利特·嘉羅麗乃 (Henriette Karoline)，為朗偉爾德·封·西麥恩 (Langwerth v. Simmern) 爵爺之女，初嫁封·呂復氏 (v. Löw) 呂復氏歿後，始轉嫁亨·菲·卡·封·石太因之父，係一位美好賢慧之婦女，而心腸虔誠熱烈，更具有經濟之眼光，處理家政之精力。這夫婦二人，生有七子女，無一天折，俱皆歿於父母之後，七子女中四子為男兒，而我們在這兒所敘述的這位石太因氏，便是四子中之最年幼者，此外就是女兒三人。三位女兒中，約哈納·路易絲 (Johanna Louise) 以及最年幼的瑪麗亞乃 (Marianne) 二位姊妹是與她們這位兄長特別靠近的。約哈納·路易絲對於青年的，後來成了普魯士國 (Preussen) 大政治家的哈敦伯 (Hardenberg) 短時間作有印象的，後此與薩克森國樞密顧問官封·維特恩 (von Werthern) 氏結婚，

(一)編者註：本文係自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Leipzig, 1893 出版) 第三十五冊，六一四至六四〇頁譯出，其中有與前文雷同之處及瑣細無關緊要處編者已為刪去。至關於石太因詳傳可參看原文並可參閱載於 Die Grössen Deutsche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Berlin, 1935—1937 出版) 第二冊四六四至四七五頁中 Hermann Ullmann 所著之石太因傳，及最近在柏林由 Erich Botzenhart 所出版之石太因全集，集名為：Freiherr vom Stein, Briefwechsel, 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

但其結合，却不順適，瑪麗亞乃，入修道院充女修士，後升至瓦賽斯坦女修道院之院長（Äbtissin des Stiftes Wallerstein）。石太因氏之家庭，素來崇尚愛國心與家庭榮譽之思想，這是那些日耳曼大統一帝國騎士階級之優良後人們之所特別具有的。石太因底心性裏，爲這宗思想之所充塞，他的身體，爲鄉間的生活之所鍛鍊，並且在受教育，以及自行閱讀書冊時，尤其爲歷史之所吸引，他於一千七百七十三年秋日攜帶他的管事的到格廷恩（Göttingen）城內入大學受高等教育。依照他父母底心願，他研究法學，但是他也更對於統計學，國民經濟學，以及歷史下了一番苦心，而對於英國民族底歷史，尤其加以精研，並且在同與他有一樣心思的青年人們，譬如說同後來俱皆成了名人的賽白（Rehberg）氏與布郎德斯（Brandes）氏的交往中，曾有過許多啓發推動的時間。在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十月間，他被升任爲高級礦山事務官。與他這職務有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隨同他的朋友雷登伯爵（Graf Reden）自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十一月至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八月到英國去「作一次礦物學與技術學之旅行」。他這一次旅行，親身認識了號稱自治政體（Selfgovernment）典型國之英國，這決無可疑地對於他的思想方式發生一種價值無窮的普通影響的。他自英國返回之後，很疾速地就被任命爲克雷威（Cleve）與哈穆（Hamm）二城的軍務局與土地森林局之第二局長。而於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七月間又升爲第一局長了。在這個局長底任上，他尋到了機會，在愈加擴大的活動範圍內以一位頭腦明瞭清新的官吏底身分，從事於種種工作，種種改革。他在這個職責上的行動，是樹立模範的，像法國名臣丟格（Turgot）以長官身分統治黎木森（Limousin）時的善政一樣。他在這兒所作與他特別有光彩的事件，譬如說，就是開鑿魯耳河使其得以能航行船隻，此外就是建修國道，而不向民間強徵夫役，限制消耗稅之徵收，解放國內之交通與營業，予人民方面以極大之便利。

當在當時法國革命之反擊，撲到他的面前來時，他正是處在了這一種優良的，福惠人民的動作之中的。石太因因爲法國這個革命能危及德國的和平，所以

就不得不把牠看作是一種有害的權威了。自他的長兄方面他得到了關於邁恩茲 (Mainz) 城向法國方面交出的消息 (係一七九二年之事)。他同他的長兄和大元帥瓦爾穆敦伯爵 (Feldmarschall Graf Wallmoden) 作種種按排布置，以便力對法軍前進之銳鋒。他向黑森國之各地方伯爵 (Landgrafen von Hessen) 施以鼓勵，並且投入普魯士國王底大本營之中，隨軍効勞，於是便親眼瞧見了佛蘭克府 (Frankfurt) 城之克復。他的工作，是給普魯士國的軍隊辦理給養。這個工作，他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仍繼續着作了下去，並且因在軍營中的這次逗遛，而尤其因目觀圍攻與攻下邁恩茲城之戰役，於是對於戰爭之事項，遂又獲得活躍之概念。他的照例的公務活動，直至這時，尚未受到任何影響。甚至他這活動，因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他升任哈穆與可雷威二城內軍務局與土地森林局之總裁的原因，遂更又有所增加與擴充。在這同一的一年裏，他迎娶女伯爵維廉密乃·封·瓦爾穆敦女士 (Gräfin Wilhelmine v. Wallmoden) 為妻室。這位女子底優良性質，是他當時愈久愈覺得可珍視的。瓦爾穆敦女士，給他生有三女，三女中有一女夭折。由荷蘭方面侵入德境之法軍之前進，使他不得不於一千七百九十四年離開可雷威城，在這兒，他是已經建立了他的家庭的。他把他的夫人送至漢諾威 (Hannover) 城內他的親戚處，因為他覺得這個地方更為安全，而他獨自一人轉赴維賽路 (Wesel) 城。他這時又從事於盡力設法減輕敵人侵略上之禍害，並且還為畔侖多福將軍 (Möllendorff) 指揮下之普魯士軍隊備辦軍用物資，因此巴賽爾 (Basel) 和平條約一經締結之後，他就完完全全向內政的工作上返了回來，照舊作起內政工作來了。

在多次的行途上，尤其是在赴漢諾威的行途上，他竟得以拜識了偉大的同他同時代的人物們，例如說：名將沙恩荷斯特 (Scharnhorst)，以及敏斯德 (Münster) 氏，並同他們發生了個人方面的關係。這些人們之中，他對於任何一個，都留有一個有天才，而火烈熱誠的人底印象。貫澈他整個性靈的那神聖的嚴肅鄭重，令人們原諒他有些過於剛正無私，而決不通融的情形。譬如說，愛國志士

路得微瀧·封·文克氏 (Ludwig v. Vincke) 雖然同他有種種相磨擦之處，但是他却把他這位上司底充分價值認識了出來，因為他批評石太因說：「他是一位至為優良的人物，作部長或許較比作省長還更為合適的。」

他這一種批評式的預言，尙未實現之前，石太因就受國家底任命，充當改組當時歸為普魯士國國有的兩個修道院轄區敏斯德 (Münster) 與巴德榜 (Paderborn) 的人員了。這兩個修道院轄區係屬向普魯士國為其在萊因河左岸所受損失之賠償物中之一部，不過他這次的這個任務，却是至為難辦理的一個任務。他於一千八百零二年九月底到達敏斯德城內，在這兒他駐紮在教堂大主教樓殿之一翼中。在此時期裏，軍事總督封·布綠歇 (v. Blücher) 將軍，又佔據這座大樓的其它一翼。這二位忠勇的人物，居住在一個房頂之下，彼此相處甚得，甚能相了解。為辦理引渡上述兩座大教堂入於新狀況之中的事件，除去布綠歇之外，大教堂監督封·施皮格爾氏 (Domdechant v. Spiegel) 對於石太因尤其是一個有價值的攜手的人的。現在所存當時往來之文件，尙能證明，石太因當時辦理這件事體，費了多少微妙的手腕，和費了多少的顧惜顧慮。石太因為辦理這件事情所作的建議，把這兩個地區上的管理人員，一律施以普魯士之制度，而保留舊日原有之有用人員。對於新領土上之天主教宣教士階級，加以顧慮尊重，而使此項顧慮尊重對於普魯士國權，並無任何損害。克服當地人民對於兵役之厭惡，把以前教士之入款，作公益之用項，尤其作開闢學校之用項，更酌減消耗稅率，以抒緩當地之商務，以及其它種種之優良計劃，俱皆可以證明，他是用了何等的勤奮，何等的精神，以克盡他的職責的。——可是在這其間，普通政治方面之歷程，不僅只在一種狀況之下，對於他作了苦痛的波及。

普魯士之中立，並不足以衛護北德意志，不受法國之侵略。漢諾威已為法將莫鐵 (Mortier) 所佔據。而那不但不去防禦敵人，反而不得不施行解散的軍隊，却是立於他的岳父瓦爾穆敦將軍底麾下的。德國帝國之覆沒，他清清白白瞧着馬上就要實現於眼前了。

他在納騷，弗慮喜特 (Frücht)，以及拾維豪森 (Schweighausen) 等地方之私人財產，當時的納騷公爵 (Herzog von Nassau) 極力思加以奪取，因為他曾宣言，假使帝國騎士階級一經瓦解，那各地方政權即要向他們施以伸展了。石太因和他帝國騎士階級份子中之同人，共同寫了一封赫然震怒的書信，反對這一種恐嚇的暴行，以為自己辯護。他對於他願意德國將來怎樣開展的見解，在這封書信裏頭，曾有所表示。他說納騷國底吞併沒收，和普魯士國底吞併沒收相比較，却是他要以另一種眼光看待的。所以他在他那封信裏頭便寫了下列的言詞：「這少數的帝國騎士階級的產業，縱然人們把牠們一律同圍繞於牠們四周的些小領土領地整頓合併了起來，那在德國底自由與獨立上，亦並無甚獲得的；假使要令這些產業土地果然為國家為全民族能得到了巨大的，真正有所裨益的目的的話，那麼這些小國小邦，就應當全行取消，而去與兩個幅員廣闊的君主邦國聯合了起來，這兩個君主邦國之存在，簡直就是所謂德意志之名稱之存在的，我只是禱祝上天之安排，讓我還能親身經歷了這一件事體之實現。」——石太因寫這封書函的年月為一千八百零四年，而在這一年裏，在他為國家的宣力効勞中，便發生了一個極大的變動。因為在一千八百零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石太因繼史圖文賽 (Struensee) 之後，入普魯士國之內閣，充當部長，受命直接掌管消耗稅，關稅，工場事務，製造事務，以及商業事務。為銀行，海外貿易，以及鹽務之管理，在重要的問題中，他是不得不聽從封·登·舒侖堡，克納伯爵 (Schulenburg-Kehnert) 之主見與決斷的。他對於他直至這時的位置，是很不願意離開的，不過按照着他的希望，他所遺留的這個位置，是經文克氏予以新遞補的，而文克氏對於這個位置也是極能勝任的一個人物，所以他纔有些放心了。石太因確切明白，「德意志之高尙化，以及文化之進展，是非常堅固地與不可分離地結合在普魯士君主邦國之命運上的」，因此個人志願方面，「無論如何犧牲」，在他都是在所不惜的。於是從這時起，石太因便立在了國家底中心點之中了。

石太因底地位，既為史圖文賽底後任，所以他的工作，當然首先僅只限定於

一個較為狹隘的事務範圍內了。不過就在他這個較為狹隘的事務範圍內，也是有一須要改良的廣闊領域，呈獻到他勤於改良的熱心之下來的。當在他對於普魯士東部經濟狀況之內情，獲得了一種精詳的認識時，他的心目中，是存有他在普魯士西部所搜集了來的那些經驗的。一千八百零五年夏天，他作了一次巨大的旅行，他在這次旅行上，所獲得的活躍的實地觀感，在剛纔所說之情形上，又給予他以至良好的影響。他認為自由貿易，是最合適的，所以他便以自由貿易之擁護者，出現於政治之上，他並且還弄成功，使一切的內地稅與省稅，悉行停止，對於東普魯士與西普魯士之消耗稅率加以改良，對於南普魯士與新東普魯士之間接賦稅，使之簡單化。除上項改革之外，還有對於鹽務管理之一種新組織，這一種組織，是能使徵收費用之節省得以實現，再就是使高級官廳中繕寫事務，愈見減輕，更組織統計局所，採取英國方法，以促進工業。當在銀行與海外貿易之管理，由舒侖堡 (Schulenburg) 之手中移入他的手中時，他便對於這兩方面底制度，從事於一種澈底變革，因為在這兩方面底管理上已經滋生極粗野的弊端，以及種種濫用，他並且還由丹麥國首都哥本哈根 (Kopenhagen) 把尼布爾氏 (Niebuhr) 招聘了來，擔任此項管理之事務。他本來還想要把普魯士國之財政，加以澈底之改善的，但因當時普通政治方面之情勢日益急迫，使人們無暇從事於其它方面之事務，因而此項改善，竟無實現之可能。當在一千八百零五年九月初間，新聯合戰爭 (Coalitionskrieg) 爆發之時，普魯士國王決斷下軍隊動員令，這一項處置，一開頭時，外面瞧着似乎是對俄國而發，因為俄軍大有衝入普魯士之危險。然而及之法將百納倒特 (Bernadotte) 破壞了安斯巴河領域 (das ansbachische Gebiet) 底主權之後，普國遂自動地放棄了東部之中立，而同俄皇締給條約，按照此項條約之規定，是把一種武裝調停的脚色畀與了普魯士國的，因此普魯士國王遂即遣派郝格威次 (Haugwitz) 伯爵攜帶哀的美敦書，赴拿破崙之大本營。到了這個地步，普魯士國之參戰，已是大有可能，而不得不作萬一之準備，但為作此項準備，自然不能不預先籌備款項了。石太因除其它計劃之

外，尙提議國家借款，增加與調整國家之賦稅，利用國家之寶藏，也曾想到了發行紙幣，此項紙幣在戰爭期間不兌現，只是到了和平恢復時，纔准兌現。順布倫條約 (Vertrag von Schönbrunn) 經郝格威次之簽字，以及其經普國國王附有條件之接受，已經使普國不作參戰之決斷之舉動，只有一半是決定的事體了。其後又接受巴黎愈加不利的條約，遂完全成了普魯士國王之屈辱。哈敦伯 (Hardenberg) 被迫而不得不舉行的引退，普國與英國及瑞典之糾紛，萊因同盟之建立，在佔領漢諾威 (Hannover) 事件中，拿破崙之欺騙，以及北德意志同盟 (norddeutscher Bund) 之建立，凡此種種，皆係普魯士國行政方面上之重要項目。石太因有鑒於普國國勢上之此種惡劣情況，遂不得不由一位專門部長之範圍內走了出來，過問一切方面之事體。他瞧出了全部國家之缺點，而竟以直率忠蓋之態度加以批評。

他第一次，就是在一千八百零六年四月底已經作下了一的一件偉大舉動，就是他所寫的，要呈普魯士國王御覽的一封意見書，題名：「關於內閣組織之缺點，以及成立閣僚會議之重要之意見書」。他在這封意見書中，對於國王左右極有勢力之大臣(譬如：貝麼 [Beyeme]，龍巴得 [Lombard]，郝格威次 [Haugwitz]，掘開里次 [Köckeritz] 等，加以至爲激烈，且在片段方面頗多言詞過甚之處之批評，在這些批評之後，他緊跟着要求澈底改造至高級之行政機體。他要求廢除當時所設，而帶有管理各省事務之部長之內政與財政合併之總署。替代這一種總署，他要求組織一致的，按照實際系統以排列的內閣，而此種內閣同國王之關係，不可因一種不負責之國王祕書室之干涉，而竟被裂斷。他又要求，須要對一大批姦險惡劣之人物予以撤職，因爲如果仍要令這些人物們掌管他們的職責，那他們非將普魯士國推到了深淵裏去不可。他這一封上國王的意見書，他因施略德爾氏 (Schrötter) 底忠告，後來又加了一番修改，把其中過於激烈的片段言詞略爲減刪。可是他這封意見書八成是既未在前一個，而亦未在後一個形式之中，達到了國王底手中的，因爲他這封意見書經浮斯 (Voss) 伯爵夫人交到了皇

后手中，而皇后將牠扣下，未向國王轉呈。一千八百零六年八月底，又有一封其他的政治意見書，爲約翰乃斯·封·米勒 (Johannes v. Müller) 氏之所書寫，亦是反對國王秘書室之政府的，曾經達到了國王底眼目之下。在簽署這封意見書的人名之中除了皇室中一大批親王，除了俄拉寧親王，(Prinz von Oranien)，除了呂協爾 (Rüchel) 將軍，以及普耳 (Phull) 將軍等等人物之外，也還有石太因 底名字。國王對於這一種出乎尋常的格外步驟，甚覺震怒，他尤其向石太因 表示他的不滿。可是直接在這一件事情之後，意見書上所說的種種事體，便都到了徵驗的時期，那裏面所說的悲愁的預言，也都一一成了事實。對於拿破崙 爆發之戰爭，整個剝露普魯士國 之弱點。耶拿 (Jena) 及奧爾士大特 (Auerstädt) 二城之兩次戰役，野地戰爭之投降，要塞向敵人之交出，一幕跟着一幕地演了出來。舊日腐朽的國家制度，這時竟完全倒塌了。石太因 早已就趁時把國家底金銀庫藏，自柏林 運至什特亭 (Stettin) 城內保存，其後又轉運到科尼斯倍 (Königsberg) 城內，嚴密守護，他自己於十月二十日雖然患着很劇烈的腳氣病，然而仍離開了首都，追隨於國王之後，而同着少數的部臣們在奧斯特勞特 (Osterode) 城內於十一月二十及二十一日所開的御前會議中，力諫普國 國王，不要接受停戰之提議，不要接受拿破崙 所提出之若是恥辱議和條件。他這正大斷然的主見，終究得以爲大多數之所贊同。因此普國 便決定同俄國 連合，郝格威次因 之遂不得不去職，因爲他是反對石太因 底這意見的。當時國王極願意石太因 至少暫時遞補外交部長之遺缺。但是石太因 對於這一點表示拒絕。他所指出的拒絕理由，是對於外交事務不熟悉，他推荐哈敦伯 擔任此職，因爲他覺得，爲辦理外交上的事務，哈敦伯 是更爲合適。但是同時他又迫切奏請國王，依照他從前所上意見書之意旨澈底改革最高之行政機構。因了這一點的原因，於是在國王與石太因 之間，便發生了一種國王秘書室之政府繼續存在之問題之鬥爭出來。國王之意，欲以設置一種有限定的閣僚會議，對於石太因 之主張，僅只作一半之承認。當在龍巴得 去職之後，國王仍願貝麼照舊在國王秘書室充

常樞密顧問官，留御前供職，可是國王所要給予他的這個位置，實在是能與各部長之獨立性大有所損害的。職是之故，施太因既不肯，而哈敦伯亦決不肯以國王之此舉爲然。因此十二月十九日，查斯士羅（Zastrow）出爲暫時代他爲外交部長，品協爾爲陸軍部長，石太因爲內政部長，而財政部亦是要合併於內政部，歸石太因掌管的。這三位部臣應行組織之公共閣僚會議，但須保留貝麼之特權。石太因一看到國王這樣解決他所提議的這改革制度，心內非常不滿，但是他却並沒有負氣求去之心，他只不過寫了一封信給呂協爾，說他所主張的澈底改革，未能得以澈底實行，所以國王給他在閣議中所擬界予的位置，他不能接受。但是呂協爾向國王轉奏他這一番意思時，言詞委婉，多所顧忌迴避，不敢逕直陳奏，所以國王對於這一點，並未能十分醒悟。然而石太因一方面，却總堅持着說，閣議之制度，因他對於他的位置的拒絕，並不能視之爲已經成立的了。兩方面的裂隙，簡直整個透露了出來，當石太因又行拒絕作一封關於一件事體的意見書時，這封意見書，原本是國王最後根據新組織的閣議制度，派遣掘開里次（Köckeritz）向石太因之所要求的。當時石太因不僅只痛恨國王所派遣的這個使臣，他也有些爲他身上的病痛，以及對於他的改革建議不順利的進行的忿懣之所激刺，竟至登時拒絕接收送過來的文卷，因爲他說，國主要他所辦理的那一件事情，不是屬於他的事務範圍之內，他過問不着的。到了這個地步，國王底忍耐力也終究是到了底了。他於一千八百零七年一月三日給石太因寫了函件一封，言詞至爲苛酷強硬，把他在心上對於石太因所攔着的一切言詞，俱都歸納在他的這一封信札之中，而在信札底結尾，還特向石太因說，國家對於他後此的宣勞效力，並不能再作甚麼重大的依弼了，如果他不肯把他這「桀驁無禮，不識敬重的行動」加以更改時。當在國王底這一封書札，經一位傳令的乘馬獵兵送達到他的手中時，他正在想要把他的家眷撇在身後，甚至他這家眷中還有一位患神經熱重病的兒童的，爲的是可以追隨科尼斯倍（Königsberg）朝廷之後，馳赴美美爾城（Memel）。這一封信札簡直一瓢冷水一般，潑到了他的心頭上。

來，使他的一腔熱血不得不爲之寒涼，因此他立即就向國王呈請辭職，而國王也遂即批准了他的辭呈。

他因爲身患病症的原因，所以竟逗遛在可尼斯伯城內，一直到了艾勞(Eylau)的一場戰役過去之後爲止。自科尼斯伯出發，他又攜帶他的家眷轉赴但澤(Danzig)城，由但澤城，在種種危險之下，他同着家眷達到柏林，而於三月底終於返回處在納騷的家鄉中。可是這時一方面，哈敦伯又被召回充任領袖部臣，奮起一切的力量，以使用普魯士與俄國所訂的盟約嘗試着開始擺脫法國統治之壓迫，以及解放歐洲之道路。其他一方面，石太因雖然辭職，耿耿忠心，終究不能把國家底事情忽然置之不顧，所以他在他這安靜暇逸的時間裏，便籌劃怎樣可以把新生命輸入菲得利大王所建立的國家之內去的種種方法。

在訂梯爾西特和平條約之後，石太因奉國王之召，從事他所擬定的政治改良之實施。他更努力作愛國工作。正在這宗非常緊張的愛國工作之中，有一封石太因於一千八百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寫給微特根斯坦公爵 (Fürst Wittgenstein) 的書信，這封信，他很不小心地未用暗碼書寫，可是這封信，竟至爲法國人之所發現，而落入他們的手中。書信底內容，是說的馬上就要爆發的奧國與法國之戰爭，是說的德國人民對於法國之仇恨，逐日增加，是說的可以怎樣去養育這一宗仇恨的計劃，是說的黑森國 (Hessen)，以及維斯特法倫 (Westfalen) 境內，所已經弄成功的種種連絡聯合等等情事。擔任送這封信的人就是陪席判事考排 (Koppe) 氏。石太因還會特別囑咐他，須要用至大的慎重，以免路上出錯。可是後來考排親自曾說，他當時相信，他所要送達的那封書信，僅只是一封普通的國書，而並沒有想到，竟是有這樣重大關係的祕密書信的 (見考排於一千八百一十一年一月二日寫給石太因之書函，函件存納騷石太因文書庫)。無論考排底辯論怎樣，法國駐柏林軍事司令部因在事前得有在科尼斯伯活動的兩個間諜 (就是微捏龍 [Vignerou] 與葉色 [Jiesche]) 關於考排動身時日之報告，於是他在半途中便被法國軍隊之所攔阻，把他所攜帶的信件，俱皆劫奪而去，並且還把他逮

捕了起來。駐普魯士國的法國軍事方面，登時就把這封所截獲的信件送呈拿破崙閱覽，拿破崙有了這封書信，便足可證明普魯士國將要作戰的目的，因此他就非常震怒，於是便硬迫着維廉親王簽署了九月八日之苛酷條約。人們在科尼斯伯得以聞知這件事體時，是在九月二十一日，這一日恰好是俄皇離開科尼斯伯城後的一日，正是他地赴艾府城會議（Erfurter Congress）之半途中。同時人們也就得到了九月八日之法國政府機關報莫尼埃（Moniteur），在這份報紙上把上述的石太因的一封信，全都被照印了下來，而信前面的標題，則為「關於國家興亡之原因上的一篇可資紀念之文章」。石太因一看這宗情形不妙，於是便立時向國王呈請辭職。

因為拿破崙公佈逮捕石太因的命令，石太因乃逃到奧國，在這兒，他很安閒地度過了一冬的時間，他在他的無聊中，研究國家學與各國的歷史，還寫了一封論奧國教育制度之缺點的非常出色的覺書，除此之外，就是對於他的女兒們底教育，下了一番心思。他對於拿破崙統制各國之霸權之易於崩潰之信仰，雖然經過最近奧國這一苦惱之轉變，然而仍絲毫不為其所搖動。他給王妃路易絲（Prinzessin Louise）寫信說：「要說是一種像使我們大家這樣悲歎痛恨，而要求以大家底幸福去為唯一的一個人底意志作犧牲的政治系統能得支持長久的話，這却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一種政治系統，或早或晚，不是為外來的衝擊，也要為內裏的腐敗，終至於倒場的。」比及他最後終究得了可以遷居普拉閣城的政府允許之後，他便於一千八百一十年六月九日遷至普拉閣城內寘宅居住。在這一個大城市裏，石太因覺得較比在步倫那座麥輪省區（Mähren）小省城裏居住着舒適便利得多了。這兒是許多同他志同道合的人們底合聚點，在這兒有一圈子學識高超，而地位重要的人們，可以常常同他會晤談心，譬如說，史登柏伯爵（Graf Sternberg），施塔第昂伯爵（Fr. Stadion），羅斯公爵（Fürst Reuss）以及其他等等人物。這時連他的經濟狀況，也有所改善了，因為普魯士國王這時已經批准，每年給他休養恩俸五千噠啦（Taler）（譯者按，每一噠啦之價值為三百

馬克，此項幣制，現在德國業已廢除)。不過他在這個城內居住着，他的交往，他的信件，俱都被奧國警察一律加以仔細檢查，奧國政府這宗舉動，決無可疑地一半是要防備法國方面或許能發出的責難，其次却就因為梅特涅氏底見解，和他的前任外交部長大有所不同之故，他總是認定石太因係德行同盟黨裏「最優秀領袖人物」之一，並且他總是以爲，他是具有「極端革命的意向」的，而這却是梅特涅之所絕對不歡迎的。這兩種錯誤的意見，梅特涅始終相信不疑，無論甚麼人向他加以指正，他也是不肯聽的，而在普魯士國反對石太因一派人們底許多小走狗們，也都曾同情於他這一種錯誤的見解。

以普拉閣爲根據點，石太因沒有多些時日，已經獲得了對普魯士的國事也可以有說話的機會了。普國這時多納(Dohna)與阿耳敦斯坦(Altenstein)二氏所掌的部務懦弱無力，不敢徹底實施改革制度，因而不得不去職，而代之以哈敦伯。哈敦伯之所特別重視的，是在取得石太因對於他的財政計劃的贊成，因為他這財政計劃，是碰到許多人們底反對的，如順因氏及尼布爾氏便是反對他這計劃的。他令孔特把他這財政計劃報告給石太因，甚至他還親自於九月十四日(這個日期係根據納騷文書庫中之文件而斷定的)暗自特赴離柏門(Böhmen)邊界不遠的赫爾默斯村莊(Hermsdorf)，同石太因作一次祕密的會晤，向他請教，而石太因對於哈敦伯底財政計劃，在片段的地方，雖然加以反對，但就大致上說，却總是贊成的。即在後來，他也還是立在了哈敦伯底一方面的，在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底夏天，他同哈敦伯不斷地彼此來往書信，極表友誼和睦。但是哈敦伯所擬定的農業規章，却經石太因予以至嚴酷的非難。哈敦伯行政上面的官僚基礎色彩，是石太因之所深惡疾痛，況且他對於哈敦伯鬆弛放縱的私人生活，愈不能加以敬重，在後繼的時期裏，他也就愈加決定地予普國首相哈敦伯之作爲加以惡評。到了這個時候，就是連一千八百一十年哈敦伯所擬的那財政計劃，他竟前後自相矛盾地又稱之爲「極其空洞，無實質」的了。石太因當在拿破崙同俄皇的破裂，正在暗中逐漸準備了起來時，度過一個極端緊張的時期，可是

關於普魯士的政策之躊躇不決，舉棋不定的情形，他由他的朋友們底函告中，以及口頭傳述中，譬如說，博以存堡伯爵（Graf Armin von Boitzenburg）之此項函告口述，均得以完全在洞見之中。關於普俄二國之聯合，以及其共同行動之希望，何日不止，何日他總不肯不提及他對於如何解放北德意志人民之崛起反抗拿破崙，以及如何同英國連絡所作之種種計劃。他甚至曾把法國一千七百九十三年至九十四年恐怖時代所組織之所謂公安委員（Wohlfahrtsausschuss）之精神樹立為普魯士國政治上之範圍，並且還要把當時法國所發行之不兌現紙幣之方法，推薦給普魯士國，讓普魯士國予以倣效。及至普魯士國與奧國法國之聯盟條約訂立之後，石太因便參與這時到達普拉閣城的火烈愛國志士閣祿乃爾（Justus Gruner）所作種種勇敢之抗法計劃，而予以至勤奮的襄助。

正在這個期間，他竟居然被自他所深深不滿的「閒散無聊」中撒脫了出來，而又重新返回政治底大舞台上。他的計劃，是要在英國公使底保護之下微服奔赴俄國大本營，這是他令人暗中告訴敏斯德（Münster）說的。但是倫敦方面的回信尚未到達以前，他已經接到了俄皇召他去俄國的函札了。本來俄皇在一千八百零七年間，已經就願意在俄國給他一個位置，以便請他為俄國宣力。而這時因為俄國同拿破崙的戰事，已成決定之局，他們的問題，現在是要把歐羅巴洲自拿破崙底掌握中救了出來，不至使其完全受了「拿破崙底奴隸化」的，所以俄皇在他這種政策上，決不願意缺少了「像石太因這樣一個人底一副精力，和他出類拔萃的材幹」的。石太因一接到了俄皇這一封書札，就毫不躊躇地立即赴俄，應俄皇之召，而於六月十二日到達維爾納（Wilna），因道途努力跋涉之故，他還染了病痛。他見俄皇後，向俄皇拒絕接受一種固定的位置，以便保守他個人的自由，然而尤其在一切關於德國的事件中，他悉行向俄皇建議劃策，因而便成了俄皇一個價值無量的，精神方面的，道德方面的支柱。他追隨俄皇到俄國西部得利薩（Drissa）城內的軍營裏去，既而又追隨俄皇赴莫斯科，並且最後

還追隨俄皇到達彼得堡 (Petersburg)。他自己親手草擬一篇：「呼醒德意志民族」的傳單，經俄國的總司令官令人印刷了出來，向德國內部散布，他們又在俄國組織了一個「德國委員會」。而為這個委員會底靈魂的，就是石太因。除此之外，他們還組織了俄德兩國的義勇隊，由自普魯士國退出的軍官，譬如說：石梯爾普拿格爾 (Stülpnagel)，多納伯爵 (Dohna)，克羅賽微慈 (Clausewitz) 等予以訓練帶領。可是因為閣祿乃爾出人意料之外地，經法軍逮捕了起來，所以許多暗自投奔德國與奧國裏去的線索，竟被中斷。閣祿乃爾雖然被捕，但是石太因在阿倫特 (C. M. Arndt) 的身上，却就又獲得了一個至為有價值的著作方面的同志，為他辦理愛國的事件，也是一樣地熱心，一樣地能幹的。至於說阿倫特能同他一黨一志，暗中互通聲氣地辦理愛國事件，這是經石太因之所特別招致了來的。即連鮑茵到彼得堡後，也加入了他的一黨，而同他有密切的連絡。後來法國有名的女作家封·施達艾爾夫人 (Fra v. Staël) 到彼得堡時，同石太因也一樣志同道合，因為她也是痛恨拿破崙底強霸統制的。

俄皇聽從石太因底話，完全按照着他的思想去辦理。到了此時石太因已經聽見「他對將來至優美的希望，完全打開了。他催迫敏斯德，用英國的款項組織一批德國軍隊，並且設法，要同俄國與奧國聯合了起來。他努力設法，要把鐵維耳 (Tirol) 一帶地方上人民的力量拿來作為獨立戰之用項，像一千八百零九年的前例一般。他預先草擬一份軍事政治之政綱，這是俄國之最高司令官於俄軍進入德境時，須要遵從的。他擬妥了一封言詞火烈的呈函，呈給普魯士國王菲得利·維廉第三，為的是向他進諫，「須要按照着他為國王底義務，採納愛國黨恢復祖國獨立之運動」。約克氏 (Yorck) 之工作，是與他的思想與志願，大有所裨益的。數日之後，就是於一千八百一十三年一月五日他携同阿倫特離開彼得堡，於嚴冬大雪之中奔走於寒的道途之上，因而竟得目觀路途上戰後所遺留悲慘之痕跡，最後奔至俄皇之大本營，而在俄皇之大本營中，於一月十八日，獲得俄皇所畀與他的統制東普魯士與西普魯士之範圍極為廣闊的全權，這是俄皇

完全按照着他的意思辦理的。他的這全權，就是在東普魯士爲俄國對法軍之作戰，籌措協助款項，以及戰時物資，此外就是按照一千八百零八年之種種計劃，將後備軍與國民軍完全武裝了起來，督促對於俄國之供給，務期使其迅速而有序，不至有所貽誤，對於他所認爲無能力，或懷有惡意之官吏，一律可以加以革除，而對於行跡可疑之人，亦更有權可以予以逮捕。然而一俟俄皇與普魯士國王之間的一種最後協定得以成功，石太因之此項使命，以及其全權，應立即消滅，而將以俄國所畀予他的全權所支配之普魯士省區，立即交還於普魯士國王。因爲這時俄國與普魯士國之協定，已經正在準備之中，所以石太因對於他所自俄國方面所獲得的這非尋常可比之全權加緊地利用了起來。不過石太因對於他這全權，一經加緊地，充分地施用了起來，於是他這一種施用，再加上與其它的事故連結一起，遂使普魯士國方面保守派，以及對他懷着猜忌心思的人們，心內更爲感到不安了。關於這一點，他自是絕不過問的，他之所唯一重視的，就在趁着大權尚在掌握中時，以迅速手腕，將民間的力量，全都召集了起來，而逼迫國王不得不聽從他們恢復祖國獨立之計劃。他愈激烈努力達到這些目的，同普國方面的人物們底摩擦，愈加不可避免。

石太因爲實現剛纔所說的他這目的，特於一月二十日之夜間，到達龔賓恩 (Gumbinnen) 城內，他先同順因氏作了一度商談，商談底結果，是使他們兩方面，俱都得以滿意的。即連普國之省長奧爾斯瓦德 (Anerswald) 氏於一月二十三日也答應了，按照着石太因底請求，召開省議會全體大會，因爲這是石太因於他到達科尼斯倍之後，登時向奧爾斯瓦德之所請求的。然而當在石太因於二十四日命令，停止同尙爲法軍之所支配的舊普魯士首都柏林城的一切職務連絡時，奧爾斯瓦德竟將他召集省議會全體大會之文件加以更改，而僅只是成了召集省議會各代表，作一次無形式之會聚，以便討論石太因向他們所告的事件。石太因對於奧爾斯瓦德擅自更改他的這一道命令，非常痛恨，但他也只好將就，而並沒有甚麼可說的。他特特宣言，廢除拿破崙對於英國貨物所加的歐洲

大陸之封鎖。並且他還會辦到，普魯士省區各醫院中所收留之俄國與法國之傷兵與病兵之給養與醫藥費用等項，均由俄國負擔。但是他所要求的在德國境內施用俄國紙幣的一點，却碰到了當時普國方面的猛烈反抗。他的專制的，粗暴的態度舉動，使當時的普國人們很有些受不了，甚至像約克那樣一位愛國的人，也都有如此感覺。一場新的衝突，又發生了起來，當在染患疾病的奧艾爾斯瓦德自行宣稱無能力再向下擔任各代表會議之首席，而石太因竟不顧議會憲章，擅自出頭，先請順因氏出來擔任此席，但因順因向他加以拒絕，於是他又請約克氏出來擔任時，因此遂致發生激烈之爭執，直至石太因退讓方行中止。結果乃仍由奧艾爾斯瓦德委任代表，這位代表根據石太因所表示的要求出來開始議會之會議，約克氏亦出席於會場之中，而向人民施以武裝之問題遂行通過，這一個問題通過之後，石太因已經很覺滿意，不欲更向下再有所舉動，因於二月七日復行返回俄國之大本營。石太因之此行，總可謂不虛，救國之事業他已予以根本之推動，而後此之進展，更已樹有不可動搖之基礎。

但是普俄二國間之盟約，仍尙未能得以訂正了起來，雖然普國國王這時業已動身赴布來斯勞，因得以擺脫掉了法國方面之羅網。為謀事機迅速，剷除一切延拖遲緩起見，石太因特於二月十日奏請俄皇，逕行派遣他，親自去覲見普王。但因可乃賽白可氏 (Knesebeck) 在卡利什 (Kalisch) 關於此點豫先同普王之交涉過於延遲，遂致珍貴之時間又行喪失。最後俄皇乃得決斷，派遣石太因偕同安施特得氏 (Anstett) 以全權大使之資格赴布來斯勞。他們二人於二月二十五日到達此處。假使人們對於普王致俄皇之一封信函中之一段，作逐字逐句之了解時，則石太因並未曾於行抵布來斯勞後，立即覲見普王。然而根據栢茵氏之報告，石太因於到達布來斯勞後，雖然身染痛風病症，週身劇烈痛疼，然而仍尙立即乘車趨朝，覲見普王，在朝中他也還同哈敦伯會晤暢談。可是緊接着其後繼的數日內，石太因底病勢愈行加劇，轉成了一種極危險的熱病 (Nervenfieber)。他費了極大的力量，纔得在王笏旅館 (Gasthaus Zum Scepter) 房頂間中找到了

一間簡陋不堪的窄小房屋，以爲暫時居住之所。而國王竟無絲毫對他同情之表示。在這其間普俄二國間之盟約，業已締結了起來，俄皇即將駕臨布來斯勞，以便與普王會晤，所以普國朝廷上的一般人物們，對於石太因就又開始略加敬重與注意起來。這宗情形竟又陡見增加，當在俄皇於到布來斯勞後，因石太因病體未曾復原，不能出離屋室，所以特命駕親自前來看望石太因時。可是石太因此次之行，並未能得與普國國王發生一種愈加接近之關係，而同哈敦伯亦並未發生此項愈加接近之關係，這或許是出於哈敦伯底嫉妬心，生恐怕石太因同他競爭位置的原因了吧。

在七月間，當他在布魯黑撒爾 (Bruchsal) 的巴敦國朝廷上，又見到俄皇時，他就又獲得了出席維也納會議之邀請。自一八一四年九月中旬至一八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他逗遛在維也納，終日處於各邦國元首以及各政治家豪奢富華之交際生活中，可是他既沒有興趣參加到處盛大響噪之宴會，然而也並不屑作那謙恭馴順，低三下四的巴結行動，所以他在維也納所處的一種狀況，時期一經久長，便很難使他滿意的了。他本來以一位德國人，而爲俄國大皇帝策劃計謀，然而也並未服俄國之一官一職。俄皇對於他的親信，是和對於他左右的大臣卡胞抵斯特利亞 (Kapodistria)，拉蘇毛夫斯奇 (Rasumowski)，擦爾托里斯奇 (Czartoriski)，乃賽爾羅得 (Nesselrode) 等等的信任，毫無所殊的，雖然俄國這些大臣中也頗有幾位，是很和他合不來的。普魯士國派遣到維也納來的代表，哈敦伯與洪保德，固然覺得，總是須要時時聽從他的計劃，但是哈敦伯和他並未發生親密之關係，而國王對於他，也是已經很生疏了起來。因此他在他自己的日記中，就曾說：「由我所處的這非此非彼的半關係之中，僅只能發生人生之厭惡出來；我雖然能發出影響去，然而却沒有澈底的實權，況且我這些影響，還是對於道德能力極不圓滿的一些人物而發出的，可是這些人物，還是我們拿來，要作爲達到偉大目的之用項的。雖然如此說，然而他的活動，却是極端多方面的與深入的。僅就他人生歷程上這一段時期裏，親手所擬定的些計劃草

案，意見書，覺書等之總數言之，已經就很有可觀了。除此之外，他還在關於整理瑞士國事件之內閣委員會所開之各次會議，均曾參加。關於南部德國憲法之草案，也是他所擬定的，而這憲法之用意，還是要對以前萊因同盟各邦政府所持之土耳其國王專制式政治予以澈底鉗制的。再就是關於巴敦國 (Baden) 皇室繼承問題，也還是他擬定了解決的辦法，凡此種種均係他工作中的犖犖大者，其它的一些，可以不必細述了。

在維也納會議未開之前，他所最關心的，便是波蘭薩克森國的事件，因為這件事情，簡直似乎能有使全盤維也納會議崩潰之危險。一八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普國與俄國之間所訂條約上，列有石太因底姓名，根據這一份條約，薩克森國之統治大權，暫時應行移交與普魯士掌管，況且這一份條約，尙且能令人希望，薩克森國之全部，均可與普魯士君主國結合一起，雖然薩克森國，仍可保存其王國之名義。這一點，他可真是爲普魯士盡心不小，然而在後繼的時期裏，普魯士竟被逼迫，而不得不把薩克森之一部分重行放棄，這不能不使他深深感到傷痛了。同樣使他不能不深深感到傷痛的，就是俄皇對於波蘭之要求，全部均行揭露。因此在他同俄皇亞力山大 (Alexander) 之間，所作關於這個問題之口頭談判，就頗爲有些激憤不平了。即連要給波蘭人民創立一種憲法的思想，也是不能獲得石太因底贊成的，因爲他向俄皇反駁說「波蘭並沒有第三階級，就是並沒有市民階的，所以焉能用得着憲法呢。」在這宗情勢之下，普國國王菲得利，維廉第三 (Friedrich Wilhelm III.) 又向俄國一方面的傾倒，而與之訂立條約之舉，却就很是惹動他的活躍的不滿的。及至後來對於普國之形勢，愈演愈惡劣，而又經法國使臣塔雷蘭氏 (Talleyrand)，向各方面之挑撥，其惡劣之形勢，只有增而無減時，石太因最操心而努力以謀求的，便是維持和平，不使維也納會議破裂的一點了。他這一種操心，雖然得以祛除，但是他仍按捺不住，在給他夫人所寫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國事底進行」給他弄出不少的「苦惱」來。

他這一些傷痛苦惱上的一種重大的原因，就在商談德國憲法問題之經過方

面，這個問題，當在維也納會議開會之時期中，較比任何一件事情，都使他操心勞神。可是如果人們對於石太因關於全德國憲法之新組織之見解，欲作一通盤之觀察時，那麼人們便不得不回頭一提一千八百零四年石太因對於納騷皇室那種吞併沒收之行動所作的一種火烈的反對。那個時候，他曾說出了他的希望，深願親身經歷一經歷，「那些小邦小國，悉行予以取消，而去與那兩個幅員廣闊的君主邦國聯合了起來（就是去與普魯士和奧國聯合了起來），這兩個君主邦國之存在，簡直就是所謂德意志之名稱之存在」。這一個思想，他仍沒有放棄的，當在他本着一腔深信拿破崙所建立大統一國之崩潰即在眼前之勇敢信仰，於一千八百一十二年九月十四日為俄皇草擬一篇關於德國之將來之覺書時。他認為，「把德國所有各邦國聯合了起來，組織成一個大君主國」，像在紀元後第十世紀至十三世紀所已經實現過的那宗方式，無論這宗方式多樣值得希冀，然而從歷史的發展方面說，均屬不可能。只是奧國與普魯士國之間的一種以邁恩河線(Mainlinie)為界的劃分，或者是由於顧惜，而不取消其獨立主權之國家，對於上述兩個大君主國作同盟之結合時，他纔覺得，這方能是剷除舊日大統一德國憲法上之各項缺點的。這兩種可能中的第二種，我們由他在其他地方所說的許多言詞中推斷，就可以知道，的確是他當時所嚴重主張的。他當時是立意要把許多邦國底皇室給剷除了，把殘餘了下來各邦國，弄成了「圍繞着他們的大國底藩屬」，這樣一來，便可以使這些小邦小國不會再有「像些小孩子一般的自豪自大底可能」了，這是他於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在敏斯德氏(Münster)底面前都會說過的一句話。但是在這一個思想之外，他仍還懷有把德國大皇帝，再行樹立起來的志願，這個德國大皇帝底地位，是他覺得，可以在奧國哈布斯堡(Habsburg)皇族中世代傳襲的，照這樣看來，這一種志願，在石太因這一位帝國騎士階級底後人底心中，終究是深深伏根，而未能得以斷絕淨盡的了。況且他這一種心思，他於一千八百一十三年八月底在普拉格所作之一篇覺書中，也還真正透露了出來的，這一封覺書，他又曾加以節刪，呈請俄皇閱覽。在他這一篇覺書中，

已經同時寫有恢復德意志帝國國會之建議，以及帝國權威與各邦主權之範圍之劃分。即連舊日之各邦議會在各單獨地區內之存在，亦是在他這篇覺書中，視之爲前提的，不過這種議會底職權，却與省區立法相同，並且在承認賦稅之事項上，亦正復相同。但是普魯士國，在石太因之思想中，雖應合併北德意志各邦，而爲一強大之國，然而却並未被石太因目爲德意志帝國之直接肢節，即「一千八百零五年領土狀況」下之奧國，亦是未曾被石太因目之爲一個這樣的肢節的。他之所擬定的，僅只是一種「德國同盟」，就是「奧國和普魯士之同盟」，他以為，這一種同盟已經就足毅有能力，可以建立與恆永保持德國境內各民族之安全與完整的了。

石太因底這一種劃分不清，鎔帝國主義與二元主義於一爐的計劃，實際上的事實，竟疾速地邁越而過，使人無暇顧及。他所擬定的皇帝思想，爲奧國權威方面之所鄙棄，同萊茵同盟各公爵國所訂立各種條約，以及北德意志舊狀之恢復，遂使各中等國與各小邦之主權仍得以照舊保障，照舊存在。在朗格來司 (Langres) 及邵虻 (Chaumont) 二城內，當時之各強國即曾首先確定，德國之組織，應爲由各獨立公爵國之同盟而成立者。這個思想，好壞固不俱論，然而亦竟爲石太因之所採納，不過他對於這個思想底採納，也還不是沒有受到洪保德所寫的一篇覺書底重大影響的，這篇覺書，是有人於一千八百一十三年十二月間報告給他的。不過洪保德一方面，在他這篇覺書中，乃係主張德意志同盟最高統制權，應行歸奧國與普魯士共同掌管，而石太因於一千八百一十四年三月間，却又自行建議一種執政委員會 (Directorium)，由奧國，普魯士國，巴燕國，以及漢諾威國 (Hannover) 等組織之，並應賦與以擴大之權限，以便共同負責管理德意志同盟之事件。所謂擴大權限，則係指包括外交權，對於開戰與媾和之決斷權，以及軍事最高統轄權等而言。在這一種執政委員會之外，他還擬定一種統一之德意志同盟國國會之制度，按照他的意思說，這個國會，應行由各公爵，各自由城市，各邦議會等所遣派之代表組織之。其權限應爲立法權，爲對

於同盟國之目的所擬徵收賦稅之承認權，以及爲對於同盟各邦之間，並各公侯與人民之間所起紛爭之決斷權。德意志之同盟，應行造成一整個之關稅區域，並且除各項賦稅外，還可以設立萊茵河流域，以及邊區稅關稅卡，以便特另徵收關稅，充實同盟國之支出。在他這篇計劃中，再二再三提到應以各邦議會之活動，連帶所有一切失去統制權之公爵，伯爵，德意志帝國騎士等之效能爲前提，並且他還在他這計劃中列出一大批個人個體之特權。——石太因底這些計劃，連同許多其它材料，悉行爲哈敦伯在作一篇憲法草案時之所利用，關於這篇憲法草案，哈敦伯於一千八百一十四年七月間，曾在佛蘭克府予以提出。可是當在石太因對於哈敦伯這篇憲法草案，表示意見時，他又自他末後的立場上退返了回來。這樣譬如說，他竟贊成奧國應行統制一切，爲統制之首席起來了。他尤其是又返回他舊日的一個思想上頭來，就是縱然不能令普魯士國與奧國所有位置在德意志同盟國境內之省區，全都不加入德意志同盟國，然而亦要有一大批，不令其加入的，爲的是不要因此而騷動了這兩個大國「內部的組織」的。他特別的所懼怕的，就是所有奧國之一切省區，全都加入德意志同盟中來，因爲既這樣的話，那麼「人們對於其餘部分的德國所要擬定的憲法，便不得不擬得鬆弛寬闊，因而竟至使這宗憲法，對於土耳其國王專制主義之橫行，便不能予以多大之保護了」。所謂德意志同盟國，在他的意思之間，是「只許包括銀河(Inn)，埃爾貝河(Elbe)，普魯士邊界，艾得爾河(Eider)，以及鄰國邊界之間的各邦國的」，德意志同盟國，應行經普魯士與奧國予以坦保，而此二國，更應同此德意志同盟國，用一種不可解除之協約，永遠結合一起。哈敦伯對於石太因底這種計劃，完全同意。然而及至石太因底一位親信人物，就是封，索耳穆斯，勞巴哈伯爵(Graf von Solms-Laubach)，把石太因所擬的這篇草案，帶到維也納，交付於洪保德時，洪保德招集漢諾威國之代表，開會討論石太因這篇草案，可是在討論中，他們大家都一致不滿意石太因要把普魯士與奧國置之於埃爾貝河與銀河之彼一方面去的思想，於是就逕直拋棄了他這個思想。

當在維也納會議行將開始之前，普奧二國之情勢，是已經發展到了這個地步的。石太因雖然時而如此，時而如彼地主張，在極其不同，極其矛盾的計劃之中，盪游無定，然而他的目光之所注射的，却總在「要使德國，成爲一強大之國，以便可以再奪回牠的獨立，牠的自由，以及牠的國粹，而能長久保持之」。如果爲達到這個目的，要叫他從實際方面劃策建議的話，那他決非不是一位中央集權者的，至於他志在使普魯士國爲當時各邦之首腦，執當時各邦之牛耳，至於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皆係爲這個思想作先驅，這是更不用說的了。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十二月間，他已經曾向敏斯德寫信說；「在政治方面，我的信仰，是德國底大統一；這大統一，如果只要用一個方策，一個過渡的道路，以謀求，那便要是不可可能的了」。維也納會議開始後，因他的推動，當時四個聯合起來的強國底代表，方行決斷，把德國的事件，自歐洲的事件上劃分開。而所謂德國的事件，須讓奧國，普魯士，漢諾威，魏登倍（Württemberg）等五個巨大德意志國家組織之委員會，自行開會商討，而不可與所謂歐洲事件，混爲一爐。因此即先前萊因同盟中的兩個國家之加入德國同盟，已經就使他心內不能不發生極大厭惡的。可是及至這兩個國家對於經其它三個國家所議定之同盟草案，加以反對時，石太因竟請俄皇加以干涉，並且還嘗試着藉「萊因神使報」（Rheinischer Merkur）向社會上的一般輿論發出影響，而激刺小國去反對中等邦國。可是因此而竟惹起了一種運動，這個運動所達到的地步，却就遠遠超越他的目的之外去了。欲恢復大德國帝國之思想，並且還要是把這個皇帝地位，認爲應還奧國皇室世代承襲，這個思想，是絕對攪擾關於儘可能地切合國民需要的一種同盟制度之思想的。在某一期間，石太因還在堅持着他這個儘可能切合國民需要的一種同盟制度的思想，而他同時也在嘗試着留意於業已失去統制大權各王公，以及帝國騎士等之權利，並且一樣地嘗試着擴大人民之法權。但是因爲波蘭與薩克森之危機發生出來之後，維也納會議上德國委員會暫時停止活動，而奧國特來爲德國制定一種憲法，而將普魯士國除外，欲請人們加以贊成時，他從前對於奧國哈

布斯堡皇室的傾向，就又有了力量了。石太因這一點傾向奧國的心情，已經就足夠惹起攪亂來的了，當在一千八百一十五年二月間，關於制定一種德國同盟憲法，在所有一切德國王侯與自由城市參加之下，所擬開之最後會議，似乎又有些到了活動地步時。石太因在當時極其勤奮地煽動人們贊成大德意志帝國世代相襲，而應賦與豐富權限之皇帝尊位之恢復，而他還是宣傳這個皇帝尊位應行歸奧國承襲的，石太因之此舉，無論僅只是出於他覺得非此不足以把奧國束縛於普魯士國一方面之心思，或者無論是因為他受了當時社會上所起勇猛的浪漫主義的思潮之影響之原因，總之，這是使普國派赴維也納參加維也納會議之全權代表之所大為不愉快的事件。石太因對於他這個主張，可真是努力地去奮鬥，對於反對他這主張的人們，他竟設法藉俄皇底力量，向他們施以壓迫，並且同時又向報界方面發出一種影響來。但是雖然如此，然而他仍眼睜睜地瞧着他的計劃失敗。及至維也納會議之工作中斷之後，這是因為拿破崙又自愛耳巴（Elba）海島重行返回巴黎之所使然的。關於制定德國憲法之工作，於是便以採納那一種為石太因之所非常不滿意的同盟條約而終結，因為石太因對於該同盟條約之批評，說：「這份條約，對於德國之公共福利，是只能有一點微薄的影響，可以能令人們期待的」。

石太因於五月二十八日以前，維也納會議尚未閉會時，已經就離開了維也納。他在納騷地方與埃木斯洛場（Ems）從事休養精神，消消停停地渡過了這一年底夏季。他又到海岱爾倍（Heidelberg）去閒遊了一回，在這兒又使他得以同俄皇接近，他還同德國之大詩人歌德（Goethe）一起到可恩城另作一次閒遊，在這座城市之內，德國之詩人與政治著作家阿倫特（Arndt）曾瞧見這兩位「十九世紀最偉大之德國人」，併肩行走於大教堂之中。及至法京巴黎第二次又被聯軍佔據之後，和平交涉又行開始，石太因就又奔到了巴黎去，這是因為哈敦伯招請他到那兒幫助着辦理德國事件的原因。可是他到巴黎後，極蒙當時亦在巴黎的俄皇底優待，然而俄皇在劃定德國國界的事件上，却並不因石太因底原因，而

對於德國之要求有所支持。因此石太因自八月十四日直至九月十日，在法國首都之逗遛，已經完全失去了他這逗遛底作用。可是石太因於九月十日由巴黎返回家鄉之後，他同俄皇的關係，已算解除，而他對於政治的生活，也算脫離。

奧國首相梅特涅請他出來，担任同盟國議會會長之職，以及哈敦伯聘請他，担任普魯士駐紮同盟國公使之職，他均行加以拒絕。一千八百一十七年普魯士國樞密院成立，這樞密院之制度，當然不是本於他所擬定的計劃的，而這樞密院中，亦並未曾昇與了他一席位置。即在納騷公爵國議會中貴族席上，他的議席也是長期空着，而不能見到他出席的。一千八百一十四年的納騷憲法，其內容固然也不是沒有石太因底重大參加的。可是因為他對於納騷部長馬沙耳 (Marschall) 之行政，深表不滿，所以他竟拒絕向納騷公爵宣示，無條件地盡忠於他，然而這一種宣示，可是在招集議會會員時，所有會員均須一律作的，因此他只好從此不出席納騷議會了。這樣，按照着他自己的話說，他已經是趨入了人生上可以解決兩個問題的新段落了，兩個段落，就是「辭却國家職責，優游林下，以頤養天年的了」。可是在他家居閑靜的時刻裏，他為他產業底管理，還首先下了一番仔細心思。一千八百零二年他曾將遠在波蘭境內位於瓦爾特河畔 (Warthe) 的賈保穆氏 (Birnbaum) 底領地置買到手，但是現在他覺得這個地方離他的家鄉過遠，所以他竟向國家方面交涉，以這一帶產業，換取位置在近處的可本柏 (Cappenberg) 地方的官田，這樣，石太因便又於他所念念不忘的維斯特法輪省區相接近起來了。這位經多見廣，而經驗宏富的林下寓公，無一處一地不是向着正當方面走的，他無論到甚麼地方，對於貧苦人民，全都是厚待優賜的，對於農民們，全都是親善友好的。他對於賓客的優待，始終如一，這宗情形，就是在一千八百一十九年他的夫人逝世，他的兩位女兒出嫁後，仍然毫無所變更。他的兩位女兒中，一位就是恆麗特 (Henriette)，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嫁封，吉喜伯爵 (Graf v. Giech)，一位就是特賈賽 (Therese)，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嫁啓耳曼斯艾格伯爵 (Graf-Kielmanssegge)。 石太因雖然於一千八百

一十七年右眼失明，然而他仍毫不疲憊地研究他所心愛的歷史學。

政治方面所發生的種種事體，他都以至活躍的興趣予以注意，而在他向各方面所發出的信件中，關於這些事體，往往也不是不用激烈有力的言詞，以表示了他的意見的。像他那樣派頭的一個人，在自由黨派底眼目中，既視之為過於貴族化，而在正統派的保守黨底眼目中，則又視之為過於平民化了的，在時代底矛盾下，自然不會感到舒貼滿意的了。當時有所謂「不着褲子派的著作家 (sansculottische Schriftsteller)」，（譯者按：此即宣傳過激共和主義之著作家之意），石太因既對之深惡疾痛，而對於「坐在公事房中從事組織計劃的官僚派 (organisirende Buralisten)」，他也是一樣的表示不滿。他的住家在萊茵河畔，以及在維斯特法倫省內的貴族朋友們，努力謀求階級議會之恢復，他對之既絕對贊成，然而同時他又嚴重警告他們，「不要恢復他們的種種特權」，並且他還主張對於「那些沒有家譜可以拿出來向人相示的貴族們，應行由貴族階級中予以剷除」。對於「那些半學者，以及被誘惑的青年們底愚狂行動」，他是有至鋒利的言詞，加以切責的。但是深深使他感到傷痛悲恨的，就是普魯士國對於奧國逐漸增加的反感，以及普魯士國所受奧國之剋制。爲了這個緣故，他有時竟會極悲觀了起來，於是便要怨恨着說：「我一生經歷經驗之總結果，便是使我得以明曉，人類知識與行動，尤其是人類政治方面的行動，皆是毫絲價值都沒有的」。可是又有一次，他很歡欣地，充滿了信仰地說，他一生的努力，總不能算是枉然的了，尤其是在普魯士國，不是沒有播種下了豐饒的種子的。

他的目光之所注射的最重要的事情，始終皆爲普魯士國憲法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之所最爲醉心的，仍還是關於省區階級議會之組織，而附以合乎時代性之變更。這宗省區階級議會，對於省區賦稅與省區法律，應行具有決斷之權。可是在這省區階級議會中所應具有的「騎士階級 (Ritterschaft)」，他却以爲，這應當是由具有大家皆能獲的不動產的貴族份子之所組織成的，然而對於市民全部代表，他並不要求，他們非有不動產，則不能充當代表的。然而有一

點，他却仍堅持到底，就是他以為，「普魯士君主國之統一與能力，必將要動搖不穩的」，如果省區階級議會在普通立法與賦稅問題方面，要去替代了德意志帝國階級議會時。然而如果人們要是假定，一千八百一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普魯士國王允許將來給與國人一種基於代議制度之憲法之詔諭，是有他的參加成分的，那這却就完全錯誤了。對於這詔諭上的措詞，他曾予以極鋒利痛切的非難。然而這詔諭既已為一切法律之基礎，也只好聽之而已的了。他還會寫信給艾欣和恩氏（Eichhorn）說：「即連人民中最糊塗的一個人，人們也不能使得他相信，國王是否要去滿償他所允許了的一種義務，或者甚麼時候，以及怎樣去滿償這一種義務，這是得要完全看國王隨時的意志怎樣的」。當在他於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季夏，他到各省區遊歷，以便搜集珍貴材料，作為研究憲法之用項時，阿耳敦斯坦（Altenstein）曾同他會面談話，所以他對於普魯士憲法的意見，究竟怎樣，不能不向阿耳敦斯坦有所揭示的。他對於洪保德氏所作關於一千八百一十九年之憲法之典模的意見書之批評，可以證明，他現在多樣深切知曉，有決議權的德意志帝國階級議會，是多樣必須的。當在普魯士之最末後憲法委員會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在普國皇太子主席之下，作了最後的決斷，關於何時與怎樣招集德意志帝國階級議會之問題，須讓各邦國便宜行事，自行解決時，他承皇太子底面詢，而向他答稱，省區階級議會之制度，可以說是「對普通階級議會所負困難使命的一種事前練習」。他所作的一份關於省區階級議會之組織的意見書，這本來是人們同時為給他一個面子，請求他擬作的，始終也並未為人所注意。雖然如此，然而他也並未曾懷着一腔忿懣，悻悻不平地撤身退隱，甚至一千八百二十六年，人們擬請他擔任維斯特法倫省議會會長之職，他還欣然接受了。他曾三次主持了這個議會裏的會議，並且因他的出席，而使全會生輝。但是他雖然能這樣尊嚴地充當議會會長，然而他激烈嚴峻的性格，總免不掉會時而傷及一位兩位的議員的。即連他多年以前的一位老屬員，就是當時正在充任議會委員的文克氏，他同他在關於地租事件上，也是一樣地起了爭端。在會議

中，他自己的意見，往往始而如此，始而如彼的主張不同，並且還是各致其極地互相矛盾，譬如說在關於贖回地權之規章之爭論上，他就是這個樣兒的。

除去這一次重行走上政治舞台的行動之外，使年事愈來愈高的石太因氏不至於完全消沈在遁世隱居生活之中的之事體，就是他所作的多次的旅行。一八一七年，他曾到斯圖加德(Stuttgart)城內覲見魏登倍與旺根海穆國王(Württemberg und Wangenheim)，並且還同這位國王談論了魏登倍國制定憲法的事件。一八一八年，他赴阿痕之會議(Cognress von Aachen)，因而又與俄皇相晤談。自一千八百二十年夏日起，一年的時間，他攜帶他的兩位女兒漫遊瑞士與意大利。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他又到土靈根(Thüringen)與施雷仙(Schlesien)等地方，會見他舊日的老友。他會有數次，每逢到了冬日，便離開他莊田上的住宅，搬到佛蘭克府城內居住些時，使他的生活不至於枯燥寂寞。一八二七年的春天，他於十八年的闊別之後，又重新走進柏林城內來。在這兒，他最後又被普魯士國王聘請為樞密院中之會員，然而他僅只有一次參加樞密院所開之會議。

他生命上的末後一段時期，是還曾受到了法國七月革命之爆發(Juli-Revolution)，以及其暫時的結果之所震撼驚擾。他對於這七月革命，尤其是在認這革命為一種搖動歐洲安謐之危險暴動之視角之下，加以觀察的。然而他却也不曾被尼布爾(Niebuhr)氏心內所起的那悲觀絕望的情調之所傳染。他還又有一度出現於維斯特法輪之省議會中，對於普魯士之偉大將來問題，作了演說，當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因政治上新推動之影響，在這兒人們提議，要向普魯士國王請願，請其招集德意志帝國級階議會時。這個請願，在這個形式之中，他因為願慮到戰事的危險，以及人心之震動，所以便認為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他竟也情願擔任，去向萊因邦(Rheinland)與維斯特法輪之總督維廉親王(Prinz Wilhelm)請求出來週旋這件事情。他也果然把他這個使命辦理了，但是他却很不滿意人們用印刷物，將議會中之該項會議傳播了出去。而這也竟令

柏林政府方面有所藉口，公然來禁止該親王迎合維斯特法倫省議會之請求，出來斡旋這件事情了。這件事體底一種這樣的經過，是不能不使石太因心內感到傷痛的。他曾給格耐色璦寫信，信內的言詞，很表示了他對於將來時代預感預覺的見解，因為他說：「一代新的人物，要走了上來了；最爲得計的，便是走在他們前頭，導引着他們手裏所拿着的火把，不要讓他們出錯，趁着他們還沒有到了出錯的，到處破壞的地步」。這樣，他一直頂到他將死時的最末後時刻，都是忠於他的一生皆然的天性的，就是他一生總愛趁時地施行改良，以便避免革命。

及至後來，他的體力愈久愈受到病痛底侵害時，他的思想就愈益向着人生歸宿方面轉了過去。多年以前，他已經把他所寫自己一生經歷的節略結束了起來。在這結束的一段上，他曾說：「自這兒起，我無所期待，無所希望了，除了在斷念中，在虔敬中，在希望與信仰中，作精進之實習之外。」他深深爲宗教的信念之所灌漑，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着說，他的人生底終結，將要引他「達到一個較比塵世上的使命還要高貴的使命上頭去」。他的腦中所常起的暈眩，以及他屢次失神的狀態，這都豫告他這人生底終結，是快要蒞臨的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他最末後一次出現於哈穆之縣議會中。這一件事情過去之後，馬上就有一場猛烈的傷寒重症使他在可本柏城內躺倒床上，不能起來。六月二十九日遂卒於肺中風之症。他的遺骸被殯葬於離埃木斯河不遠的弗慮喜特地方的家墓中，一邊靠近他父母底墓，一邊靠近他夫人底墓。

石太因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身體厚重堅實，而膀臂寬闊。他的額部飽滿，而目光火烈，炯炯有神。圍繞於他窄薄嘴唇底四角，時起莊肅，時起譏嘲之皺紋。他說話時，言詞堅定，穩重，而疾速。凡是走近他身前來的人，便會登時獲得「這個人決難爲人之奴，而去奉侍他人，他必要處處作主，處處高人一頭，而總要佔上峯的印象的。」

政治論擇鈔^(一)

Politische Leitsätze

石太因(Freiherr vom Stein)著

關琪桐譯

Es ist gewiss, dass der philosophische Geist, welcher die Beziehungen verallgemeinert und die vereinzelt Gegenstände unter einem Grundsatz oder einem höheren Gesichtspunkt zusammenfasst, diejenige Art des Geistes ist, welche den grossen Mann bezeichnet; aber mit dieser Geistesart muss er die Kraft des Charakters verbinden, welche ihm in ruhigen Zeiten den Fleiss zur Arbeit, die Hartnäckigkeit, alles, was auf seine Ausbildung einwirkt, zu verfolgen, in den Zeiten der Tätigkeit die nötige sittliche Kraft gibt, um die Anstrengungen des Geistes und des Körpers zu ertragen, welche der Drang der Umstände erheischt. Es war Mangel an Charakter, was in der Revolution die tugendhaftesten

我們確知，哲學的精神就是使偉大人物超越庸流的那種精神，那種精神可以把各種關係普遍化了，並且把各種特殊的對象統攝在一個基本原則和較高觀點之下。但是他還必須把品格的力量與這種精神結合起來才行，這種品格的力量在平靜的時候，使他努力不懈，從事工作，不屈不撓，進德修業，在活動的時候，又給與他以道德的力量，以便忍受緊迫環境。所需要的勞精敏神的黽勉奮發。這種德性的缺乏，在法國大革命時，正使那些極有德性，極為開明

(一) 譯自 Deutsches Lesebuch. Verlag der Bremer Presse, München 1926. Zweite Vermehrte Auflage S.242-252

und aufgeklärtesten Männer gestürzt hat, wie Mounier, Bergasse, Bailly, selbst unter den Girondisten Condorcet, Roland, was die einen in die Verbannung trieb, die anderen unter dem Dolche der Parteimenschen fallen machte. Es war diese Charakterstärke, welche man Enthusiasmus nennt, die den Thron der Kalifen gegründet hat, die durch Streben nach Reichtümern, Liebe zum Ruhme, den Hang des Jahrhunderts nach Abenteuern hervorgebracht, die spanischen Eroberer Amerikas und ihre Sieger, die Bukaniere, begeisterte.

Lebt der Mann, welcher sich durch die Natur zu einer grossen und nützlichen Laufbahn berufen fühlt, inmitten der Weichlichkeit der Höfe oder unter kleinen, kleinlichen Leuten, so kann er nur dann sich erhalten und diese Charakterstärke entfalten, wenn er sich mit den grossen Männern der Geschichte umgibt und sich durch ihre Vorbilder gegen die zerstörenden Eindrücke verderbter und kleiner Umgebungen schützt.

* * *

Ich halte es für wichtig, die Fesseln zu zerbrechen, durch welche die Bureaukratie den Aufschwung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 hemmt, jenen Geist der Habsucht, des schmut-

的人們，如謨尼挨，柏格思，巴宜等人甚至如吉倫黨中的孔道塞，和羅蘭等人，都一蹶不振，並使前一些人遭了放逐。後一些人，落於黨人刀下。這種品格的強力，人稱之為熱忱，它曾建立了「凱里夫」的王位，它曾藉着貪財和好名之心，喚出了此世紀人的冒險熱，它曾鼓舞了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和其勝利者，與海賊。

一個人如果生在宮廷的萎靡之中，或者生在渺小卑賤的人羣之中，可是他又覺得自己的天生的使命正在於一種偉大宏壯，有益於世的生涯，那麼他如果要想卓然獨立，而發展了這種品格之力，惟一的方法就只有，尙友於歷史上的偉人，而藉他們的模範，來抵禦那惡濁渺小的環境所加於他的那種毀壞的印象。

* * *

我以為重要的事情乃是：把官僚政治所用以箝制人類活動之騰躍的那些粘栓打破，並把那籠罩了這個政體

zigen Vorteils, jene Anhänglichkeit ans Mechanische zu zerstören, die diese Regierungsform beherrschen. Man muss die Nation daran gewöhnen, ihre eignen Geschäfte zu verwalten und aus jenem Zustande der Kindheit hinauszutreten, in dem eine immer unruhige, immer dienstfertige Regierung die Menschen halten will. Der Übergang aus dem alten Zustand der Dinge in eine neue Ordnung darf nicht zu hastig sein, und man muss die Menschen nach und nach an selbständiges Handeln gewöhnen, ehe man sie zu grossen Versammlungen beruft und ihnen grosse Interessen zur Diskussion anvertraut.

* * *

Hat man sich überzeugt, dass das Verdrängen der Nation von jeder Teilnahme an der Verwaltung öffentlicher Angelegenheiten den Gemeingeist erstickt, und dass dessen Stelle eine Verwaltung durch besoldete Behörden nicht ersetzt, so muss eine Veränderung in der Verfassung erfolgen. Das zudringliche Eingreifen der Staatsbehörden in Privat- und Gemeindeangelegenheiten muss aufhören, und dessen Stelle nimmt die Tätigkeit des Bürgers ein, der nicht in Formen und Papier lebt, sondern

的貪得之情，嗜利之心，因襲之習，消滅了。我們必須使自己的民族習於經營自己的事務，而使他們脫除了那永久騷動永久多事的政治所想把他們禁錮在其中的那些幼稚狀態。要由舊的事物狀態，趨於一種新的秩序，那我們是不可以躁急從事的，我們必須先使人民逐漸熟習了獨立的行動，然後才可以把他們召集起來，開大議會，而把國計民生的大事付給他們討論。

* * *

人們如果確信，在禁止人民參與治理公務之後，就會把公共的精神窒息了，而且我們藉一種有薪給的官吏之治理，也並不能代替了公共精神，那麼憲法是必須有一番變化的。國家官廳，在私事和公務方面，必須停止其妄事干涉，而許公民的活動取而代之。公民並不在形式和在空文中生活，他乃是活潑有力的從事行動的，

kräftig handelt, weil ihn seine Verhältnisse in das wirkliche Leben hinrufen und zur Teilnahme an dem Gewirre der menschlichen Angelegenheiten nötigen. Man muss bemüht sein, die ganze Masse der in der Nation vorhandenen Kräfte auf die Besorgung ihrer Angelegenheiten zu lenken, denn sie ist mit ihrer Lage und ihren Bedürfnissen am besten bekannt, und auf diese Art nimmt die Verwaltung eine dieser Lage gemässe Richtung und kömmt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m Zustand der Kultur der Nation. Es wird die Gesetzgebung einer Nation mangelhaft bleiben, wenn sie sich allein aus den Ansichten der Geschäftsleute oder der Gelehrten bildet. Die ersteren sind mit Besorgung des Einzelnen so sehr überladen, dass sie die Übersicht des Ganzen verlieren, und so sehr an das Erlernte, Positive gewöhnt, dass sie allem Fortschreiten abgeneigt sind; die letzteren sind vom wirklichen Geschäftsleben zu sehr entfernt, um etwas Nützlich-leisten zu können. Hat eine Nation sich über den Zustand der Sinnlichkeit erhoben, hat sie sich eine bedeutende Masse von Kenntnissen erworben, geniesst sie einen mässigen Grad von Denkfreiheit, so

因爲他的處境就把他招喚在現實生活之中，而強使他參與人事之紛紜擾攘。人們必須努力把民族的全副力量，應用於民族事務的照顧上，因爲一個民族是最熟習自己的處境和需要的；在這種途徑下，民族的行政才可以採取了一種與自己處境相稱的方向，而與民族文化的狀態，處於和諧之中。一個國家的立法如果只是由職業家或學者的主張，製定的，那它一定是有缺點的。前一種人太於顧及零碎事件，因而不能窺見全局，而且他們因爲久慣於所學習的實際事物，所以他們就厭惡一切進步；後一種人是與實際的職業生活離得太遠的，因而並不能成就任何有用的事業。一個民族如果超出了感性的狀態，如果已經獲得了大量的知識，並且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思想，那麼它自然注意於它自己國家的和公共的事務。人們只要稍一允許他們參與公務，那麼他們的愛國心理和公共精神立刻就會有了最有利的表示。人們如果拒絕他們合作，那麼他們就生起怨望嫉憤來，這種公憤如不經由種種

richtet sie ihre Aufmerksamkeit auf ihre eigene National- und Kommunalangelegenheiten. Räumt man ihr nur eine Teilnahme daran ein, so zeigen sich die wohlthätigsten Äusserungen der Vaterlandsliebe und des Gemeingeistes; verweigert man ihr alles Mitwirken, so entsteht Missmut und Unwille, der entweder auf manigfaltige schädliche Art ausbricht oder durch gewaltsame, den Geist lähmende Massregeln unterdrückt werden muss. Die arbeitenden und die mittleren Ständ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werden alsdann verunedelt, indem ihre Tätigkeit ausschliessend auf Erwerb und Genuss geleitet wird, die oberen Stände sinken in der öffentlichen Achtung durch Genussliebe und Müsiggang, oder wirken nachteilig durch wilden unverständigen Tadel der Regierung. Die spekulativen Wissenschaften erhalten einen usurpierten Wert, das Gemeinnütziges wird vernachlässigt, und das Sonderbare, Unverständliche zieht die Aufmerksamkeit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 an sich, der sich einem müssigen Hinbrüten überlässt, statt zu einem kräftigen Handeln zu schreiten.

* * *

有害的方式爆發出來，那它就必須藉一種摧殘民衆精神的強制訓練才能抑制住。公民社會中的勞力階級和中等階級由此就墮落下來，因為他們的活動從此就完全趨向於獲得和享受了；至於上等階級，則因為貪歡懶散，降低了羣衆的敬重之心，或者因為對於政府，信口雌黃，漫加指摘，而給社會施展了一種有害的影響。因而思辯的科學就得到一種僭妄的價值，公益的事情卻被忽略了，而且奇特難解的事情反而吸引了人類精神的注意，因為人的精神已經委身於一種懶散的幽思，而不從事果敢的行爲了。

* * *

Der Zustand der Ruhe ist der Entwicklung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nachteilig, nie war ein solcher Mangel an ausgezeichneten Männern in Griechenland als nach seiner Unterjochung durch die Römer und in Europa als in den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n nach dem Fall des römischen Freistaats. Die Kräfte der Menschen werden nicht mehr gereizt durch das Streben nach Nationallehre, nach Selbständigkeit, durch ihren Kampf im Krieg, in Unterhandlungen, durch das Reiben der Meinungen, so aus der Vielseitigkeit der Ansichten und der Mannigfaltigkeit der Richtung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 entstehen. Das freie Spiel der Kräfte wird gelähmt, dem Willen eines Einzelnen und seiner nächsten Umgebungen untergeordnet, er erschläft oder verwildert, weil nichts ihm widersteht, oder er wird einseitig oder absichtlich und verderblich. Und dennoch war der Despotismus im Römischen Staat nicht so fest gegründet, er verbreitete sich nicht so sehr in das Einzelne.

* * *

Auf den Deutschen wirkt Schriftstellerei mehr als auf andere Nationen wegen ihrer Leselust und

太平無事，是於人類的發展有害的。在希臘，以在被羅馬征服以後，在歐洲，以在羅馬共和國崩潰後的初三百年，為最缺乏特出的人材。那時人們已經不追求民族的尊榮和獨立，已經不在戰爭和談判中互相爭執，已經不再因為見解不同，活動殊途，而意見對立，所以他們的力量也就不能再被刺激起來。各種力量的自由活動已經駭鈍起來，只受支配於一個人和其周圍之人的意志，那種意志已經弛緩了或不馴了（因為沒有事情阻攔他），或者成了片面的，執意的，腐化的。可是專制主義如果不會在羅馬帝國那樣根深蒂固，那它也不會再在個人方面那樣蔓延廣佈起來。

* * *

德國人比別的民族更為受著作家的影響，因為德國人愛好讀書，而

der grossen Menge von Menschen, auf die die öffentlichen Lehranstalten einen Einfluss irgend einer Art haben. Die Leselust der Nationen ist eine Folge ihrer Gemütsruhe, ihrer Neigung zu einem innern, besonnenen Leben und ihrer Staatsverfassung, die die Verwaltung der Nationalangelegenheiten wenigen öffentlichen Beamten und nicht der Nation anvertraut. Sollte daher auch das Schlechte durch die Gewalt der Waffen einen momentanen Sieg davontragen, so kann es doch durch die Idee und die Meinung wieder gestürzt werden.

* * *

Die Erziehung muss dahin wirken, dass der Mensch nicht allein mechanische Fertigkeiten und einen Umfang von Wissen erlange sondern dass der staatsbürgerliche und kriegerische Geist in der Nation erweckt, und die Kenntnis kriegerischer Fertigkeiten durch Unterricht in gymnastischen Übungen allgemein verbreitet werden. Trifft ferner der Staat solche Einrichtungen, wodurch eine allgemeine Miliz errichtet und diese in zweckmässige Verbindung mit der Armee gebracht wird, so wird durch eine solche Anstalt und durch den Einfluss der Erziehung

且公共的教育機關所培養的人為數也衆。德國民族所以愛好讀書，乃是由於他們心理恬靜，愛好內心審思的生活，而且他們的憲法只把國事的處理交給少數的官吏而不把它交給整個民族。因此，惡棍流氓縱然藉着武器的威力暫時得了勝利，而他們仍然可以被觀念和意見所推翻了。

* * *

教育的活動必須使人們不祇達到機械的技巧和某種範圍的知識，而且還要喚醒一國之中公民的和戰鬥的精神，並且要藉體育的練習，把戰爭技術的知識普遍傳佈出去。此外，國家如果設立一些建置，藉以把民兵建立起來，使他們與軍隊，互相呼應，通力合作，那麼藉這樣一種機關，和教育的影響，就可以防止住勞力階級和學者階級那種主張非戰，不

der Neigung der Gewerbetreibenden und gelehrten Stände zu unkriegerischen Gesinnungen, zum Losreißen vom Staat entgegengewirkt und in allen das Pflichtgefühl, für den Staat sein Leben hinzugeben, belebt.

* * *

Die Grundursachen unseres Unglücks sind die Weichlichkeit und die Selbstsucht des Jahrhunderts, welche uns stets abgezogen haben von der durch die Pflicht vorgeschriebenen Linie, um die Opfer zu vermeiden, welche unsere Lage forderte; und diese Nichtigkeit des Willens, dieses Verlangen nach dem Genuss des Augenblicks sind es, die uns der Ehre, der Unabhängigkeit und selbst der Güter beraubt haben, welche allein unserer dummen Selbstsucht wünschenswert schienen. Das Übermass der Übel wird das kommende Geschlecht wieder stählen, vielleicht aber auch es vollends erdrücken und ganz vertieren, wenn wir uns nicht damit beschäftigen, unsere Kinder zu den Grundsätzen zurückzuführen, deren Verlassen an dem allgemeinen Untergange schuld ist.

* * *

Unser ökonomisch-technologisch populierendes System, durch eine

理國事的傾向，並可以在一切人心中都鼓蕩起一種責任感覺來，使他們肯為國家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 * *

我們所以不幸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本世紀中，人們都柔弱萎靡，私心太重，因而使我們離開了義務給我們所規定的方向，以求避免我們的處境所要求於我們的犧牲。正是這種意志的虛妄作用，這種對於眼前快樂的願望，才剝奪了我們的尊榮和獨立，以及我們那愚昧的私心所認為唯一可羨的財貨。這種過度的罪惡也許會把下一代人重行鍛鍊一下，但是也許會把他們完全窒息了，澈底獸化了，倘使我們不積極從事，把我們的子孫領回那些在一離棄之後就會使全體沒落的基本原則之上。

* * *

我們的經濟和技術的普遍化的制

zentralisierende regierungsdurstige
Bureaucratie angewandt, frisst sich
selber auf wie Saturn seine Kinder;
wir sind übervölkert, haben überfa-
briziert, überproduziert, sind über-
füttert und haben mit Buchstaben
und Tinte die Beamten entmenschet,
die Verwaltung entgeistet und alles
in toten Mechanism aufgelöst.

* * *

Verfassungen bilden, heisst bei
einem alten Volk wie das deutsche,
das seit zweitausend Jahr eine ehren-
volle Stelle in der Geschichte ein-
nimmt, nicht sie aus nichts erschaf-
fen, sondern den vorhandenen Zu-
stand der Dinge untersuchen, um
eine Regel aufzufinden, die ihn
ordnet; und allein dadurch, dass
man das Gegenwärtige aus dem
Vergangenen entwickelt, kann man
ihm eine Dauer für die Zukunft ver-
sichern und vermeiden, dass die zu
bildende Institution nicht eine a-
benteuerliche Erscheinung werde, ohne
eine Bürgschaft ihrer Dauer zu
haben, weder in der Vergangenheit

度，在被集權而愛干涉的官僚政治所
運用時，就把自己吞食了，正如撒騰
Saturn 把他的兒子吞食了似的(二)。
我們已經人口過剩，製造過剩，生產
過剩，食用過剩，並且用字母和墨水
使官吏失掉人性，使政治失掉精神，
並使一切都消解為死寂的機械。

* * *

在一個二千年來曾在歷史上佔光
榮地位的古老民族方面，如德意志
者，要來構成一套憲法，那並不是於
無中創造有的，乃是要研究事物的現
狀，以便找尋出支配那種狀況的一種
規則來。只有在人們把現在的情況
從過去的情況發展出來以後，他們
才可以確保現在能以存續到將來，並
且免得使那行將造成的憲法成了一種
浪漫的現象，在過去在將來都無存續

(二) 撒騰神即希臘克羅諾斯 Kronos 的別名。他曾因為他父親虐殺其兄弟，所以他就弑了他的父親。他因為聽預言說，自己將被他的一個兒子所推翻，所以他一生了兒子，就把他吞食了。

noch in der Zukunft. Diejenigen, die nur eine Kammer vorschlagen, wollen alles nivellieren, den Nachkommen der Zähringer, den Fürst-Fürstenberg, gleichsetzen dem Emporkömmling von gestern; sie wollen alles verwirren, alles demokratisieren, sie vergessen, dass das Land, dem sie eine Verfassung geben wollen, die Geschlechter, die sie zu unterdrücken, die Stände, die sie durcheinander zu mischen die Absicht haben, eine Geschichte besitzen, die tief in ihrem Gedächtnis eingepägt ist.

* * *

Eine Nation wie die deutsche, die durch ihre ganze Geschichte den Charakter der Besonnenheit und der Treue behauptet, die ihn in den letzten Jahren auf eine so glänzende Art bewiesen und ungeheuere Opfer gebracht, um das Joch zu zerbrechen, das der Unverstand seiner Regenten ihnen zugezogen, diese verdient nicht den Verdacht, dass sie das ihr bewiesene Vertrauen mit Undank, Untreue und Aufruhr erwidern werde. Soll eine Verfassung gebildet werden, so muss sie geschichtlich sein, wir müssen sie nicht erfinden, wir müssen sie erneuern, ihre Elemente in den ersten Zeiten

的保證。

凡建議一個議會的人們，都想泯滅分別，等齊高下，而把蔡林根公爵的後人，和富斯騰伯侯爵與昨天的暴發戶一齊看待；他們想把一切都混淆了，把一切都平民化了，可是他們忘了，他們想爲之製定憲法的那個國家，他們所想壓制的那些門閥，和他們所想混亂了的那些階級，都有一種深印在他們記憶中的歷史。

* * *

像德國這樣一個民族，在其全部歷史中既然宣示其審慮忠貞的品格，既然在近年來在那樣燦爛的方式下證明其品格，並且帶來重大的犧牲，以便打破他們的國王的昏庸無知給他們所加的那種羈絆，所以這個民族就不常被人猜疑說，他們要以負義，不忠，和騷動，來答報向他們所表示的那種信託。

我們如果想製定一種憲法，那麼它必須合乎歷史才行，我們不能憑空造作它，我們必須把它加以更新，必須在我們民族的發生時期中來尋求它

der Entstehung unseres Volks aufsuchen - und aus diesen sie entwickeln. Wie dieses vorzunehmen, was dieses für Resultate gibt, ist hier nicht der Ort aufzuführen. Es ist ein sonderbarer Widerspruch, in den die verfallen, welche der Meinung sind, der Deutsche sei noch nicht reif zu einer Verfassung, da sie doch nicht verlegen sind, die Behörden zu bilden, denen die Gesetzgebung und Staatsverwaltung anzuvertrauen: finden sich Menschen zu Staatsbeamten in hinlänglicher Menge, warum sollen sich dann nicht Menschen zu Abgeordneten in eine Ständeversammlung finden: Mir scheint ferner, dass die Deutschen da, wo sie in Ständeversammlungen bisher vereinigt waren, im Württembergischen, Weimarschen, Hessischen, in den freien Städten, dass sie dort verständig gründlich, gesetzlich, folgerecht gesprochen und gehandelt haben. Hat Frankreich und Polen eine Verfassung, und Deutschland soll keine haben?

* * *

Durch Bildung einer gut eingerichteten repräsentativen Verfassung gewinnt der Regent eines treuen und gescheuten Volks an Macht- denn er eignet sich alle geistigen und phy-

的元素，並從這些元素中把這種憲法發展出來。要問這種工作將如何進行，並問它將來有什麼效果，那是不能在這裏詳細闡發的。有的人以為，德國人現在還不曾成熟得可以實行一種憲法，這實在是一種奇特的矛盾，因為他們並非不知如何構造一些官衙，而把立法和行政交給他們。國家既然有如許多的人可以做官吏，那麼為什麼沒有人可以當議員，出席於議院中呢？在我覺得，凡一向已經把德國人聯合在議會內的各邦，例如魏登倍，威瑪，黑森，以及各自由城邦，在那裏，德國人的說話和行事都是有理致，有根據，有法則，有聯貫的。但是法國和波蘭有一種憲法，而德國反而該沒有一個麼？

* * *

在製定一個組織良好的代議制度以後，一個忠實而聰明的民族之君主是可以增加其權力的。因為他可以

sischen Kräfte desselben an, wird durch diese erleuchtet und gestärkt, statt dass er gegenwärtig, wo er nur durch Beamte herrscht, überall bei den Regierten auf Launigkeit, oft auf Abneigung, selbst auf Antagonismus stösst und bei seinen Beamten nur wenig Unterstützung gegen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findet, die gar zu geneigt sind, mit dieser auf seine Unkosten sich zu vertragen. Selbstregieren ist nur das Los sehr seltener Regenten; diese finden aber auch bei einer repräsentativen Verfassung in sich und in der Güte ihrer Absichten Mittel, wie die Geschichte lehrt, ihre Entschlüsse in das Leben zu bringen. Aber auch kräftige selbstständige Autokraten regierten nur in wenigen einzelnen Fällen nach selbst-eigenen Ansichten, gewöhnlich nach denen ihrer Staatsbehörden, die sie sich zu leiten begnügten, und nach Formen und Maximen, die sie vorfanden.....

Einer Versammlung, die auf das Ratgeben beschränkt ist, fehlt es an Selbständigkeit und an Würde - in ihrem Ansehen wird daher die Regierung, wenn auch der gegebene Rat der genommenen Massregel beifällig ist, in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利用這個民族的一切精神的和形體的力量，可以被這些力量所啓發，所加強——而不像現在只藉官吏來統治似的，在被治者方面只遇到冷淡，憎惡，甚或反對，而在官吏方面，也很少能够使他們反着輿論，支持自己，因為官吏常是與輿論妥協，而使君主蒙其弊的。自治只是極少數的君主之命運：不過這些君主就在代議制下也照樣可以給其目的，找到正常的手段，把他們的決意實現出來，——如歷史所昭示我們的。不過就是發憤有爲，獨立不倚的獨裁者，也只是在極少數的情形下，才依照自己的見解來統治的，他們往往也是樂意讓官吏的見解，和他們所遇到的慣例和格言等，來領導自己的。

一個議會如果只限於供籌獻策，那它是缺乏獨立與尊嚴的。因而在這一類議會方面，縱然它所給的勸告正贊同所取的方策，而政府也不能在

nicht die kräftige Stütze finden, die sie in der freiwilligen Zustimmung eines selbständigen repräsentativen Körpers findet. So waren die Notablen in Frankreich und die sogenannten Repräsentanten, die bei verschiedenen Veranlassungen der Staatskanzler berief, totgeborene Surrogate vom Tüchtigen und Wahren, ein Spott des Volks. - Die ratgebende Versammlung wird ferner geneigt sein, nach Massgabe der von aussen einwirkenden Umstände entweder mit Lauigkeit zu handeln oder sich allen Verirrungen im Tadeln und Vorschlägen zu überlassen, welchen sie sich ohne allen Nachteil für das Ganze mutwillig überlassen darf, da sie für die auf ihre Beratung genommenen Beschlüsse nicht verantwortlich ist. Handelt sie in einem Geist wilder mutwilliger Opposition, so geschieht es, wenn kräftige und kühne Männer sie beherrschen, und dann steht ein missleiteter, in keinen Schranken sich haltender Körper dem Ministerio gegenüber, drängt ihm entweder andere, dem Verlangen der Nation gemässere Attributionen ab oder verbreitet in ihr allgemeinen Unwillen, der, wenn er auch nicht zur Anarchie führt, immer höchst verderblich ist.

輿論方面找到有力的支援，一如它在一個獨立的代議機關的自願的贊同方面所找到的。因而法國的名士，和法國的首相在各種時機下所招集的掛名代表，就只成了「德性」和「真實」的死的代用品，只是拿人民開玩笑的。——此外，供籌獻策的議會，還易於依照外面的環境影響，而冷淡行事，或者在責難和獻議方面陷於種種錯誤之中；他們是可以大胆陷於這些錯誤之中，而不至貽全體以任何不利的。因為他們對於那因他們的建議而採取的決議，並不負任何責任。他們如果暴戾恣睢的來反對政府，那麼那一定是因為有大膽有力的人支配着他們，因而一個被誤領的，毫不受約束的團體就與一個內閣對立起來，而剝奪了他們那合乎民族要求的別的權限，或者在國內廣佈了一種憤懣，——這種憤懣縱然不至領到無政府狀態，也總是極度有害的。

* * *

Ich halte bei dem gegenwärtigen Zustand des öffentlichen Geistes und der allgemeinen Sittlichkeit die Pressfreiheit der Journale und Zeitungen für etwas Verderbliches, es gibt der Gewinnsucht der Verfasser und allen ihren nichtswürdigen Leidenschaften und ihrer Seichtigkeit freies Spiel, um die wichtigste Angelegenheit des Staates und der Kirche zu entstellen und entstellt vor den Richterstuhl des grossen eitlen, seichten Haufens "swinish multitude" zu bringen; Gegenstände, die nur zur Kompetenz ernsthafter, tüchtiger Männer gehören, müssen nicht an Teetischen, in Weinstuben, auf Bierbänken abgehandelt werden. Die Freiheit der Diskussion finde statt in denen Verhandlungen der Volksrepräsentanten, in ernsthaften, gründlichen Druckschriften, aber das lose Gesindel der Pamphletisten und Zeitungsschreiber bleibe gezügelt, wenigstens bis die gegenwärtige verwilderte Generation verschwunden und die neuen Institutionen tiefe Wurzel geschlagen haben. Auf einer weis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Volks sich entwickelt habenden Staats- und Kirchenverfassung muss die bürgerliche Freiheit beruhen, nicht auf dem

* * *

我認爲：就現在的「公共精神」和「一般道德」的狀態而論，刊物和報章的出版自由乃是一種有害的事情，因爲這就可以使著作家的貪得之心和其卑劣的情感與惡癖，自由活動，而把國家和教會的最重要的事務扭曲了，並且把那種事務扭曲的呈現在那虛榮而愚癡的大衆——「豬似的羣衆」——的法庭面前。凡需要誠懇有德之士才可以勝任的對象，是不能在茶棹上，酒館中，酒店橙上來討論的。討論的自由只應當限於人民代表的互相研討，和誠懇而貫徹的出版品，但是那一羣撰著小冊和寫作報章的毫無紀律的橫徒，是應該加以約束的，至少等現在這個野蠻化了的世代消滅了，而且新憲法也植下深根以後，才可加以放縱。公民的自由必須建立在一種由人民歷史中發展出的聰明的國憲和教憲上，而不能建立在報章和散頁中那種易趨腐化的紙面基礎上。

papiernen, zur Fäulnis geneigten Fundament der Zeitungs- und Flugblätter.

* * *

Religiöse Sittlichkeit und Vaterlandsliebe sind die einzigen nicht zu erschütternden Träger des Charakters; ihrer Entwicklung und Befestigung bedarf der Mann, der sich zu höheren Stellen bestimmt und sie erreicht, noch mehr als der, so sich in den einförmigen Verhältnissen des Privatlebens bewegt, und er ist daher durch seine Bestimmung gebieterisch aufgefordert, auf jene Zwecke seine ganze Aufmerksamkeit zu richten. In grossen Situationen entscheidet Charakter mehr als Geist und Wissen: man kann anderer Geist und Wissen benutzen und muss ihn wegen der menschlichen Beschränktheit benutzen, aber den Charakter eines anderen kann man sich nicht aneignen, wohl sich ihm mit Aufhebung aller Selbständigkeit unterwerfen.

* * *

Die vollkommene geistige und sittliche Bildung eines Volkes besteht in der Bildung des einzelnen Menschen, in der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s ganzen Staats zur politischen gesetzlichen Freiheit.

* * *

宗教的道德和祖國的愛護，乃是支持品格的惟一不可搖撼的支柱。一個注定要居高位並達到高位的人，要比那在自己私人生活的單調關係中活動的人，更需要發展並加強這種道德和愛護，因而他是受他的使命的嚴厲命令，來刻刻注意於那種目的的。在重大的情節之下，品格比才思和知識還更可以有所決定。一個人可以利用別人的才思和知識，而且由於人類的限制（即不能遍知一切），還是必須要利用它們的，但是他並不能利用他人的品格，縱然他會拋棄了一切獨立性，而對別人五體投地。

* * *

一個民族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要想達到圓滿的程度，必須把每個人的教育完成了，並必須使全部國家在政治方面逐漸發展，達到政治上合法的自由地步。

Diese ist in Deutschland noch höchst unvollkommen, und daher entsteht in dem deutschen Charakter und Geist eine Lücke und Lähmung, die nur freie Institutionen und das öffentliche Leben, nicht die Schule allein zu beseitigen vermögen.

* * *

Volksvertretung halte ich wichtig zur Entwicklung der moralischen und intellektuellen Kräfte der Nation; eine Konstitution ist wünschenswert, aber nur keine importierte, doktrinäre oder nachgeahmte, sondern eine aus dem Geschichtlichen, Eigentümlichen des Volks genommene, die Zeit und Erfahrung zur Vollkommenheit bringt.

在德國，這種教育還是極其不圓滿的，因而在德國人的品格和精神中，就發生了一種罅漏和麻痺——要想消除這種弊病，必須有賴於自由的憲法和公共的生活，單單的學校是無能為力的。

* * *

我認為代議政治對於一個民族的道德的和睿智的力量之發展，是很重要的，一種憲法誠然是值得希求的，但是我們所期望的不是一種輸入的，空論的，或模倣的憲法；乃是由民族的歷史和特性中所取來，而為時間和經驗所完成的“憲法”。

處世箴言(續一)

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著

關琪桐 譯

第三章 論一個人的所有

偉大的幸福學說家，伊壁鳩魯，曾經正確而精到的把人類的需要分爲三類。第一就是那自然而必需的需要，這些需要就是在得不到滿足時便生起痛苦來的那些需要。因此這裏所需要的只是食與衣 *Victus et amictus* 兩者，這都是容易滿足的。第二就是那自然而不必需的需要，就如性慾滿足的需要：在戴珍尼的記載中，伊壁鳩魯并不曾將這一層表示出來；不過我在這裏已經把他的學說一般的加以整理，加以潤色了。這些需要的滿足是比較困難的。第三就是那既不自然而又不必需的需要。這就是奢華，侈靡，炫飾，燦爛的需要：這些需要是沒有窮盡的，因而是難以滿足的。（參閱戴珍尼哲人傳記第十卷，二十七章，一四七節。和一二七節；用參閱西塞鹿鵠的論一，一三）

在財產一方面，要確定我們的合理的願望之界限，是很困難的，雖然并非不可能的。因爲每一個人在這一方面所有的滿足并不依靠於一種絕對的財產數量上，乃依靠於一種相對的財產數量上，即依靠於他的「要求」和他的「所有」之關係上。因此，財產就其本身而論，乃是無意義的，正如一個分數只有分子而無分母似的。一個人如果從來不曾想到要求某些財物，那他就并感不到自己缺乏它們，因而他就是沒有它們，也可以滿足自己。同時 一個人雖然比他富裕百倍，可是他所要求的如果有一件未曾成功，那他也就感覺自己是不幸的。在這一方面，各人都看到他所能以達到的事物，而且他的要求正是與這種視線攜手

并進的。當一個在他的視線中立着的對象，使他看來好像可以得到時，那他就感覺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如果有意外的困難取消了他的希望，那他就覺得自己是不幸的。凡在這個視線以外立着的東西都不能夠影響了他。因此，富人的大量財產并不能使貧人心思煩亂，而在另一方面則富人的許多所有，也不能安慰他，使他不感到希望的失敗。財富就如海水似的，人愈飲它，就愈乾涸；名譽也是一樣。在損失了財富和繁榮以後，人們一起初自然是痛苦的，但是隨後他的心境就與先前的心情無大懸殊，這是因為在命運把我們財產的成分減少以後，我們同時也就把自己的要求減低了。在遇有不幸事件時，這樣減低自己的要求，乃是極其痛苦的；但是這種過程只要一完成了，痛苦就愈來愈減少了，最終還會毫不爲人所感到：那個創傷已經平復了。反面說來，在遇到幸運之時，我們的要求原來所受的壓縮也就減除了，因而就都擴張開：這種拓張正是我們的喜悅所在。但是這種喜悅也并不能長久，等這種拓張過程一完成了，那種喜悅也就停止了：我們已經習慣了那推廣開的要求，因而對於那可以滿足此種需要的財產就毫不在意。荷馬在奧德塞的一段中已經描寫過這一層，（十八卷，一三〇——一三七），現在我們可以引一節如下：

舍生之偷，無殊萬千。
虛榮無恆，惟人爲冠。
吉神降福，鼓舞騰歡，
不虞來日，將有大難。
悲神忽至，福神以躡，
沮喪任命，中心悲酸。——
塵世之人，心易變翻，
如彼天父，使日夜流遷。

我們所以不滿，其根源就在於自己不斷的努力把我們的要求的成分提高，同時另一個成分因爲不可搖動，却把我們的要求阻礙了。

人類既然那樣需要繁多，而且他的生涯整個就成立於種種需要，所以我們就不必驚異，爲什麼人們重視財富，尊榮財富，比他對於別的，都更爲加甚，更爲誠懇了，而且我們也不必驚異，他甚至把權力也認爲是獲得財富的手段了。我們也不必驚異，爲貪圖的目的起見，他把其餘一切都放在一邊，或棄在外邊，就如以哲學自命的人把哲學拋棄了那樣。人們常被人責罰說，他們的願望主要的在於金錢，而且愛財甚於愛其他一切。但是因爲財富正如不疲倦的百祿圖 Proteus 似的(一)，時時刻刻準備把自己轉化爲漫遊的願望和繁多的需要之對象，所以人之愛財乃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其他一切的東西都只可以滿足一種願望，一種需要，類如食品只對於飢者是合適的，醇酒只對於康健者是良好的，藥品只對於病者是有益的，皮物只對於冬天是相宜的，女人只對於青年是可貴的。因此他們都只是相對的善。只有財物是絕對的善。因爲它不祇在具體方面滿足了一種需要，而乃在抽象方面滿足了一般需要。

人們在享有現成的財產時只可以把它視爲防止可能遇到的許多災患不幸的一個堡壘，而不當以爲自己從此就可以縱情任意求得世間的快樂，或者甚至非如此享用不可。有的人原來家中毫無資產，但是最後却經由他的才能（不論是什麼樣的），而獲得了許多財富，因而他們往往謬想，他們的才能乃是恆常的資本，至於他們所賺的錢則是利息。因而他們就隨手化用，而不把所得的錢財一部分貯蓄爲恆常的資本，並且來多少錢，就用去多少錢。因此，他們就多半陷於窮困之中。他們的財源會阻息了或停止了，因爲他們的才能會枯竭了，而成爲不合時的，如一切美術那樣，或者因爲他們的才能只在特殊的情形下和場合下才可以有效，而這些場合現在已經過去了。共同從事於手工業者或者可以照上述的樣子來處分其所得；因爲他們的工作能力是不容易失掉的，而且縱然失掉也可以

(一) 譯者註：百祿圖係一海神，曾從海王得到了預知術。他常常出現在海岸上，求教他的人那到裏問他去。他是不容易接近的，當人求教於他時他往往不願回答而立刻變爲種種形相。他可以變爲虎或獅子或者變爲一道旋風，一縷輕烟，一股流水。

藉其夥伴的力量所補充了，而且因為他們的製作品恆常是人類需要的對象，所以它們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到銷路。由此看來，諺語所謂「一個有用的行業是一道金礦」那話就很對了。但是說到任何藝術家和專家，情形便不一樣，而他們所以得到豐富的報酬，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應當把它們的所得作為本錢，可是他們却驕暴用事，只把它看做利息，因而就陷於沈淪之中了。在另一方面，則那承受遺產的人至少完全正確的知道，什麼是資本，什麼是利息。大多數人都想確保其資本，而不把它侵蝕了，而且在可能時還要至少把利息的八分之一貯蓄起來，以防將來的來源不濟。所以他們大多數都可以保持其豐富之境。關於商人，這裏所說的話是全不適用的。因為他們看資金就是進一步收穫的手段，正如工人之視其工具似的：因而他們縱然是憑自己勞力才得到了資金，而他們也會藉利用資金，以求保持資金，增多資金。因此，財富在任何階級都不如在商業階級那樣慰貼自如。

因此，一般說來，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親身與困難窮乏搏戰的人，對這些簡直不怕，因而他們比那只憑道聽塗說才知道「窮困」為何物的人們，要愛浪用錢財。凡憑某種幸運和某種才能，驟然由窮困進於富裕的人，乃屬於第一種人，至於那生於富裕環境并長於富裕環境中的人則屬於第二類人。第二種人比前一種人是多為顧慮將來，而愛經濟節用的。由此人們就可以推斷說，窮乏并不是十分壞的，如它在遠觀之下所貌現的樣子。可是這種情形的真正原因却在於：那生於富裕環境中的人，看財富是不可缺的條件，是使生命惟一可能的成分，正如空氣似的。因此，他就保衛他的財產，一如他的生命似的，因而他多半是愛整潔，有遠見，而好節儉的。至於生在貧窮環境中的人，則看窮乏乃是一種自然的狀況：因而儻來的財物對他只是一種多餘之物，只是供享受和浪費之用的：因為當財費用淨之後，他們仍可以如先前似的往下過活，而且還少了一層顧慮。這正如莎士比亞所說：

那句古話是應當加以證實的：

就是說，乞丐騎在馬上是會使他們的馬奔馳而死的。（亨利第六，三，四景）。

但是我們可以說，這一類人對於命運，對於那曾經把他們由窮乏中拔脫出的手段，却有一種堅定而過度的信託：這種信託與其說是在於他的腦中，不如說是在於他的心中；因而他就不如天生富裕的人似的，認窮乏的深淵是無底的，他想，人一撞在底上以後，還可以再度高升起來。由這種人類的特徵，我們還可以解釋了，那原係貧乏窮小姐的婦女，在做了夫人之後，何以比那帶來豐富妝奩的女子，往往還愛誇張，還愛浪費；因為大部分說來，富裕的女孩不祇帶來財產，牠們比貧家的女子還帶來較大的熱忱，還帶來較多的保持財富的遺傳衝動。誰要有相反的主張，那他就可以在亞理士陶的第一篇譏諷中找到支持他的權威：不過約翰生 Dr. Johnson 却是同意我的意見的。他說：「一個富家女因為慣於支配錢財，所以她能以謹慎用錢；但是一個婦女如果在結婚後，才初次運用錢財，那她就極其喜歡浪費，因而她就把錢財糜費虛擲了」（見包斯維爾約翰生傳一七七六年，六十七歲記載）。無論如何，我可以勸告凡娶貧女的人，都不要把資金留給她，而只把利息留給她，尤其要特別留心，不要讓兒女的財產落在她們手中。

在我這樣勸告人們小心保持他們所獲得的或承繼的財產時，我絲毫不相信，我已用鄙賤之事污了我的筆鋒。因為當人一涉世時，如果就有大批資金，足以使自己真正獨立，不用工作，舒適度日，那確乎是一種無價的優勢，縱然他的資金只够他一人過，而不能供他贍養身家之用。因為這樣就可以使人避免了并脫離了那種繫屬在人生上的需要和災疫，因而可以使人擺脫了一般的強迫服役，即擺脫了塵世上人的自然命運。只有在命運的這種寵惠之下，人們才真是生而自由的人：因為只有這樣，人才可以自主 *sui juris*，才可以成為他自己的時間和力量的主人翁，才可以在每一個清晨說，「今天是我的」。因為同樣理由，那年入一千的人與年入十萬的人之間的差異，比起他同那毫無所有的人之間的差

異來，也是小的無限的。但是承繼的財產，如果落在天賦卓絕的人手裏，那它就達到它的最高的價值，（如果他所努力經營的事業是與財富的獲得不相融洽的）。因為這樣他就受了命運的雙倍的賦與，而可以依其天才來從事活動。他由此可以百倍償還了他對於人類的債務，因為他可以完成了他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業，並可以成就了致福人羣，尊榮人羣的造詣。另一個人在這種優越的境況下，又可以藉慈善的活動，使自己配得人類的愛戴。但是一個人如果在這些事情方面絲毫無所成就，而且也不努力爲之，也從不藉精研一種科學，而使自己至少可以促進這種科學——那麼這樣一個人在承繼了財產之後，就只是一個虛度歲月而可鄙棄的人了。這樣一個人也不能是幸福的：因為他既然避免了窮乏，所以他就陷於人類苦楚的另一個極端，即陷於煩膩之中，這種煩膩使他痛受了折磨，因而「窮乏」如果原來給與他以一些事情來做的話，那他反而該幸福多了。這種煩膩容易誤領他達到奢侈的地步，因而使他失掉了他所不配享有的那種優勢。無數的人所以陷於窮乏之境，只是因為當他們有錢的時候，都把它們消耗盡淨，以便暫時緩和了壓迫他們的那種煩膩。

但是一個人的目的如果是想在政治方面，登峯造極，那麼情形就大爲兩樣了。在這裏必得需要恩寵，朋友，和聯繫，以便一步一步求得所欲，甚或求得最高的位置。在這種生活中，一個人如果一文不名的撞在世上，那是更爲光榮的，尤其一個人如果不是貴族，而却富有天才，那麼他如果是貧無立錐之地，那就更是他的真實的優勢，而可以增加其聲價了。因為人們在日常交遊中所企圖的乃是抑人揚己，至於在政治中當然更是如此了。因而一個窮鬼在這裏正可以見風使舵確信他自己是完全無疑而澈頭澈尾的鄙卑下賤，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只有他可以繼續不繼的向人鞠躬，只有他的鞠躬可以達到完全的九十度，只有他可以忍受一切，而對之大笑：只有他知道功勞德性全無價值：只有他可以用嘹亮之聲，特大之筆，把他的上司或有權勢者的拙劣文章，諛爲傳世傑作：只有他懂得如何祈求：因而只有他可以及時深曉（並且甚至在青年時代）歌德向

我們所揭露出的那種隱秘的「真理」：

「鄙卑黑暗，

不必心煩，

權勢在茲，

何恤人言。」——西東詩集

在另一方面，那些境況優越的人，則大部分是不屑乞憐於人的；他是慣於仰首直行，而未曾學會阿諛之術的；他甚或還以一種才能自傲，雖然他該知道，他的才能遠不及「庸碌無似」，「搖尾乞憐」，那樣可以得意。久而久之，他就認識了那些在他以上的人的低能下賤，而且到了受到侮辱之時，他還是不遜的或颯爽的。這樣並不是進身之道：不但如此，他最後還可以同傲慢的服爾德一致的說：「我們只不過有兩天的活頭，我們很不值得搖尾乞憐在可鄙的惡棍之下過度了它們」。但是我們可以順便說一句說：可惜！「可憐的惡棍」一詞正是可以應用在多得出奇的許多世人上的。由此人們就可以看到，鳩文諾 Juvenal 所說的

家運貧窮才出奇，

欲謀高升實非易，

那話，在博學通藝之士的生活方面，比在鑽營奔競之人的生涯方面，乃是更為有效的。

我不曾把夫人和兒女歸在一個人的所有中，因為他寧是他們的所有。我本也可以把朋友歸在這一項下：但是一個有朋友的人，也同樣是被朋友所有的。

第四章 論人的地位，或別人對他的估價

第一節 論榮譽

由於人類天性中一種特殊的弱點，所以一般人都太於重視了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地位：雖然我們稍一反省就可以瞭然，別人的意見本身對我們的幸福實非必

要的。因此，我們就難以理解，當一個人看到別人對自己表示嘉惠的意見，或阿諛了自己的虛榮心時，他的內心何以那樣高興。你如果撫弄貓兒，那貓就叫起來；你如果稱讚一個人，那你就同樣必然的看到他的面容上有一種甜美的歡喜表情；縱然你的稱讚分明是一種慌言，他也歡迎，尤其如果你所稱讚的是他所自負的那一點。別人只要對一個人表示贊同，則他雖有真正的不幸，并且只從我們一向所討論的那兩個幸福之源，得到一點可憐的恩惠，而他也是很覺安慰的；在另一方面，則我們又驚異的看到，不論你在任何意義，任何程度，或任何關係中，觸犯了他的自尊心，或對他表示貶抑，輕慢，或藐視，他總不可避免的感到厭煩，時常還十分感到痛苦。

如果尊榮之感是依靠在這種特性上的，那它就可以對於許多人的幸福成爲有益的效果，因爲它是可以代替了他們的道德的；不過對於人類的幸福，尤其對於與幸福最有關的「心理平靜」和「獨立不依」，這種性情的影響乃是攪擾的，有害的，而非必需的。因此，就我們的觀點說來，應當把這個弱點加以限制，并且藉適當的來反省，并正確的來估量，各種福利的價值，而盡力緩和了對他人意見所有的那種大的感受力，不論別人的意見是諂媚它的，或觸犯它的：因爲兩者都是繫在同一條線上的。若非如此，我們就成了他人意見之奴隸了：

貪求稱讚的人，是最容易被人弄得心緒煩亂或弄得趾高氣揚的。

因此，我們如果正確的衡量了一個人在自身并爲自身所有的價值，并且把這種價值同他在別人眼中所有的地位加以比較，那是很可以助進我們的幸福的。屬於第一項的有填充我們生涯的全部東西，即它的內面的實質，因而還有我們在論人格和論財產時所已經討論過的一切優勢。所有這些事情發生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意識。至於要問我們對於他人是什麼樣子，則感覺此事的地方乃在於他人的意識：我們在他人眼中的樣子，乃是我們出現於他們意識中時的那種表像，和

他們對於這種表像所發生的思想。（一）這種情形完全不是直接對我們存在的，只是間接對我們存在的，那就是說，當他們對我們的行事被那種意見所指導時，它才對我們存在的。就是這樣，我們也只在他人的意見影響了我們，使我們改變了我們自身時，我們才可以注意到它們。除此以外，別人心中的經驗，對於我們也是無足輕重的，而且我們對它們也可以漸漸淡然視之，如果我們充分知道了人類思想的浮淺虛妄，觀念的狹窄有限，情趣的渺小卑下，意見的扭曲不正，和許多人的多數錯誤；並且如果我們憑個人的經驗知道了，一個人如何貶抑另一個人，當他不再恐懼他，或者相信，那話傳不到他耳中時，尤其如果我們有時聽到，一多半傻瓜如何鄙夷一個最大的人物。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到，誰要認他人的意見有大的價值，那他就給與他們以過大的尊榮了。

無論如何，一個人如果不在我們前已論說過的那兩類福樂中，來尋求幸福，而只在這第三類中來尋求他，那就是說，如果不在他自身的真實狀況中來尋求它，而偏在別人的思想中來尋求它，那他就只是求助於一種可憐的幸福資源了。因為一般說來，我們的本質之基礎，因而我們幸福的基礎，乃在於我們的動物的本性。因而對我們的福樂說來，康健乃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維持生活的資具，和獨立無憂的生計。尊榮，燦爛，品位，名譽，不論如何被人重視，都不能與那些基本的福樂互相頡頏，也不能代替了它們。不但如此，而且在必要的情節下，人們還可以毫無顧慮的拋棄了它們。由於這種原故，所以我們如果能够及時承認了下邊這個簡單的真理，那是很有助於我們的幸福的：那個真理就是，每一個人的主要的，真實的生活是在他自己的肉皮以內的，並不是在他人的意見之中的，因此，我們的真實的，親身的狀況，就其被康健，性情，能力，進款，妻子，兒女，朋友，和住宅所能決定的範圍而言，對我們的幸福說，是比他人對我們所愛想的意見，重要了百倍的。與此相反的謬想，則只能使我們陷於

（一）地位最高的人，雖有種種燦爛，輝煌，炫耀，宏麗，和虛飾，可是他們還可以說：我們的幸福完全在於我們以外，它只存在於他人的腦中。

不幸之中。如果人們大聲疾呼的說，「尊榮超過了生命」，那麼這話的意思就是：「生存和福利是不值什麼的，所重要的只有他人對我們的意見」。這種說法雖然是一種誇張之詞，可是它却有一種簡單的真理作它的基礎：就是，我們如果願意在人類中繼續前進，繼續存在，尊榮乃是絕對必要的，就是說，他人對我們的意見乃是絕對必要的。關於這一層我立刻就要重新提到。我們看到，人類在其一生所孜孜不休冒千幸萬苦努力以求得的一切事物，最後目的差不多都在於藉此把自己在別人眼中的位置提高，而且不祇官職，爵位，和品秩，就是財富，甚至科學（二）和藝術，所以被人研求，也是因為同樣原故，而且人類所以活動的最後目的都在於求得他人的較大的敬重之心：這一層，很可惜的只證明了人類「愚癡」的偉大可觀。過分着重他人的意見，乃是一種普遍的籠罩一切的錯誤。這種錯誤也許是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天性中的，也許是由社會和文化中生起來的，但是不論如何，它對於我們的全部作為却施展了一種過度的影響，而且對於我們的幸福也施展了一種有害的影響。這種影響我們可以在各種程度內追溯出來——它有時使我們對於他人的評論發生一種畏縮的奴隸的顧慮，有時可以使維金尼 *Virginius*（三）把利劍刺在他的女兒的內心，最後還可以誤領人們，為身後令名，犧牲了平靜，財富，康健，甚或生命。無論如何，這種謬誤給那統治人類或指導人類的人呈現出一個得用的把柄來，因此，在每一種御人術中，教人保持并加強人類尊榮感的那條訓誡，乃是佔首要地位的。但是說到人

（二）知識是沒有用的，如果別人不知道你有知識，*Scire tuum nihil est, nisi te scire hoc sciat alter*

（三）譯者註：維金尼是羅馬的一個百夫長。他有一個女兒名叫維金尼亞 *Virginia*。當時十執政官之一亞庇，克羅德 *Appis Claudius* 愛上了維金尼亞，而設法把她遷在她所住的地方以外。克羅德的一個寵倖聲稱她是一個奴隸的兒女，於是克羅德就以法官的資格下了判決，而把她交在一個朋友手裏維金尼一聽這個消息立刻從營中回來，要求見他女兒，一見之後他就拔出劍來，刺穿了他女兒的胸腹。他呼喊說：「為保存你的貞潔，不使受污於一個暴君的肉慾和濫行起見，親愛的女兒，我只有給你這個了」。 維金尼隨後就跑到營中，手持血刃，令士卒觀看。士卒皆怒克羅德暴虐，於是起而叛變，推翻了十執政官制度。

們自己的幸福，（這正是我們現在所着眼的），則情形完全兩樣。而且我們寧可以勸阻人，不要過分重視他人的意見。日常的經驗已經告知我們，許多人正是極其注意他人對自己的意見的，因而他們注意這一層，比注意自己意識中直接對他們存在的事情還加甚；他們把自然的秩序掉轉了，而認別人對自己的意見才是自己存在的實在部分，至於自己的意識反而是自己存在的虛幻部分，因而他們就把導出的，次等的，認為主要的，而且他們以為自己的本質在他人腦中的影像，比這種本質自身還更重要。這樣直接估價那完全對自己不直接存在的東西，正是一種愚癡，這種愚癡人們會稱之為虛榮，這樣正可以標記出他們所努力的事情是空虛而無內容的。我們從上邊所說的就容易看到，他們正如貪財奴似的，因為手段，而把目的忘了。

事實上，我們對別人意見所給的價值，以及我們對於這種意見的恆常顧慮，一般說來，幾乎超過了每一種合理的目的，因而這種恆常的注意可以看做是人類所遺傳的一種普遍的瘋狂。在我們的所作所為中，差不多第一要顧到的就是他人的意見，而且我們如果仔細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們所常感到的焦憂煩慮差不多有一半是由這種顧慮之心出發的。因為這種顧慮正是自尊感的基礎，而且這種自尊之心因為極其病態多感，所以是極常被人所觸犯的。就是我們的一切虛榮，一切僭妄，一切炫飾，一切誇張，也都是導源於此的。如果沒有這種顧慮貪求，則世上的奢華靡麗將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一切驕心和榮譽不論如何種類，如何範圍，都依靠在這個顧慮上——它是尋常向人要求何種犧牲的呢！這種感情在兒童時已經表現出來，在以後每一階段也都存在，但是愈到後來它是愈強的。因為當肉慾的能力枯竭以後，虛榮和驕傲就只有貪婪來分享其統治權。這種情緒最可以見於法國人方面，因為這種情緒完全成了法國人的風土病，而常出現於最荒謬的野心，最可笑的民族虛榮，和最無恥的誇張中：因而他們的努力就慘敗了，因為他們由此就成了他國人民的笑柄，而被人稱為堂堂大國 grande nation。

爲得特別闡明人類對他人意見所有的這種悖謬的，過度的重視起見，我們可以引證這種植根於人類天性中的「愚癡心理」的一個顯著例子；這裏因爲奇特的環境和恰好的性格連合起來，所以這個例子是極其難得，極其高妙，足以描畫出這種鄙賤心理的，因爲我們藉這個例子就可以完全衡量出這種極其奇絕的動機有如何大的力量。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一號泰晤士報，關於維克斯 Thomas Wix 的行刑有一種詳細的記載；維克斯是一個學徒，曾因報仇之故，把他的師父殺死。下邊就是那篇記載中的一段：「在行刑的那一早晨，監獄教士很早就蒞臨他。維克斯雖然神色平靜，却對於他的訓誡不感興趣。他心中所着意的惟一事情，乃是他如何可以在那觀看他的可憎結局的人的面前，極其勇敢的表現自己。——他的目的算是達到了。行刑臺緊臨着監獄，他去臺上時總得路過天井，在天井中他就說：「現在，正如道狄博士 Dodd 所說，我不久就知道那個偉大的祕密了」。他雖然手臂被縛，可是他毫不用人攙扶，就上到刑臺的梯上：在上以後，他就向觀衆左右鞠躬，於是下邊那些麇集的人羣就報之以雷鳴的讚揚喝采」。

由這個絕妙的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到，人們眼前雖然有極可怖的死亡方式，并且還有永生在後，可是他的虛榮心仍然不退，他所顧慮的只是他給一羣觀衆所印下的印象，并在他們心中所留下的意見。同年在法國，那謀刺國王而被行刑的萊孔德 Lecomte 也是一個例子，他在審訊時，所最感覺心煩的，乃是他不能穿上文雅的禮服出現於上議院，而且即在他臨刑時，他所特別悲哀的乃是，人們不許他預先把鬍子刮了。這種情形即在先前也是一樣。這一層我們可以從亞利曼 Mateo Aleman 在他的名著谷滋曼 Guzman de Alfarache 的序言中所說的話看出來，他說，許多昏迷的罪人，不把臨死前的刹那獻於他們靈魂的福利，却反而預備一篇簡短的演說，預記在心中，以便在絞架上發表出來。——在這一類例子方面，我們正可以自鑑自誡；因爲巨大的事例總是可以給與我們以最清楚的說明的。所有我們的顧慮，焦急，煩燥，憂愁，煎灼，努力，在大多數情形

下，都是有關於他人的意見，而與那些可憐的罪人一樣荒謬的。我們的嫉忌和憎恨大部分也是由同一根源來的。

很顯然的，我們的幸福既然大部分在於心理的平靜和滿意，所以最能促進我們的幸福的，莫過於把這種衝動限制到，緩和到合理的限度內（它在這樣限制後將只有現在的五十分之一），并把那儘管使我們痛苦的針刺從我們的肉中拔去。這件事情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我們在這裏所對付的乃是一種自然的天賦的悖謬心理。戴喜德 Tacitus 在其歷史四，六中說，「好名之心是一個聰明人最後才能擺脫掉的」。要想擺脫了那種普遍的愚癡，惟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清清楚楚看成一種愚癡，並且為求達這個目的起見，我們還當明白承認，他人的意見平常是如何易於成為完全虛妄，悖逆，謬誤，荒誕的，因而是不得重視的；其次我們又當看到，他人的意見在大多數事例下對於我們是如何不能有實在的影響的：再其次，我們還當承認，他人的意見多半是不嘉惠的，因而各人如果聽別人對自己所說的一切話，或聽人們談論他的腔調，那他就會煩惱得死了；最後我們還當注意，尊榮自身並沒有真實的直接的價值，只有間接的價值。我們如果一般的受了轉化，而擺脫了這種普遍的愚癡，那麼結果，我們的心理平靜和愉快都會增加到不可想像的地步，而且我們的立身也都可以較為堅定牢固，我們的行事也可以較為坦然自在。一種恬退的生活對於我們的心理平靜有一種極其有益的影響，這種影響所以可能就在於它可以使我們不必恆常在他人眼前生活，不必恆常注意他人的意見，因而我們就可以復返於我們自己。我們由此就可以避免了那種純粹虛幻的努力（正確說來就是，那種有害的愚癡）把我們引入的許多實在的不幸，因而我們也可以較為注意堅牢的福利，並且無間斷的來享受它們。但是 *χαλεπα τα καλα*（值得做的事情乃是難做的）。

第二節 驕傲

我們這裏所描寫的人性中這種愚癡，主要的有三個枝芽：就是，野心，虛榮，和驕傲。虛榮和驕傲的分別就在於：驕傲是對於自己在某方面的卓越的價

值的一種確立的信仰。至於虛榮則是想喚醒他人此種確信的那個願望，而且此種願望常伴着一種秘密的希望，希望他自己也可以得到那種確信。因此，驕傲是內面的直接的自我珍重；至於虛榮則是由外面間接來求得那種珍重的一種努力。因此我們就看到，虛榮使人饒舌，驕傲使人沈默。不過虛榮的人應當知道，他所奮求的別人的佳評，是容易經由不斷的沈默更確然的獲得了的，正無需乎自己宣傳，縱然他有極大的優點可以誇張。

一個想驕傲的，不能因此就成了驕傲的，他頂多只能裝做驕傲，而且他也會立刻拋棄了這種腳色，正如他拋棄了他所扮的別腳色似的。一個人只有在對於自己的卓犖的優長和特殊的價值，有了一種堅固不移的內心確信時，才可以成為真正驕傲的。這種確信也許可以錯誤，或許只是依靠在外面的傳統的特權上的，不過這也無損於驕傲之人，只要這種驕心是實在的誠懇的存在的。因為驕傲既然植根於「確信」之中，所以它就如一切知識似的，不受我們的任意所支配。驕傲的最兇的仇敵——我指的是它的最大阻礙——就是虛榮，因為虛榮乃是希求他人的讚同，以便把自己的佳評建立在其上的，至於驕傲的先決條件乃是那預先存在的確信。

驕傲平常是被人責斥，被人嚇住的；不過我想，責斥驕傲的人，多半是那毫無一長可以驕傲的人。在一般人類的鄙卑無恥，愚癡頑梗之前，凡稍有一長的人都應當把那種長處念念在心，以便不致把它完全忘却了！因為這樣一個人如果老實隨和，忘了自身，而與庸流為伍，好像自己也與他們完全同類似的，那麼他們一定會誠心誠意把他看做是他們的同伴。我特別願意向那具有最高特長人勸告這一層，（所謂最高特長就是那真實的，并純粹個人的特長），因為這些特長并不如品位和爵位似的，一時一刻可以耳聞目睹被人回憶起來；若非如此，那他們就會具體證實了羅馬人所謂 *sus Minervam*（豬教導文藝女神了）。

「你如果與奴隸開玩笑，那他立刻會把腳後跟擺露出來」，乃是亞刺伯的一個卓越的成語，而且霍拉斯所說：「要求你所配享的令名」那話也是不當拋棄了

的。但是謙遜的德性對於愚人却是一個有利的發明：因為這種德性使人人在談說自己時，好像自己也是一個愚人，這真可以把智愚之分痛快的剷除了，因為這樣結果就好像：世上除了愚人，就沒有別的。

最賤的驕傲乃是民族的驕傲，因為這樣就洩露了那被此種驕傲所擾的人，自己並沒有可以驕傲的性質，若非如此，他就不會求助於他與千萬人所分享的那種特長。一個具有重要的個人的特長的人，反而更可以最清楚的看出他的民族的錯誤來，因為那種錯誤是恆常在他的眼前的。但是每一個可憐的愚人，因為完全沒有可以驕傲的東西，所以他在窮策之餘，就以他恰好所屬的那個國家來驕人；他是極其樂意「手足胼胝」來衛護他的民族的一切過錯和愚癡的。就如你如果談說英國人的頑固偏執，而對之表示它所應得的鄙視，那麼五十個英國人中也沒有一個人會同意的話：假如有一個人，他一般說來也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德國人是沒有民族的驕傲的這就證明了人所宣傳的德國人的誠實無欺；但是那些在可笑的方式下裝做驕傲的人們，則正與此相反，就如德國兄弟會 deutsche Brüder 和民主派就是這樣的，因為他們是阿諛奉承人民們，以便把他們誤領了的。人們曾說，火藥是德國人發明的，但是我却不能同意這個意見。里奚登倍 Lichtenberg 問說：「一個人如果不是德國人，他從不冒充德國人，而一個人如果冒充的話，總是冒充法國人或英國人，這是什麼道理呢？」

復次，個性是比民族性遠為重要的，而且在每一個人方面，個性是應當比民族性受到千倍多的注意的。民族的特質既然是涉及大眾的，所以你就不能誠實無欺的給它許多讚頌。不但如此，而且人類的渺小，悖謬，和惡劣，在各地都各各表現出不同的花樣來，而人們所稱的國民性正是指此。在厭惡了此一個民族之後，我們就來稱讚彼一個民族，隨後我們又連彼一個民族也拋棄了。每一個民族都嘲笑別一個民族，而且他們都是對的。

這一章的內容乃是我們在上世界上所扮的角色，或我們在他人眼中的樣子，它

可以，如上所說，分爲三項，即尊榮，品位，和令名。

第三節 品位

品位，在大多數人和僮夫的眼中雖然極其重要，而且它在國家機械中雖然極有大用，可是我們在這裏可以簡短的了結了它。它乃是一種因襲的價值，而且真正說來是一種偽造的價值。它的效果乃是一種喬裝的敬重，而且這事情全部乃是對羣衆所演的一場喜劇。勳章正如向「輿論」來支取的匯票似的：它們的價值是有繫於支款人的信用的。它們可以代替償金，而給國家省下大宗用款，除此以外，它們還是一個完全有用的制度，如果它們的分配是本乎慎審和公道的。因爲羣衆雖然有眼有耳，可是他們並沒有別的，他們很少有判斷力，甚至也很少有記憶力。許多功勞是出乎他們所能理解的範圍以外的，有的功勞在一起初是被他們所承認，所歡迎的，但是隨後就又忘記了。因此，我覺得，人們應當藉一個十字或星宿，時時處處向人宣揚說：「這人并不如你一樣：他是有功勞的」。但是這些勳章的贈與因爲不依公道，毫無選擇，並且數量太多，所以它們就失掉了這種價值。因此一個國王對於勳章的賜與應當極其小心謹慎，一如一個商人對於匯票的簽字似的。在十字章上往往鑄上 *Pour le mérite*（紀功）：字樣，那實在是一種贅語，因爲每一種勳章都是應當爲紀功而製定的。——這是無需乎說的。

大城市的問題^(一)

(這些問題的科學研究之需要)

Notwendige Erforschung der Grossstadt.

海爾巴哈(Willy Hellpach)著^(二)

胡雋吟譯

我曾經把各處的大城市都稱爲是一種偉大堂皇的同時又是罪惡有害的現象，這確實是人們對大城市能夠認可的一個唯一公正的判詞。當然，所謂「大」城者，並不是按照統計學上的意義 (Statistisch) 而定——那就是說不是凡城市有十萬或十萬以上的人口——就算確實是個具有大城市特徵的大城。就生活的方式而論，有許多人口超過十萬的地方會能將其中型城 (Mittelsadtcharakter) 之特性保持到一個長的時期。可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居民少於十萬的工業城市反而具有一個大城市中所有的種種不良之點。當然，當一個城鎮有了二十五萬或二十五萬以上的人口時，牠的生活方式一定必需要有大城市那種生活的樣子。德國全國總人口四分之一都生活在其本質具有這種大城特徵的城鎮之中。幾乎是三分之一的人民是生活在有十萬多人口的城鎮中，六分之一的居民是生活在超過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中，十一分之一居民是生活在兩個更大的柏林和漢堡 (Hamburg) 巨市中。

大城市是內外雙方都是堂皇偉大的。僅就大城的廣袤來看，就可產生一種外表宏大的印象，牠那廣大的面積，那一大排一大排的房屋，一羣一羣的人民，

(一) 譯者註：譯自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2. Jahrg. 1936, Nr. 9, S. 113—114.

(二) 譯者註：關於著者身世請看 中德學誌 二卷三期五三六頁拙譯之註文。

許多的商店和車輛，晚間的燈光，它的動作的速律 (Tempo der Bewegtheit)。

因此種種，有一個時期這種大城市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影響，甚至於那些對大城市起了反感而不喜歡住在大城市中的人也是一樣受到牠的影響。但比外表較重要的是大城內面的偉大堂皇之點。此點係基於大城市與牠那全部充份發展的文化之間的不可分離的關係上面。凡是文化在牠們初期的時候，大概是附着於鄉村和皇廷中；可是較晚期的文化，我們常發現牠們是由於許多大城市之發展和生長而產生的(文化的發展和大城的發展是互相有關聯的)，那些文化高的大帝國的京城常常就變成爲大城市，甚至於當這個城市並沒有希望着要有這種變動時，牠也自然就變成了大城(如華盛頓，海牙)。統轄正在發展的德國，即『第一帝國』(das erste Reich)的第一位國王亨利第一(Heinrich I.)，他是負有“城市創始人”的歷史頭銜的人(不管嚴肅的學者們是否以此說爲公正)。並且在千年後的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雖然反對人民擁遷到城市中，雖然還訂出清清楚楚的程序把城市的居民送還到鄉間，但是，在每年舉行常年大會的女恩倍(Nürnberg)仍有四十萬人口，在政府所在地的柏林仍有四百萬居民，至如國社黨運動之首都明興(München)也是有七十萬的數目。

大城市的罪害是心理和生理兩方面的。就心理方面(Psychologisch)說：巨大的城鎮是怕陽光的生物之堆積所，是專業罪犯和妓女們居處地，(比較害少些的流浪者是鄉村的現象)，是大批品格不可靠的人和度『夜生活』(Nachtleben)的人們的寓所。在大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方式，一部份是直接的被以下幾種事實所形成，這種事實不是很堅實的生根在本鄉土的傳統上，而是由於流行的表面好奇(不是真興趣)，由於各種感覺的急速變換與所有各種各樣精神及肉體的刺激的變換，由於彼此休戚相關之感情的崩解和由於一種紳士架子(Snobismus)與自我主義(Egoismus)所形成。但是比這個更重要的或者可以說是大城市的生理方面的(biologisch)罪害，那就是說民衆活潑潑的生命力漸被以下的幾種情勢所毀壞了，如：急促和神經過敏之緊張，白日作工和夜生活的奔波，光線惡劣和通氣

惡劣的房屋，遠遠的離開了大自然，尤其是生殖率的低降——這種低降大概多不是因為主觀的心理的因子而是客觀的心理的因子所致（那就是說不僅沒有繁殖的欲望而且亦缺少從事繁殖的能力）。

這是很明顯的，像這類的聚積物我們是不能讓牠發展的，必須加以抑遏。德國(如英美)一樣由於大城市之偏重的發達頗感受痛苦。一種出乎常態的大部分的人口是遭受到了這種大城市之惡害的影響。在大戰之前德國有個野心，要使每個中型城鎮必須達到十萬人口的水準。好像能這樣就可以驕人了。這個野心雖是錯誤的，可是人們不能過於決然的去反對牠。但是假如在這方面若是用另外一種完全與此不同的心理態度，那麼在土地屯墾方面——特別在東德意志——一定更能獲得大的成功，並且在將來一個時期，或者要建立起一個新殖民地帝國(Nenes Kolonialreich)並將要把很大的一批國家民族吸收了去。假如我們用此種方法每年減少兩千人，在兩代之內，能把在統計數目上具有大城市資格的城的人口數從佔全國四分之一的數減到六分之一，那麼我們人民的福利一定會有極大的增進的。但是即或如此還要有一千萬或者一千二百萬或一千五百萬德國人仍然要生活在大城市裏的。

因為這麼大數目人民註定的要留住在城市中，所以必須要對大城市進行科學的研究，並且甚而必須較今日所進行的還要更澈底周密的去從事研究大城市內之生活情形及這種生活情形所生的影響。

有兩方面我們必須在此特別加以簡單的敘述：—

(一)大城市的人類學 (Anthropologie der Grosstadt)。這裏生出三個主要的問題：—

(甲)是否有一種合於人類學中之某一定型的人民，他們原來居住在純粹鄉村風味的區域或村鎮之中，後來會被吸引到某種大城鎮中(中型城，城鎮，城市，巨城)去生活？然而，不幸，今日我們僅知道似乎是：最有稟賦才智能幹的鄉村居民(按最合理論所按排的模式)都是離開了鄉村而被城市吸引了去。但是他

們只能算是趨入到城中居民裏很少的一部份，並不能算是成羣離鄉們的全體。爲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於趨入城鎮和城市生活的全體人民加以研究。或者艾科史退梯(von Eickstedt)的『種族診斷法』(Rassendiagnostik)在此點可以發揮牠的效驗。這種方法在人類學研究者的方法中算是第一個可稱許的辦法。比馬丁的『種族測量術』(Martinsche Messtechnik)較爲優良。

(乙)就全體而論大城市的氣象，特別是牠那十分特殊的輻射光線和流射物的情形(城區和其天空間之霞霧，瀝青馬路的表層和牠與土壤間的鋪道材料，小巷，天井，房屋和只能射進微光幾乎沒有紫外光線可以射入的工廠)，這種氣象情形是否會產生一種「生理學」上和「形態學」上的特種形態的居民？猶如山獄地帶，海岸，沙漠帶等地所產生的特種形態的居民一樣？是否這只是與城市情況共同長久的一種現象形態？或者是城市氣象影響了生長的形態(Genotyp)？變換了這生長形態？破壞紊亂了這生長形態？我們將在此處看出可能的生殖能力的生理之衰弱(即大城市的『生殖力的罪害』(generative Besartigkeit)的中心問題發生出來了。

(丙)在大城鎮中同族人 (Blutsverwandtschaft) 的存在和繁綿能到多麼長久？到大城鎮中來的新居民是寧願與城鎮中的家庭結婚嗎？在大城市中有些老舊的家庭嗎？老舊家庭是在那一階層發生的(社會人類學的問題 (sozialanthropologische Frage)？這些家庭的年代有多麼老久？當考慮這個問題時，當然我們必須把婦女和男子用平等的看法，都當計算在內，並且也不能只是固執在同一的姓氏上去考慮。雖然目下所有的這類事件之探討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決不能把每個大城市都看作為典型的，例如德國首都柏林就是特殊的。我們一定要把老城市和新城市的區別找出來(所謂『老』城市者是百年以前即存在的，並且最近五百年中都相對的變成了大城市(那就是說以相對的人口密度爲衡量)。並且此外我們還必須澈底的去研究那些中型的大城市(大概人口在十五萬到五十萬之間的城市)。

(二)大城市的社會心理(Sozialpsychologie der Grosstadt)：社會裏的下賤的人們(Auswurf)——罪犯及娼妓——很早就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了。但是去研究數百萬工作勤苦且誠實和有效率的城鎮居民也是有同樣的重要，因為在現在他們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這些人民所領導出的生活之特點，是由五種特別的城市因素表徵出來：(一)人數多，(二)像他們那樣的擁擠成羣的狀況，(三)變換不定，(四)許多式各樣的個人彼此都很生疏互不相識的情形，(五)生活有許多方面。我們可以用一句話將這些情形總括起來如下：——城市生活之洪流是由於一個數目極大的不同的份子所構成，他們彼此很緊湊的擁擠在一處，變換很快，彼此之聯係既非由於血統的關係也非由於相知的友誼關係，並且其性質是特別的各不相同。這種情形包含着許多罪惡之果，如：缺乏人類之聯繫(Unverbundenheit)的自然的傳統的基礎，缺少社會的義務，整個的是以物質利益之過度的肥脹(Hypertrophie)代替了人性的修養（這是指實際情形而言並非按修辭學上的意思）。我們也發現了那渴慕變換，盲目羣棲的本能，但是把其他本能却弄失了。（即對家畜而言也發生了牠們本能之弄失，城市生活使山鳥候鳥至幾代之內就變為一種定居的鳥了；或者有一天牠們要變成為一種不能鳴的鳥了。）但是這五種因素，也使新移來的居民在難以置信的速度下，就同化成為有一定居處的居民特徵的主要因素。新移來之居民漸漸的變成為喜好城鎮生活，並且也漸漸的印上了同樣的特性(三)。

在這種方式之下我們龐大的德國城鎮曾能够保存他們所卜居之區域中之居民的典型性格（可崙 Köln 是萊因河的 Rheinisch，漢堡 Hamburg 是下撒克森的 Niedersächsisch，明興 München 是巴燕的 Bayrisch 其他等等的），亦就是在

(三) 著者註：在我所研究的題目『習慣與性質』(Standort und Wesensart) (Zeitschrift für industrielle Psychotechnik, 1934)中，我曾試着更較詳細的去描述這種程序。並且在我的講演「社會身體的習慣對於心理身體性質之構成的影響」(Der Sozialphysische Standort als Gestaltungsfaktor der psychophysischen Wesensart) (Kongres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logie, Tübingen, 1934)中也曾談到此點。

這種方式下這種城鎮之日常語言，漸漸的被一般德國人當作爲這一個特別省份人民的典型方言了（如萊因的，巴燕的方言等）；在實際上比那一省真實方言更典型的乃是在城鎮區界以外地方的土話，這種土話其他省內的德國人很難懂得，並且它們彼此各處之間的差異太大，也不能夠使它成爲一大省的代表語言。那很是一件有意味義而可歡迎的事，就是：方言學（Linguistik）（俗語 Umgangssprache）和民間傳說（Volkskunde）（城鎮風俗 Stadtbrauchtum）已經起始注意到以上所說的這種重要的現象了，這種現象是有一種標誌，能夠表示出來大城市的『偉大之點』的歷史的事跡，及大城市在一種特別的方式下具有可以代表國家能力的史實，（並且因此牠特別的適於作爲首都等等）。在近代民族國家凡具有大帝國的性質愈多則這種能力是愈重要。德國的城市大部份仍是保留在種族部落（Stamm）時代的京城式樣（如明興 München 史圖加特 Stuttgart，可崙 Köln，德累斯頓 Dresden，布累斯勞 Breslau，科尼斯倍 Königsberg）。所以他們能夠避免太過度的集中化（如柏林），他們會幫着去保留德國國族的生活和文化之充實與豐富（Fülle）和變化多方（Farbigkeit），但是同時却又要能夠將各種不同的小城鎮和各地方的風俗語言混合了，由此則可能的使各種太不同的份子聯合成爲舉國一致的國家。現在根據社會心理和國家心理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明瞭了這種成就是不能忽視的。但是這個並不能阻止我們去反對大城市之過度生長。事實上只有用這種研究討論的幫助，我們纔能發現如何起手去從事這種事業。我們不能就這樣的便能廢棄了德國大城市，我們必須試着去限制其生長之速度和廣度，並且我們也必須盡可能的速度去連根剷除掉那種使每個城鎮變成爲「像似大城市一般」之種種事件的野心。

此二者之外，還有第三種罪惡，就是依附在這類大城市中之生理和心理的危險。但是永遠不能用抱怨和講演去應付真實的危險的，只有對牠的本性求得清楚的智識纔行。科學的研究可遏止疾病之傳佈，而且若不是對於生殖作有科學的研究就不會有優生的進步的希望。科學能夠克服在大城市生活中所產生之生

理和心理雙方面的很多的損害。譬如說：爲了我們要去探討大城市人口傳代方面所受的損害這種智識，和我們要去找出治療這種害處的方法，則「城市風景」的氣象學和生物學（這是從近代地理學上所介紹的來一個觀念）可以說是十分有決定性的重要的。（四）

（四）著者註：關於健康（也有心理健康）方面的城市合理設計之數條標準原則請看我所著的“Geopsyche” “Aufgaben einer Geurgie”，最末一節。一九三五年第四版特別請看第一四八節及一四九節 Klimaschöpfung及 Landschaftschöpfung。

法律學的現狀^(一)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希培爾 (Ernst von Hippel) 著^(二)

曾一新譯

最近幾十年來，世界上發生的主要事件，要算戰爭，革命和經濟崩潰。這些事件，給法律學也造了許多問題。在這研究與進步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上面，也屢有著名專家，各就其所長，對於這些問題發表過意見。細讀這種文章，覺得他們好比是對外行人說明農業，工廠，鑛山或學校是什麼似的。現代生活，極端分歧，瞭解別人所做的事，是人類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共同生活的前提。這樣看來，這種精神上的開導，是具有莫大的價值的。

然而那要求我們再進一步去探討背後情形的因子，却與其說在這些事件本身上面，倒不如說在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上面。因為這些事件是像雷雨般，像洪水般，像暴風或火災般襲擊了人類的。為防止這些災難起見，人類便建築了堤壩。今日的人類即站在這些堤壩背後。人類雖然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去防守，但是人類對於這些災難的發生所站的地位，一般地說來，却是被動的。因為人類雖然除自然人的資格外，還帶上人類的自由站在這些事件之中，但是這些事件，從全體上看來，好像是來自外面的自然現象，好像是不假人力即降臨到人間世似的。

現代的這些煩惱，是平白擺在人類面前的，人類只得忍受，或至多只能加以組織罷了。現在這個事實——現代人的內部感情也適合於這個事實——，不能

(一) 譯自：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6. Jahrg. 1940, Nr. 25/26. S. 284—286

(二) 著者是科尼斯倍 Königsberg 大學公法和法學理學教授。

不使法律學深趨沈悶。法律學雖然不直接和外面的自然界發生關係，而只和人類共同生活發生關係，但是這個共同生活却是人類根據自由，顧慮將來而提出的要求。那麼，正在法律學的範圍內，問題好像來自外部，具有自由的人類好像無權過問，自始即被強迫，這是怎麼可能的呢？再者這一代人和上幾代人的行爲，都在這些事件裏面，那麼人類對於這些事件，怎麼能夠如同對於雪崩所肇的災禍一樣，毫不感覺責任呢？

我們現在對於這些問題，當然不暇詳答，但是這個解答却表示法律學已經誤入歧途，並且是中世以後所謂「名目論者」Nominalisten 對於「實在論者」Realisten 得到「勝利」Sieg 以來即走錯了路的。按實在論者主張，概念表示實在，而名目論者則認爲概念只是名目，只是單純的「目的設定」Zwecksetzungen。在這論爭背後，是存在着比這兩個理論陣營的單純形式討論更重要的意義的。實在論者在概念上堅持超感覺的神世界的存在與其客觀價值。這種神世界，是阿奎諾 Thomas von Aquino 一類的人，由下而上，經過一番思索所達到的境地。神世界的門，只向阿奎諾一類的人開啓着，神世界具有一種超過概念之外而只有高超的直覺能夠認識的深奧祕密。反之，在名目論者方面，則人的「自我」das Ich，已經脫離了舊的客觀體系，名目論者不過在傳統的意義上感覺到這些客觀體系的拘束力而已。於是，「外界自然」die äussere Natur 和「內部思考力」das eigene Denkvermögen，在名目論者便成爲世界的兩極了。

在法律學裏面，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表示曾經在法律概念裏面主持秩序——這秩序歷來被認爲非人類所能任意過問——的一切因素，已經慢慢消滅。因此，高出自然法和實證法之上的神法的觀念，便首先消滅了。歷來「啓示」Offenbarung 的事實和基督教生活體系的思想，是藏在神法概念後面的。宗教改革 die Reformation 一起，基督教信徒遂行分裂。同時聖經的權威解釋既廢，真正有根據的聖經解釋又付闕如。因此，法律學便和神學脫離關係，而逐漸成爲結合於外界的國家權力的單純機能了。這是在十九世紀完成了一個過

程。當時連「自然法」das natürliche Recht 也被認為一個怪物，並且因為自然法是純粹的哲學問題的緣故，牠便被認為「非法學的」unjuristisch 了。這一階段，可以拿皮拉圖斯 Pilatus 的疑問「何謂真理？」Was ist Wahrheit? 來做指標。因為這一階段，是由名目論思想在「唯物論」Materialismus 裏面得到勝利時開始的。名目論思想，如今甚至認為「真理」die Wahrheit 也不過人類所樹立的一個目標了。就法律學而言，這便表示自然法已經落後，已經失去了意義。現在自然法可以說只成一個法律概念的古董，而保持其由思考技術想像出來的毫無內容的存在。留存下來的，便是「實證法」das positive Recht。實證法從前只包括法律行為的一部分，那就是既不受啓示的支配，又不受真理思想的支配而歸人類立法權節制的部分。

法律學回到實證法，雖然表示法律學擺脫了陳舊羈絆，但是仔細檢討起來，却未始不可以看出這裏隱藏着一個禍患。那就是：法律學，以前可以說是「神學的女僕」Magd der Theologie，但是從此以後却變成「唯物論自然觀的奴隸」Sklavin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Naturauffassung 了。關於這一層，如果培根 Bacon 在許多地方可以認為現代「法律實證主義」Rechtspositivismus 的鼓吹人(三)，那麼在這裏也要重行出現名目論和盎格羅·薩克森 angelsächsisch 世界觀的舊關係了。

從實證主義的立場看來，「法律」Recht 這個概念，是指那些內容不受約束，而根據國家意思即人類恣意發生效力的規定而言。名目論提倡近世自由思想，反對單純的教會權力。但是「自由」Freiheit 否認了超感覺的東西，便成為「恣意」Willkür，而使人的主權去代替神的主權了。然而他方面一切自由却以人是否和「天國」Reiche der Himmel 相結合為轉移。按天國由上而下，向塵世灌注那在外界自然本身中不能發現的東西，並且只有這個東西可以使塵世

(三) 參看希培爾 Ernst v. Hippel 著：培根和唯物論國家思想 Bacon und das Staatsdenken des Materialismus, 一九三九年。

擺脫自然約束^(四)。因此，如果取消自由，否認超感覺的東西，人便不能不像普羅梅泰斯 Prometheus 之被繫於岩石那樣，被繫於失去神性，變成單純物質的自然了。這是一種屈服，拿法律實證主義的說法來說，便是；立法官雖然「可以」darf 做一切的事，却礙於「自然法」Naturgesetze，不「能移」kann 做一切的事。「法律科學」Rechtswissenschaft 既然在「法學」Jurisprudenz 這個名義之下變成單純的「目的論」Zwecklehre，認為精神世界超過法律範圍之外，那麼關於現實世界的事，主權便必然要成為法律學的真正主宰了。

經過這個名目論的轉變之後，因為「人定法」Rechtsgesetz 也和「自然法」Naturgesetz 一樣，同指一種來自外部的力量，人定法便和自然法大行接近了。這一層，我們可以從因果觀察在法學名詞裏所佔的勢力明白地看出來。非但所謂「因果關係」Kausalzusammenhang 本身如此，便是「法律效力」Rechtskraft，「法律效果」Rechtswirkung，「法律上之不可能」rechtliche Unmöglichkeit 等概念和「無效論」，Nichtigkeitslehre，也往往枉曲人類自由的問題，使之變成因果律上或邏輯上的必然性的產物^(五)。這個法律學上的名目主義，要算在所謂「純粹法學」reine Rechtslehre 裏面，達到了最高峯，同時表示了真面目。因為法律在純粹法學裏面好像是一個整套的邏輯網，這裏只有一個不合理的因素，是在這個系統的未確定性裏面。決定這個未確定性的，是當時的「強權」Macht。強權便根據「基本規範」Grundnorm 去任意決定法律的性質和內容。於是由外面加以強制的專制權力，便和一種由內面強行「邏輯上」logisch 的合法態度的數學方法結合起來。

法律名目主義的弊病，要算在於牠所引起的法律思想的野蠻化裏面。但是

(四) 關於自由問題，請看施泰納Rudolf Steiner: 自由的哲學 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五) 參看希培爾 Ernst v. Hippel: 有瑕疵的國家行為問題的研究 Untersuchungen zum Problem des fehlerhaften Staatsaktes 第二版，第三十一冊，三十五頁以下和希培爾 Fritz v. Hippel: 法律行為上的個人自治問題 Das Problem der rechtsgeschäftlichen Privatautonomie, 一九三六年。

實證主義已經認為「拘束力」Verbindlichkeit 和「強權」Macht 是不能分開的概念。一俟統治權力被宣佈為法律權力，一俟統治權力的任意意思被宣佈為法律意思，「可以」Dürfen 的問題便隸屬於「能够」Können 的問題之下，「可以」便彷彿消滅在「能够」裏面了。今日的學生被問到某警察處分的合法性的時候，其實是關於「可以」的問題，也大半恐怕將以警察「能够」如此如此做或「不能够」如此如此做相答。這便表示拘束力和法律的問題，就是在這裏也被一個唯物論的自然概念所吸收了。

「可以」的問題和「能够」的問題的混合，表示思想的混亂，同時思想向精神道德發展的路綫即被打斷，思想便只在有關外界自然的範圍內為人所承認。另一方面，法律思想既受自然的約束，法律內容又可隨意決定，這就激成了開頭所說的僵局了。試舉一例來說，現在根據各國的「意思」Wille 發生拘束力的所謂「國際法」Völkerrecht 便是如此。但是這個意思，在法律實證主義看來一按法律實證主義不是由精神和心靈出發，而是由單純的「肉體人」Leibesmensch 出發的——不過是一個「經驗意思」empirischer Wille 罷了。因此，今日的國際法便也是想在「惡」das Böse 上面樹立「善」das Gute ——就是人類的和平的和正當的共同生活——的一個企圖。肉體人的意思是利己的。「利己主義」Egoismus 的產物，只有一切的人對於一切的人的鬭爭。實證主義一方面背離生活的真正秩序，在精神上造成「無政府狀態」Anarchie，造成霍布斯 Hobbes 之所謂「自然狀態」Naturzustand，一方面却又想由外面拿自然法之所謂「強制」Zwang 來整頓在內面引起的「混亂」Chaos。但是這裏也有強制為何目標而來的問題，因為實證主義是專關心強制的效果的。法律觀察的最後目標，不在國家要什麼上面，而在國家「可以」dürfen 和「應該」sollen 要什麼上面。

即使現代的危機表示法律學彷彿在新和舊的過渡點上，法律全體的思想也不應該消滅而只成一句空話。但是這裏必須要明白，一初法律都與善有關。即

使某一個統治「權力」Gewalt 把牠的單純的強權意思制定為法律，也沒有惡「法」Recht 存在的。於是人類便又不能不把眼光放到在中世消滅了的較高的秩序上去，而用一個新法子——就是從自由出發——，去恢復那秩序了。否則人類將把法律和人類固有的特質一併失去，而成爲死的自然概念的奴隸。便是不由抽象的定律出發而由歌德 Goethe 之所謂「原現象」Urphänomene 出發的真正自然科學(六)，也早已開始離開這死的自然概念了。

(六) 參看費爾阿邊特 Oscar Feyersabend: 有機學的自然觀 Organologische Naturauffassung, 電碼與進步 Forschungen und Erforschritte 第六期(一九四〇年)。此外還有哈特曼 Otto J. Hartmann: 地球和宇宙 Erde und Kosmos, 一九三八年。

世界人口增減問題^(一)

Übervölkerung oder Volksschwund

堡德菲 (Friedrich Burgdörfer) 著

金 舞 侯 譯

英國研究人口增減問題之有名專家麥爾脫斯 (T. R. Malthus) 距今百餘年前 (1798) 曾發表一文，彼之學說以為按照大自然之演進人類生殖率日增將超過世界食物產量而有供不應求之患。此問題曾引出許多論文，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在十九與二十世紀爭辯甚烈。

麥爾脫斯於一七九八 (距今一百四十年前) 第一次發表其成名之文“人口原理問題”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其中論文及各國人口之概數如下：

| | |
|------------|--------|
| <u>英三島</u> | 約一千六百萬 |
| <u>意大利</u> | 約一千七百萬 |
| <u>德國</u> | 約二千三百萬 |
| <u>法國</u> | 約二千七百萬 |
| <u>俄國</u> | 約三千五百萬 |

按上表觀之，當其時全歐人口共有一萬七千五百萬。全世界人口在一八〇〇年共有六萬萬。

麥爾脫斯後百年 (十九世紀) 世界上人口有特別顯著之增加，自一八〇〇迄

(一) 節譯自：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1. Jahrg. 1935, No. 34, S. 433—434

今一百四十年之間增加三倍有奇，即由六萬萬增至二十萬萬，尤其在歐洲。雖經移民至美洲約有三千二百萬及受第一次歐戰死亡之損失約有三千萬——然其人口仍自一萬七千五百萬增至五萬萬，其增加率亦超過三倍之多。

在麥爾脫斯當時以世界將有人滿之患甚為恐懼，但至今以事實判明並不足慮，因現今世界人口雖較麥爾脫斯時增加三倍有奇，而不可思議的大自然付予吾人生活需要之元素不但不感受缺乏而反出產過剩，即就今日世界產額計，可供六十萬萬——八十萬萬人之需用，按照世界今日之人口尚可增加三至四倍，且無可慮，況以科學之協助，產量且正蒸蒸日上。

但現今世界，有許多人正在提倡節制生育，違反自然之演進，尤其歐美各國，行之甚衆，以前麥爾脫斯所耽憂者，更可不致發生，惟節制生育不但影響人口降低，而民力亦隨之減少。

輓近世，人口生產率，已顯特殊減低之趨象，溯自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戰爭之後，漸漸延展至歐洲西部，中部，而北部，現更延及意國與歐洲東部，及世界各國，即人口原已最少之國亦在提倡減少，如美國平均一方公里有十五人；澳洲一人（但德國平均每方公里一百四十人）。

試觀人口生產比較圖，即可看出在歐洲東部人口繁密，而愈西愈稀少，吾人若就事實，而製一歐洲各民族生產統計表，如在“人民無青年” („Volk ohne Jugend”) 一書所載：日耳曼民族國家（歐洲中西北部，荷蘭除外）之生產率銳減，已不够水準，在法國人口生產率之結算，結果亦是減少，在歐洲其他國家雖有時生產率增高，但距水準亦相差甚遠。

按現在人口生產及死亡率作比例，而以理論來估計，則將來自二十世紀下半期，全歐及澳美二洲之白種人，必有顯著之銳減，如此，則二十世紀後期，生存之人民，因受人口減少之影響，定必多為老年人，可無疑義。

關於減少死亡，在歐洲各國，已作到盡美盡善，達於極峯，故僅以減低死亡率，為補救人口之增加，實非有效之策，在德國尤甚，故唯一而無疑的補救方

法，仍在生產問題。

生產問題，究有補救方法否？此則在乎，如何勸教，而使人民出乎自願，以前羅馬帝國時代，對此問題，曾經甚為重視，但以其無確實統計，並以為成功甚易，故爾終歸失敗。

「人民政策」之施行，亦必如其他任何政策相同，必須在政治領袖監督下而實行之，其目的最要者有二點，厥為‘量’與‘質’，量的方面自以愈多愈佳，而質的方面更須優秀，但此兩點，在歐洲知識階級人民，甚難辦到，尤其德國，以現時紀錄來看，最優秀之人民，往往多較次優秀之人民生產率為低，但如何能使其相反，而令最優秀者生產率較高，此為吾人惟一之目的。

新德國所採之人民政策，最低限度，以達到人口量數增多而且優秀為目標，茲就一九三四年一年記錄觀之，其人口自九十五萬七千達至一百十八萬一千，其增加額為二十二萬四千人，約達百分之二十三，尚距水準百分之十五而至百分之二十，雖然如此，已可補彌已往三十年來生產之減少，關於此點，即可為一明證，不獨德國如此，即全歐各國人民，仍甚健康，不須藉用外力，尚堪自增產額。

以前麥爾脫斯之學說，雖盛倡一時，但至今已一蹶不振，另一方面，對於人口減少之補救，吾人應極力設法為之，總之，吾人希望德國人民，對此問題，要努力使之成功，幸勿歸於泡影。

五十年來之汽車^(一)

50 Jahre Kraftwagen

麻綽 (Conrad Matschoss) 著

董遂曾譯

行駛大地道路上以汽力推動之各種乘具，約計有三千五百萬輛之多。藉製造汽車從中得工作與獲利者，計有數百萬人之多，藉自優良道路運輸材料分配，以至於近代輸油站而得有工作及利益者，又有百萬人之多。自有汽車以來，雖祇有半世紀之久，今日吾人對之已認為不可少。實際於一百六十年前，法國已試用一具空氣壓縮機，行駛載重車。在英國則汽車與鐵路同時發展，惟爾時道路尚未臻完善，致汽車不能發達，而人尙是好乘火車。奧國亦曾竭力試驗，利用內燃發動機推動汽車，然無結果可言。

今日汽車之進步，實創始於載木珞 (Gottlieb Daimler) 氏，因該氏曾首先創造快速內燃發動機，汽車幾一律裝備之，因之此位士瓦本 (Schwäbisch) 籍之技師博得吾人今日汽車史上第一之地位。

載木禮氏乃一烤麵包師傅兼葡萄園丁之第二子，一八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生於魏登倍 (Württemberg) 彼肄業於小學校與拉丁語言學校，曾學習鎗匠手藝，嗣又在機械工作機製造廠充一名工匠，藉此竭力節儉，積有餘資，遂入斯圖加特 (Stuttgart) 城工藝學校肄業該校即日後本地之工科學大學是也。嗣後該氏曾在國外服務，充當專門工人，工人頭目與師傅等職，歷數年之久，待彼回德國之後，曾充石台格 (Steige) 河津蓋斯林根 (Geisslingen) 城機械工廠之機師，後又

(一) 譯自：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1. Jahrg. 1935, Nr. 35/36, S. 458-459.

在雷特林根 (Reutlingen) 孤兒院機械製造學校充工廠主任，後又充卡爾斯魯厄 (Karlsruhe) 機械製造公司技術總管。瓦斯發動機創造者歐突 (W. A. Otto) 與瑯根 (Eugen Llangen) 聘迎載木珞 在其獨逸慈 (Deutz) 地方瓦斯發動機公司為技術監督，該氏對於瓦斯發動機之建造，極度研究，使其於較大範圍內，得施行其適宜之工作，並委任其前在雷特林根 所結識之助手邁巴 氏為構造處指導者關於工廠之專門工作人員，概係來自魏登倍 與挨爾薩斯 (Elsass) 兩處，於是便成立一能力強大大工作團。載木珞 與邁巴 在獨逸慈 對於製造內燃發動機會立有準確技術之基礎，該項基礎日後實可為其私人工作，於新途徑上達到甚大之結果。

載木珞 氏於 (Gottlieb Daimler) 一八八二年決獨行創辦，彼曾獲得可觀之資財，遂移往斯圖加特城 之康斯達 (Cannstatt) 居住並在濤本海姆 (Taubenheim) 街十三號地區之宅傍，建設一規模甚小工廠。

邁巴 (Wilhelm Maybach) 氏係於一八四六年二月九日生於海爾布崙 (Heilbronn)，乃細木作之子，父母早喪，養育於雷特林根 之孤兒院，在此依其志願，造就成為機械製造者，載木珞 識彼之後，頗重其才能，後竟成為其最親密之助手，至是載 氏仍邀彼為股東。第一部按照載 氏計劃製造成就之快捷。試驗發動機，乃出於一位鑄鐘兼救火機製造者之手。平行式汽缸為青銅製造者，火車輪因迴轉數之大，故用鍛鐵製造之，發動機工作時，需用空氣以資冷卻，此種第一具載木珞 式之發動機於八月十六日方告完成，並裝置於木座之上，從茲實驗，便行開始。同年十一月復造就一具用縱立式汽缸之較大發動機，由一八八三年二月十六日起，此種載木珞 式發動機，遂獲得德 政府批准特許為第二八〇二二號之專利品焉

專利品執照內，曾說明此項發動機，乃係用一種熾熱球以為燃燒作用。熱汽缸壁，需用相當壓力，始能令所混合之煤氣與空氣發生燃燒，熾熱管僅供開駛應用。但實際上，當行駛時，尤其在野外，熾熱管不能付諸闕如，利用此種燃燒發動機，迴轉數每分鐘可增至九百之多，在効力上之比較重量藉此可極度減

少。歐突氏曾自詡其氣壓機。迴轉數每分鐘可能達至九十之多，四程週線機之迴轉數，每分鐘可達至一八〇轉，斑慈 (Benz) 氏於其回憶錄內書有製造第一具汽車時，曾用電氣燃燒，迴轉數每分鐘可達三百之多。載木珞氏曾經預擬創造一種小型輕快內燃發動機，効力甚佳，足為汽車事業上之發端。第三具發動機係縮小機體用圓形箱殼裝璜之，於一八八四年見於應用。此種發動機日後用雙輪車裝置，并在其康斯達住宅花園內舉行試車。一八八六年已見有載木珞氏四輪汽車行駛於康斯達及斯圖加特兩城市，汽車座位之中央裝置單汽缸之發動機，約合1½馬力。摩擦結合為傳送汽力於二速率之轉齒輪，每小時可行十八公里之路程，所用空氣冷卻法，日後用冷水冷卻法。

約於同時代斑慈 (Carl Benz) 氏在曼海姆 (Mannheim) 地方，曾製造二程週線汽機，并製造有汽油發動機，裝於三輪車上，彼之對於汽車發達上非常重要之生活工作，便因是而發軔焉。

一八八九年載木珞氏汽車與載木珞氏發動機小汽艇，曾陳列於巴黎京城之第一次世界展覽會，一八九〇年，更有四座位之汽車發見於交通，而車輪之轉動，係用皮帶以為連絡，大型發動機裝飾箱係懸吊於車架之後方，有如行李箱相似。斯時車輪之橡皮輪係採用實心者，并須用一豎立式汽油箱之壓力以扳手管理，使其轉動。一九〇〇年始產出一種汽車，第一座『墨西德』 (Mercedes) 車，其外表形式與今日之汽車，實已相近。此種汽車發動機，裝置於車之前面，車架形式，長而低，發動機之裝備係用噴汽機，被調節之啓閉門，與蜂房式之冷卻機。其交替齒輪與調節齒輪，亦均示有進步，空心橡皮輪於一八九五年已產出，於一八九八年始由載木珞氏定為人乘汽車應用之繩準焉。

載木珞氏卒於一九〇〇年三月六日，享年六十六，汽車前途之發展，自非該氏所得參與。不幸天奪其年而其所預擬之發展亦不得實現矣。

邁巴 (Wilhelm Maybach) 氏尚得充分參與工作，歷二十九年之久，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與世長辭，享年八十四。

德國學術協進會之成立及其發展(一)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曹京實譯

德國學術協進會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的原來名稱是德國學術救濟會(二) (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en)，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成立的。今年是牠成立的二十週年紀念。恰巧今年在柏林——石頹哥利茲 (Berlin-Steglitz) 又成立了一個研究館。本文的一部分材料是由於訪

譯者註：——

(一) 譯自英文版 Research and Progress，七卷，一期。一九四一，正月——二月出版。

(二) 德國學術救濟會的發起人及第一任會長為非得利·史密特·奧特 (Friedrich Schmidt-Ott)。於一九二〇年他創立德意志學術救濟會，不僅對於德國學術界有無上的貢獻，並且還儘救濟會力量之所能及，以促進國際間科學之共同工作。其規模是非常之廣大。

他將畢生精力傾注於學術，曾獲得大學各科之博士學位，甚至還獲得工程科學之博士學位。一九三〇年當他七十祝嘏之際，德國學術界將德國學術五十年來之進展分門別類作一總括的敘述集成一冊名為五十年來的德國術學 (Aus Fünfzig Jahren Deutscher Wissenschaft) 作為他的七旬壽辰的紀念冊。並擬於其壽日將總括一切學術榮譽之「全科博士」 (Doktor Universalis) 學位贈與他，又擬授他以「學術領袖」 (Procurator der Wissenschaften) 或「學術樞衡」 (Moderator der Wissenschaften) 之尊號。其在德國學術界之地位於茲可見了。梅學曾謂德國科學家之為人：「處境甚苦而立志甚高，雖遇貧困而處之怡然，蓋其心目中視科學為道義上之事業，故鞠躬盡瘁，以從事其間，苦樂非與所計，與信徒之以身殉教者等。」德國學術救濟會於史密特·奧特領導之下將此等精神可謂充分表現。——關於史氏之詳細紀事可參看中德學會出版之五十年來的德國術學。

問德國學術協進會會長門澤爾教授 (Professor Mentzel) 所得來的。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對於這一向不被人注意的德國學術研究的中心機關看到一些有趣味的事實。

自從德國學術協進會成立以來，這二十年的光陰對於德國學術研究的進展頗具有重大的關係。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大戰之後，德國的學術已萎縮到不景氣境地。但是經過這番不景氣之後，德國的學術又復活起來，並且範圍非常之廣大，開闢了許多新的研究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前人所未作過的，不祇具有純學術的內在價值，並且對於工業，工藝學及德國再整軍備也證明出其非常的重要及實際的效用。德國學術協進會常常的幫助德國科學界。或由本會學者幫助研究，或借與本會儀器，或對於需要大量金錢的研究計劃補助資金。有許多很重要的發明都與該會二十來年之工作有密切關係。但此種情形為數太多本文不能一一述及。現在，該社之中央辦事處與國立研究委員會 (Reichs-Forschungsrat) 已取得密切合作，共同負責向各種科學研究工作加以金錢的幫助。凡任何方面之科學研究如遭遇問題，而想解決，都可得到資助。所以受到這兩個機關的幫助的事業為數很多。該協進會的會長同時即是國立研究委員會的副會長。由此可見該會與德國學術研究「總設計部」之密切關係了。

上段曾提到訪問門澤爾社長，在作此訪問時他曾特別注意到這個研究會的名子。「德國學術救濟會」這個名稱在此際真是名實相符，恰與門氏所云。因為在戰後通貨膨脹，經濟崩潰——所以到此地步均是因為凡爾塞條約加與德國所不能擔負的經濟條件所致——如果沒有這個學術救濟會恐怕德國的學術也要一蹶不振了。

在一九二八年該會更改現在這個名字。更改名稱正是象徵德國情況之改善。這個幼孩是為應付急難而生，其生時正遭遇德國最艱苦的時代，但是現在長大了，已經超越過了他降生時所流行的一切困苦而且發展成為德國學術政策的主要份子。但是當我們賞識該會現在所達到到的這些成就的整個價值時，我們

千萬不要忘了牠產生時的境況。自牠成立以來，在行政方面雖有許多改變，但牠的創辦人在創辦牠時所立定的理想以及使牠日趨發展的一般政策均未更變。所以爲了對這整個情勢得一清楚觀念，我們必須暫時回顧一下，並且考慮考慮救濟會的創辦人所不得不去鬥爭的兩個大困難：第一，在戰後德國學術所遇到的艱難，第二，挽救國家，維持將來生計與將來之發展的責任交與誰去擔負的問題。在彼時那種艱難的情勢很是嚴重，而其中最明顯最急迫的是學術的，大學的，公共的圖書館。因爲在戰爭期間及大戰之後，這些圖書館不能從外國得到書籍與雜誌。尙不止此，由於資金的缺乏，凡德國的學術出版物之維持出版已到了危險境地。因爲通貨膨脹，出版品的本錢極重，並且由於同樣原因，私人訂戶也不繼續訂閱雜誌，訂款大減使原來的困難愈加困難。沒有可供發表文章的雜誌如何可使學術研究的結果爲人所知呢？因爲經濟崩潰以致國家貧弱，而科學本身，其向前之進步也因此而感到了危脅。因爲缺乏新的儀器，及缺少改進舊器具之必需的原料以致各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停頓了。試想，不僅得不到原料，並且當於地理學家，考古學家及藝術歷史家因爲有政治的阻礙及缺乏外國貨幣而不能出國遊歷時，則學術之研究又怎能够不被忽視？生物學家又如何能得到他的研究材料？由於戰爭之本身生出許多問題，不僅是與武器之科學有關係，並且與精神的各種學術，營養的生理學等等亦有關係。這種事實固屬真確，但是，路上所置的阻礙是如此之多，在一出發就令人覺到恐怕不能達到目的地，試問由戰爭所興起的那些問題又怎能進行去研究呢？人才是很充足的，工作的人們也在那準備着——青年亦然——但是缺乏工具。

恰在此時「救濟會」來救援了，並且其工作一直繼續到今日。甚至到後來雖然境況已比較穩定，但是像這類的會社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因爲，以先用在學者們所組織的學會及學術機關的款項，現在全移用在教育方面了，所以對於範圍較廣，野心較大的研究計劃，如果仍由政府機關負責，則政府的預算將要擔負過重。因此，學術，教育，國族文化部決定：各學術機關的研究費均由「協

進會」支取，不再為牠們設立固定的預算，這筆研究資金的支配權握在國立研究委員會之專家手中。他們不僅有權分配各機關的經常費，並且還負責去提議新的研究計劃及發起新的研究工作。其實以金錢去資助各機關所作之學術研究，不過為該協進會所作之許多活動中之一端耳。倘有其他無數問題均是由該會之合作而得到解決。蓋此類問題其性質較難，非藉助學術團體之合作則無解決之望。在近年來，在此諸問題之中，其最顯著的，厥為與重整軍備有關係的一些問題。真的，如果不是德國科學家努力幫助，虔誠合作，若干年來孜孜不息，則德國實不能作重整軍備之想。四年計劃也生出許多問題需待解決。雖然如此，雖然以上這些工作都是對於國家極為重要，然而該會所資助的各種科學探險隊仍得照舊工作未受阻礙。

受德國學術協進會資助的研究探險隊中，其曾得到舉世讚美的是魏根額 (Wegener) 的格凌蘭 (Grönland) 探險隊，此隊所得的科學結果恰好在此際全部公佈，及與都庫什 (Hindu-Kush) (譯者案：與都庫什山在阿富汗境內及境外) 探險隊，由於這次探險，獲得了數百種我們以先所不曾知道的野生的植物，這些野生植物都與我們現在用人力培養的植物屬於同種，因為此次的探險而得以看到牠們天然的形態，並且該探險隊也曾作了不少植物配種的試驗。除這兩隊之外，獲有令譽的還有大氣現象研究的旅行隊。此外，如卓越的人種學家高爾拉申博士 (Dr. Kohl-Larsen) 所研究出來的豐富的結果也決不可忽視。由於這個研究，才使我們對於史前的非洲殖民知識得到完全新的曙光。同時，德國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所舉辦的南極探險也同樣的不應忽視，因為由於這次探險，用雪橇及飛機竟發現了一百多萬平方杆的領土。這次探險成績甚多，其一便是對這塊土地得到一幅準確的地圖，這是以先所沒有的。並且還有許多別的發現。本文開首曾提到訪問門澤爾教授，他曾說：在此次戰爭之後，南極探險仍然要再舉行，這回的主要目的是去發現廣大的捕鯨場，這個對於德國的新捕鯨船隊是非常重要的。他又接着說：德國學術協進會所幫忙的不是僅僅用金錢去

資助探險隊，並且還供給工具以便研究者們將他的研究的結果公佈於世。現在且舉兩個例子來看，費希額 (Filchner) 曾預先得到了一筆印刷費，斯文赫定 (Sven Hedin) 曾得到一筆贈金俾他能夠完成他所設計的中亞細亞地圖冊。

訪問者曾詢問該會對於健康政策之興趣。當答此問題時，門澤爾教授宣稱：在最後三年，曾盡極大的努力訓練熱帶醫生以為將來之用。凡欲專研究此門的醫士，有許多人均到德國著名研究機關及海外的熱帶機關去受訓練。同時，這些受訓的醫士之中，有些人們已經得到機會親身到殖民地去獲得必需的經驗。還有，該會對於毒瘤之研究也曾施與很大的幫助。在這方面該會有最新的治療方法及器具，這個不僅外科醫生，醫生及生物學家受到益處，就是物理學家與技術家，也同樣的受到利益。在事實上，凡是研究機關如感到資金缺乏，德國學術協進會永遠去加以援助，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凡不能希望在較短期間得到結果的研究工作，牠也仍然肯與資助。因為凡是必須經過很長期間的試驗才能得到得結果的研究工作，私人的發起力是不够充分的。

像以上所說的這類長期試驗的工作，現在有一件，受該社的資助已有數年之久，就是：將現在的煤末機器再加改良，使牠達到內燃機器之理想形式，就如同燃燒原料——煤——一樣，並且不須有什麼大的變化就能將牠變成功能。現存的惟一尚未解決的困難是去發現一種充分耐久的工作材料。在原則上說，煤末機器是早已造成了，在實用上說，牠早就能工作很長的時間。但是必需的經久力仍待努力去完成。門澤爾會長表示他的信念說：有經久力的工作材料的問題將來也能夠解決。無論如何，祇要戰事一完，就要努力進行解決這個問題了。

另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今年所完成的德意志民間傳說，風俗，迷信等之地理圖冊。這件工作之所以能夠繼續不息而達成功，完全是德國學術協進會的力量。這本圖冊包括哈建茲 (Harmjanz) 及羅和 (Roehr) 兩位教授的論文，並附有一百多張地圖，對於德國的風俗，土語及地方特點表現無餘。這樣的工作對於歷史的研究有極大的幫助，尤其對於德國人民之遷移有關係的問題之

探討更有助益。自從將第一次發出的問題表開始編纂之時起，共用了十二年的時間這個工作才得完成。並且有二萬自願幫忙的人從全國各省貢獻他們的知識。從極小的村莊收集報告，這些報告所牽涉的問題都是些關於「乳酪」或「瓢蟲」這類名詞的地方名稱，或某地方所用的農車輪子上的輻確實有若干根！事實上，這本德國民俗圖所包含的與民俗有關係的材料，比以往所收集的多多。所花的費用達一百五十萬現在的德國馬克。如果沒有德國學術協進會的幫忙，像這樣的大規模的研究工作是不能去想的。這個機關產生在國難嚴重時期，使德國學術得免於滅亡，且使之發展成爲今日之狀態——使其成爲國家創造能力之一種工具——所以我們很可以說：因爲德國獲有這樣的機關，所以她比其餘世界各國佔先了一步。

德國的勞作服務^(一)

(German Labour Service)

艾戴爾 (Fritz Edel) 著

曹京實 譯

德國勞作服務想要完成的任務，第一個是將國內青年聯合在一起變成爲一個真正的共同生活的團體，沒有階級的區別。以勞作服務的夥伴精神排除階級間及信仰間的隔柵。這羣青年不受任何自私的野心或利益之支配。他們之中的每個人都是在設法去謀整個團體的幸福。對於他的勞力沒有絲毫的金錢報酬，他肩起鋤來去改良德國的土壤，於是國家的富源便因之而增加了。礦工之子，官吏之子，教授之子，農夫之子，肩並着肩一同工作，並且就這樣地才學得了族國 (Nation) 與社會主義這幾個字的實在義意。無論他們再回去作什麼樣的職業，他們都能清清楚楚地意識到一種真理：工作不僅僅是掙錢的工具，並且也是國民生活的道德基礎。由於勞作服務中的工作，全國青年都被引導着去切實地瞭解一種事實——凡工作即高貴。

勞作服務的第二個任務是使德國不必再由國外向國內入口食糧。當於將勞作服務所擬定的二十年工作程序完全實行之後，德國將要得到一個新的省分，這個省分是由土地的開墾而出現的。並且這一切都是要經過和平的努力而完成的。所以，將來德國一定能夠以本國的出產充充足足地使全體人民均得飽食。寬廣空曠的卑溼之荒地及沼澤之地均將用奮勉熱情之勞力將牠開墾。將來要修築許多水堤並且將要從海邊爭出來可耕種的土地。將要使農田立定基業，將要

(一) 譯自柏林海陸出版社(Terramare Office)所出單的行本。

把菲得利大王 (Friedrich der Grosse) 所說的話證實：「凡以先曾產生一個穀穗的地方，現在如果有人能產生兩個，則那個人所供獻給國家的功勞比一位元帥獲了一場大的勝仗還要大。」

德國勞作服務的歷史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運動的發展，這個運動在乍一開首就與「漠不關心」及「誤解」相鬥爭並將這兩個困難克服。向前進行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一種不可遏止的奮鬥力使中心思想成爲事實。第一個勞作營 (Labour Camp) 是由德意志青年運動 (German Youth Movement) 而起，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數年間的事。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在這個期間當於失業人數達到極點之時這個運動是擴大了，但是同時這個運動忽然中斷，而內部也分裂渙散了。僅僅在一九三三年以後，這個運動才漸漸地被領導着使牠受到統一的管理。由那時起，牠才在永久的基礎之上有系統地組織起來，並且被承認爲是國家的一種制度。

在大戰後不久，青年學生，工人和農人都個自建立自己的勞作營。這些勞作營是一種精神的具體表現與證明，這種精神催促着這些個青年爲他們自己找工作並且回到田間去開墾土地。然而當此之際，離開農田的人數依然有增無減，城市人口乃因此而增加並且同時失業的人數也加增了。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Party) 是一個採用青年運動的原則的政黨，並且在一九二八年時他們在國會動議引用普遍的勞作服務制度。但是，在彼時掌握政權的國會對此動議竟未順利地接受。雖然如此，這個運動依然前進不已。在一九三〇年希特勒 (Adolf Hitler) 與希爾 (Konstantin Hierl) 起草成一套明確的規則。這套規則就其關於目的與宗旨的基本大綱而論到今日仍然有效。希爾在彼時所負的責任是在國社黨之內組織勞作服務。在那個時候他寫道：「勞作服務所顯示的是一些事務，這些事務與以抵對失業爲目的及由一時之困難而生的暫時應付辦法不同，並且也比那個更爲偉大。強迫勞動服務的觀念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並且在強迫教育及全國國民服兵役之中也實行着這種

觀念。每個德國人必須爲其國家而工作，必須爲保衛其國家而戰鬥。強迫勞作服務必須變成爲一種責任，這個責任是在求德意志青年的光榮而以向國家服務表現之。其宗旨決不是向私人的企業供給賤價的勞力，並且牠決不可變成爲爲使工資水準降低而由國家實行的一種競爭的事業。由於強迫的勞作服務在國民政府指揮之下乃可以有一支工作的軍隊，這個軍隊將要實行一些偉大的公共工作去爲國家的經濟利益而服務及爲國家的文化及其他公共利益而服務。」

因爲遭遇到增加不已的失業問題，及因失業而生的道德的及社會的不幸情形，乃於一九三一年爲建立及推進志願勞作服務而頒佈一些法規。這種志願勞作服務是由政府來監督的。但是這些個法規在心目中並沒有任何清楚而明確的目的，並且尤其是牠們的目的並不在訓練青年從事於公民應盡的義務。政治的，宗派的及社會團體的和會社們都各有其自己的勞作營，這些勞作營的組織均以他們自己的原則爲標準。這個運動的政策與行政整個地缺乏統一。在那些個記名於志願勞作服務者之中有一部分人是在家中過夜僅僅當於白天在一起工作的時候才與他們的同伴相聚。另外一些情形是志願工作者生活與睡眠均在勞作營內。這個志願的勞作服務之管理及督率均操於德國勞工交換及失業保險所 (Reich Labour Exchang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Office) 之手。這個機關維持這些個勞作營的目的，是以牠們爲供給失業青年及那些有權利得到政府失業救濟金的人們的職業之一種暫時辦法。法律曾載明志願的勞作服務所擔任的僅是一些附屬工作。這條規定之意義是被解釋的很寬泛並且是各式各樣的。有一部分人主張沿着路邊修築腳踏車路和整理公園是與勞作服務法規所企望的目的相一致。另一派主張其工作應基於資本主義的原則，成件作工論件拿工錢。第三派主張以賤價的工資僱他們去替代那些罷工的工人。這個運動仍在發展中。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志願的勞作服務中記名的是六千八百十人；但是在十二個月之後數字竟陸到二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六人。

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內閣所採取的明確的政策使勞作服務得到統一的可能，

並且爲其將來的發展也立下了清清楚楚的路線。在這個志願的勞作服務的組織之內希爾曾建立許多宿營，其目的在訓練出一羣有領袖能力的專門人才。他按着有系統而又實用的方式組織成一個有效率的職員團體，並且由於他同這個職員團體的諸同事們的共同合作他乃能實行他的以強迫勞作服務爲基礎的第二步計劃。在一九三三年希爾被指定去組織強迫的勞作服務，並且爲了這個目的他在勞作部被任命爲“Staatssekretär”（即事務官之意一譯者）。在管理方面他遇到許多不一樣的團體，各有他們自己的條例，法律，規則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從這些不一致的團體中創立一個統一的組織。凡置身於勞作服務者均採用一律的制服。全德國劃分成三十個勞作服務區。於是勞作服務乃變爲國家的一種自治的制度。於一九三四年在女恩倍（Nürnberg）舉行國社黨會議時有五萬二千勞作服務員列隊而過，肩上之鐵鍬光炫射目，這種組織之新精神新姿態就這樣地爲大家所共見了。德國勞作服務的領袖希爾所做的這種有系統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所通過的法律將牠更加完備並受此法律之認可。由於這個法律強迫的勞作服務乃代替了志願運動。勞作服務法的第一段之文詞如下：——

「國家勞作服務乃係向德意志國家所盡的一種光榮之服務。全國青年無論男女兩性，均強制加入，藉國家勞作服務之工作以向國家效力。此種服務之功用爲灌注德意志青年一種團體自治，爲公不私之精神，及勞工神聖之正確觀念，並且尤其是一種對於手的勞力所應具的適宜的尊視。國家勞作服務所擔當的任務，是凡對整個社會謀福利的工作均由他們去推行。」

本着這種精神，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新服務員們之第一支隊乃起始入營，作勞作服務之期間達六個月之久。從志願制轉變到強迫制，實行的非常順利，絲毫未遇困難。

依現在所實行的條例來看，凡由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均要參加強制服務。服務的期限是六個月。由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參加勞作服務的人數平均是二十萬人。在一九三九年將要增加到三十萬人。對於女青年仍然實行

志願參加制，她們所擔當的工作均是與婦女相合適的。雖然如此，在一九三五年所立的法律也制定女子強迫服務制了，並且實施之計劃已經立定以便使法律在實際上能擴張到青年婦女。在一九三六年青年婦女參加勞作服務者其數達到一萬人。在一九三七年共總數達一萬五千人，並且在一九二八年預期可達到二萬五千人。在勞作領袖希爾指導下德國勞作服務指導部是勞作服務的主要指導機關。該機關分成八科：——

- (一) 服務科。(組織，註冊，外交事務部分等等。)
- (二) 人事處。(關於勞作服務領袖們的人事事項。)
- (三) 計劃處。(計劃，財政與技術事項。)
- (四) 行政與事務處。(預算，薪金，服裝，給養。)
- (五) 健康處。(健康與醫藥。)
- (六) 教育與訓練。(指導，遊戲與閒暇時間之利用。)
- (七) 司法行政。(品行不端，榮譽法庭等等。)
- (八) 新聞科。(新聞紙，電影，無線電。)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曾頒佈一道命令賦予德國勞工領袖全權處理關於勞作服務之一切問題。爲了這個目的在內政部之內爲他專設一特別機關。

如已經說過的，德國全國土已經被分成爲三十區作爲勞作服務組織之區域的基礎。區的大小不同，按其大小每區有四個到八個勞作服務團，每團包含五組到十組。在全德國所有的勞作服務都一律地是這樣組織成的。在一九三七年春共有一百九十二團，包含一千三百十組。每組組成一營，包括一百五十三個青年並且有時包括二百零二人，每營有一個廚役和一個職工。

這三十個勞作服務區的領導權直接地隸屬於德國勞作領袖權力之下。在他的監督與管理之下還有二十個地方的女青年勞作服務的領袖們，及勞作服務學校，及爲這個組織的高級位置訓練領袖的德國學校，及爲組的領袖，田場主人們，班長們所設的二十六個勞作服務學校，還有爲女青年所設的勞作服務學校，這些

學校包括一個全國學校和七個地方學校。

關於勞作服務青年的登記，分組，及到最後在春秋兩季解散等事項均由三十二個總登記機關及二百七十六個分機關負責辦理。

以先的志願勞作服務所必需的錢財用費是由國家公債及德國勞工交換及失業保險所而來。對每個志願服務者每天由國家供給一馬克七十分尼至兩個馬克作為伙食費用。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關於勞作服務的費用由國家擔負完全責任，在一年的預算中有兩萬萬馬克專為此目的而用。這個數目的四分之一是用在膳費上，每一人每天的膳費是八十五個分尼。另有四分之一作衣服費及零用錢，每一個人每天得到二十五分尼的零用錢。其餘的款項是用在住房，指導費，工具及遊戲設備，還有醫藥設備上。如果有什麼意外或疾病凡從事勞作服務者每個人都有權隨意用醫藥及住醫院。勞作服務的領袖們的薪金，一般行政的用費及為訓練行政官吏及服務領袖而設立的學校之用費均由這個基金支出。

勞作服務的組織是根據領袖原則。這個意義就是：每個領袖，凡居於一團或一組之首者，他個人對於委託他去照料的工作者之團體之身體的，精神的，心智的福利負有全責，並且對於工作者們的工作效率，訓練與教育也由他負責。

當於新入營的人們開始實際工作的時候，同時也是開始實行選擇那些將來能夠變成領袖的人們的時候。這個原則是：凡在勞作服務中肩着鐵鍬的人，每個青年都有作領袖的資格。在這兒用不着從家裏拿補助費。凡在小學畢業者在他們通過一個特別考試之後，也可以入為訓練領袖而設的學校作領袖的候補者。最要緊的資格是人格，效率並且實際上對現在政權之忠心。在勞作服務中的一名領袖是希望他在其行為方面及其生活之方法方面能為其小單位的團體作一模範。他的生活必須受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所鼓舞與指導。對他的責任他必須有銳利清楚的意識，要端正，並且他的道德生活必須要超過非難譴責。年紀青的領袖在判斷方面必須頭腦冷靜，並且在外表上也要有某些成熟的樣子，同時年齡較老的領袖其心腸必須年青，並且能夠與青年們摻揉在一塊為其侶伴。在

營中所有的日常生活上的瑣細的例事，為領袖者必須以同志及幫忙的精神行之。

依照新的法律，勞作服務中的領袖其事業多多少少與那些官吏及軍官們相平行；勞作服務中的固定職員都是政府中的正式的官吏。凡在勞作服務中被任用去作行政執行工作的人員們其情形也是如此。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頒佈的法律，對於這類的官吏們薪金之等級均加以規定，並且當於他們服務時間內如遇意外或生疾病，在照顧治療方面也均制定法規。這個法規並規定固定職員的離職條件，最低限度要服務滿十年之後方可有要求退休金之權利。

在勞作服務營中，平均工作日，其時間之利用如下：

| | |
|------------------|-------------|
| 6.00 (上午) | 起床喇叭。 |
| 6.05 至 6.15 | 體操。 |
| 6.20 至 7.15 | 漱洗，整理床褥，早餐。 |
| 7.20 | 列隊昇旗。 |
| 7.30 | 排隊出發工作。 |
| 7.45 至 10.00 | 工作。 |
| 10.00 至 10.30 | 晨餐。 |
| 10.30 至 2.00(下午) | 工作。 |
| 2.00 至 2.15 | 排隊回營。 |
| 2.30 至 3.20 | 午餐，自由時間。 |
| 3.30 至 5.00 | 遊戲。 |
| 5.10 至 6.00 | 公民責任之教導。 |
| 7.00 | 宣佈次日工作程序。 |
| 7.15 至 7.45 | 晚餐。 |
| 7.45 至 8.15 | 清理衣服，用具等等。 |
| 10.00 (下午) | 晚間點名喇叭，熄燈。 |

在一九三二年希爾 (Konstantin Hierl) 寫道「勞作服務必須保護我們的青

年去抵抗身體的道德的懈怠不端。年青的德國人將要從身體的鍛鍊，勤儉習慣的培養，秩序，準確，整潔，自治及服從之中得到對於生活很有價值的準備。勞作服務學校必須灌輸給青年們對國家盡義務及求榮譽之意識，並且使他們對於社會有一種共同負責之感覺，由於這個勞作服務學校乃能給我們國家的青年以必需的公民訓練。」

勞作服務營的日常生活及每天的正常工作都是依照着服從與夥伴的原則來處理，這種生活及工作之本身都是幫助着趨向上述之任務的完成。除此之外，關於公民的義務及責任另給了一些特殊訓練。在勞作營中的教育課程中不包括無用的知識。這主要的特點是這樣，在營中的共同生活幫助年青的勞工生力軍將國家看作的一個整體，與牠作實際的接觸。所講授的材料都是幫助青年去瞭解在全國人民生活中的一些主要轉變之點，並且使他們熟悉德意志歷史上一些偉大的人物。民俗學以及與國境及外交問題，經濟問題，與遺傳健康有關的特點等有連帶關係的問題——所有這些題材都由通俗講演來處理，這種講演可使普通的外行人對於主要的事情能夠容易明瞭。在營中的生活及工作的生活都成為與週圍的美景作密切接觸之媒介，這樣來，則愛家鄉及愛家鄉之自然風物之感乃被喚醒了。

利用工作之餘暇及星期日也足以達到這個同樣目的。音樂與民歌是被練習了，書也念了，鄉村的風俗習慣研究了，劇院與博物館參觀了。各式各樣的團體，像唱歌團，演說會，客串的戲劇演員，各種業餘嗜好或業餘的攝影家，當在貢獻娛樂之時所有這些人均彼此互相競賽。

耕地是一種很優美的身體運動。當於青年受到耕地的訓練及當於這種工作適當地實行出來，牠乃變成爲輔助及完成體育訓練的一重要因子。這樣的體操也發展人的品格，因為牠能促進人的果決的習慣，及自己作自己的主人，能訓練青年刻苦自己而準備着去幫助他人。在勞作服務期間所練習的體育運動也能幫助這些年青的工作者們去發達一種合作與服從的正確觀念。其重要的目標不在

創記錄而是每個工作團體的平的平均的良好的工作成績。這種有規律的操練之目的是在使工作者們的每個單位都能達到工作效率的一般水準，普通的外界的觀察者可以認可的水準。

希爾所完成的工作，及勞作服務的偉大目的，常常地爲德國元首希特勒公開地承認。他曾宣佈勞作服務是一個學校，全國人民都必須在其中走一遭。「通過這勞作服務，」他說，「我們要使每個德國青年以他雙手所做的工作對於國家的建設有所貢獻。我們特別地要使那些從事不做任何手工職業的德國人們必須去經驗經驗什麼叫作手工的勞力，因爲那樣他們才能瞭解在田地或在製造所和工場裏的那些同胞們的問題。很不幸的是許多的我們有智識的人們以爲他們對勞工們應取超越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要把牠永遠地取消。並且爲了代替這種優越感，我們要加强他們使他們有自信的感覺，當於他們意識到他們也能够去用身體的力量從事生產的工作時，則從這種意識之中自然而然地生出自信了。但是我們在此地的較遠的目的是在使各階級之間要發展互相的瞭解，並且這樣地做方能使人民社會中的協和的縛力更加强。我們要各種不同階級能達到互相的瞭解，於是在這種方式之下我們可以漸漸地爲真正的社會精神立下所有基礎中的最自然的基礎。」

勞作服務在經濟方面所佔的重要性從下列數字可以表現出來：——

(一) 由於凡爾塞條約，德國失掉——殖民地除外——百分之九點五人民及百分之十三點五領土。所失去的領土其出產量都是很高的。德國爲世界人口最密的國家之一，所以德國所失的土地要比人口所佔的部分較大。

(二)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每年德國進口食物平均達二十七萬萬五千萬馬克。向這些入口貨所來自的國家德國所能賣的出口貨僅僅達到以上總數的三分之一。

(三) 假如全國土地的耕種均按照系統的計劃去實行，則國家農作物品每年生產量的邊際很可能地能增加到值二十萬萬馬克。這樣來使德國差不多可以獨

立不必仰仗由外國市場輸入的食料了。

在一七六四年，當於普魯士是一個窮國的時候，菲得利大王說過：「國家的情形愈不好，改善牠的工作愈必需。」由於不斷的努力，他成就一種到現在仍然可以爲那個時代的精神作證明的拓殖工作。自那個時代以來德國從未作過重要的大規模的改良土壤計劃。其所以如此之故，並不是因爲國家在這方面已無須改良，而是國家將注意力分散了並且轉向了別的目的，特別是轉向到在十九世紀所發達的工業化。

所以我們今日所遭遇的是應當由菲得利大王所停止之處去起始。在做這個工作時，在我們跟前所應當時時注視的目的是供濟新的耕地，因爲祇有在開墾的田地上安置農人的家庭則新開墾的土地才能完全利用。菲得利大王在他那個時代所實行的偉大的屯墾工作是一種國內拓殖，其目的是供給他的兵士一些田地並且將人民遷移到那在彼時尚是人口稀少的地方——將荒地變成沃田，這個工作直到今日尚停留在恰恰菲得利時代之拓殖工作所中止的地方。

目前的改良土壤的任務，其範圍遠過於從菲得利大王以來直至今日所曾經做過的一切關於土地改良之工作。依照德國農業地產處所作的估計有二千萬英畝那樣多的地方需要排除積水。這個面積等於現在德國所耕耘的農田總數的三分之一。大約有五百萬英畝尚未耕種的荒地，及約有三百萬英畝廢而未用的地其中大概有一半可以變成爲可用之田地。此外尚有乾燥不毛之地一千二百五十萬英畝需要灌溉。另有一千二百五十萬英畝，特別是在德國的西部與南部，這些地分割的很不好將其經濟的價值減少很多。這種地應當重新分配，本着農業經濟的合理的原則把牠分成合於耕種的單位。還有二百五十萬英畝用保護的方法使牠不受水災的侵入便可以加入在可以開墾的土地之內，另外還可在沿海區域用築堤的方法得到一百二十五萬英畝土地。

這個經濟事業是勞作服務所要去實行主要部分，其主要性只要我們想一想當前的事實便可更清清楚楚地瞭然了，這個事實就是：僅僅地由於開墾荒地與廢地

就能使現在德國已耕種的田地之外更增加十分之一，——如果對於水利講求適當的管理，則現在所耕種的田地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其生產量可增加百分之二十，如果按照有系統的經濟計劃去將田地重新分配，則此同一面積的六分之一土地其出產品的價值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所以，把所有這些放在一起，因為土地開墾及土地改良之經營，德國全國的農產物可以增加六分之一。

這種不能推諉的國內拓殖任務尚要需許多年方可為世人所認識。所以在一九三五年頒佈的勞作服務法用幾個簡單的字承認其目的並聲言道：「德國勞作服務所作的是一些謀公共福利的工作。」因此德國青年所出發去工作的，不是為私人的資本之目標而服務，而是為整個的國家社會及為將來的子孫去改善生活的環境。

為了使勞作服務以有系統的方法去產生最好的可能的結果，德國的勞作領袖曾經建立一個特別分部以擬定工作計劃。這個分部將每個單個的計劃均詳細研究並且加以安排使其與一般的工作適合。將許多計劃互相比較，將已經得到的結果加以研究，並且在現在已經將此後許幾年內及數十年內由勞作服務所要推行的一般的工作計劃早已立定了。

下面是由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勞作服務所表現的工作結果：——

由於建築堤防及調整水道大約有三十萬英畝卑濕之地及為海水所浸之地已經開墾了並且也得以不受水災之侵擾。並且田禾及農田之本身都得到安全的保護，不再受海潮或內地河流氾濫之損害了。

約有七十五萬英畝的水濕之田曾經因為修整各河的河床及實行一種田內排水工作而改良了。於是已往那些很不宜於耕種的土地現在都立刻將其肥沃性增進了，或者最低限度由於這種改變已為此後將這些田地作更好的農業利用建下必需的預基礎了。

約有六萬英畝地因為掘出樹木之根等等及劃分其地為可耕種的單位而成為可以耕植的田地了。

約有十萬英畝地是由小塊田地集合來的。按照習慣，父母的產業均由子女均分故田產多分裂成小塊，現在按着能使田地之耕種得到有利的結果之方式把這些小塊田地連衣一起重新分配。爲了做成這樣的能獲利的田地，新道路開闢了，如有需要排水的地方排水工作實行了，這樣地做乃可以能够集中耕耘之力量。

大約有四十萬畝地因爲鄉間有了通行的大路，農人可更容易與牠近，因而工作的本錢便可省下好多。

與開墾工作及改良農田的工作一同作的還有其他工作也是勞作服務推行的：植樹工作，培養植物，園圃工作，開闢林間道路以備運輸木料，並且還幫助建築房屋及農舍以爲屯墾運動之用，及在屯墾區內建造道路等等。

由於這種工作而增加的農產物，其價值每年已經達到五千萬馬克，這個數目與有薩爾（Saar）面積一般大小的地方所出的全部農產物的價值相等。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全工作的百分之七十是做的開墾及改良土地的工作，這全是爲農業而作，百分之十五是植樹工作，其餘的百分之十五是：爲建立屯墾而作的預備工作，及森林失火，堤防潰決和其他災患之幫忙救助工作。（譯者案：在此段之後原文曾有一表，說明在一九三六年勞作服務所做的工作及勞作服務營分工的情形，譯者以其全爲呆板之事實，無需介紹，故刪去。）

下面的例子是由陶倫斯（Hermann Tholens）的報告而來，陶氏是勞作服務處計劃部部長。這個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正在實行中的勞作服務在經濟中所佔的重要位置之細目。

勞作服務組每組包含一百五十人。在東普魯士省之極北部，在整個拉比奧及尼得甕（Labiau and Niederung）區域有七組人曾在那工作。

這塊地方的主要部分是屬於美美爾（Memel）窪地。牠所包括的都是很低窪的地方，渺茫空曠，其低度幾乎在海面之下二尺並且有密網般的水渠縱橫着。在平常的時候地面下的水的水平恰恰地就在土地的表面下層。一旦有了壞天氣，或者當於風將水吹回水渠，這塊地方便成大片水災。這些水渠的拐灣抹角極

多，每當冬季冰雪融化則為冰所擠滿，後來之水不得流過，結果乃溢出渠岸。

誠然在這個地方有一大部分，其當地農人在過去某些時候他們自己曾組織了一些排水合作會社，不過他們所建築的排水系統已陷於失於修理。在這個地方我們還遇到許多地產與農田常受水災與由地底泛上來的水所侵擾，而對這個竟無絲毫保護的辦法。在這居住的農人年深日久都伸張到窪地內部去了。他們盡力之所能為去開墾土地，但他們並不負責去抵防水災之險以保護他們的田地及家室之安全。當地心的水漲了起來時僅僅那蔓延的草才能够生長並且常常地就是這種稀少的收穫之物在夏季中伏大雨之後也被泛濫的水所損毀了。在許多地方泛濫的水在冬季竟侵入了農家。這窪地的一部分是澤濕之地完全未被種植。

有三個勞作服務組在這工作，每個所佔的區域其面積大約可達二千五百英畝至七千畝。他們在此地作工的目的不僅是建立堤防和實行排水工作並且也用他們去修理及加強已往所存在的堤或者重新另築那已經失修的堤。他們的任務是：建築水堤及灌溉水渠並耕種那早已開闢及有人居住的土地。以先這部分土地常是週期地受水災的泛濫，並且常常地此地之居民及其家屬們逃到他們的屋頂去避難。這塊新開墾的田地劃歸為三百五十個屯住者所有，再將這些人們原來居住的田地從新分派給在他們以後的人們。用這種方法每個屯墾者的家庭將來都能得到充足的耕田以應付其將來之需要，

由下段可以估計出這種工作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價值：

這全部的費用大約為一百五十萬馬克。直接由這個工作所增加的農產物據官方的估價其數約為二十五萬馬克。這個數字相當於一千八百畝農田每年所生的平均生產量。所以在這個投資上面國家所得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七。由這個事業所生出來的社會福利可由一種事實來代表，即以先那三百五十家的屯墾者其生活情形極為愁慘卑苦，而現在呢他們却安安穩穩的在田地之上度着豐衣足食的生活，並且受到妥切的保護再不受那循環不已的水災所侵擾了。

女青年們勞作服務之發源差不多與男青年的勞作服務是兩件事。在一九三

三年以前有某些少女團體曾經將她們自己連合在一起，其目的在作一些農業及植樹工作與各式各樣的農工及在勞作營中的家政工作。但是這裏有一個危險，即這種勞作服務到後來將要變成爲失業者的保護所再無其他功用，或者僅僅變成爲在帳幕之中各宗派各政黨教訓青年的受人歡迎的學校而已。

勞作服務必須也在社會的精神及同志的精神之下受教育，那樣做她們才能够瞭解工作的高尚的道德的意義。德國勞作服務早就常常說過必須設法使男女勞作服務成爲一致的及同一性質與組織的制度。

在一六三六年四月一日將以先的那個自治的組織即大家所知的「婦女勞作服務」歸併在「德國勞作服務」並且同時與「德國勞工交換及失業保險所」相分開，後一機關以先曾管理婦女勞作服務的財政。青年婦女勞作服務的行政是由德國勞作服務指導部由十三個支部來執行。

女青年勞作服務仍然以志願參加爲基礎；但是使牠變成爲強迫的準備工作早已在進行了。在服務的少女們其年齡是由十七歲到二十五歲。在一九三七年春有三百二十一營已成爲事實，平均是每營包括四十個少女，領袖在內。在一九三七年之夏，其數目增加到四百八十營，有一萬五千少女在工作，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將要造成六百個營供二萬五千少女之用。

男的女的勞作服務之基本原則及教育之使命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所以對於青年婦女所分派的工作都是適合她們女子的性格的。這些少女們自願地服務六個月，她們所擔負的主要的責任與任務是幫助那些較貧窮的家庭中的工作過度的母親們以使她們的負擔減輕。在鄉村的地方及在貧苦不幸的農業區域這些少女們幫助那些婦女們在家庭中及在田地中工作，或者她們幫忙照顧小孩及看護病人。在工業區的附近也建立了一些勞作營以便能够對在工廠中作工的妻子與母親有所幫助。與這些勞作營相連繫的幼稚園對於那些尙未達到入學校年齡的小孩及在白天的育兒室中應當加以照顧的小孩子們更證明出有特殊的價值。

這些少女們生活在她們自己的營中。她們從事工作是每天由六個鐘點到七

個鐘點。在下午她們作體操及學習關於公民責任的功課。男青年們的閑暇時間是本着使每個團員發展社會精神及增進他們一般的知識之目標而利用之。少女的勞作營比男子的營較小，所以，對於將少女的生活與婦女的天性形成一片這方面可以更能多給一些切身的注意。

每一營均由一個營領袖及三個助手負責。每營分成三組，每組由一年歲較長的少女負責。一個營領袖所負的責任與任何其他婦女職業所擔負的是一樣並且在許多方面與一位教師之責任相似。這位領袖必需在道德的品行方面及行為方面以身作則表出是一個忠實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她必須還要有一副關於擠牛乳製乳餅乳酪及家事管理，以及對於訓練交際之才能的無所不知的知識。凡渴望要當勞作營領袖的人們必須首先在勞作營之中費上一年光陰，然後再離營二年，在此期間她們要受實地訓練並且必須受完。這種實地訓練或是由一個婦女鄉村專門學校去訓練或是在醫院中當看護。凡受過以下實地訓練的人們如：幼稚園的教師們，青年運動（Youth Movement）的領袖們，醫院中的或小孩的看護們，管家婦們或農業專門學校的教師們，也都可以被認為有謀求勞作營的領袖地位的資格。這位想在勞作服務中謀一領袖地位的候選者在她實地受訓練的期間她要與和她合宜的婦女勞作機關保持連絡。但是此後她必須在德國勞作服務附設的專為婦女領袖的分區學校再受六個月的訓練。

雖然在勞作服務中對於婦女活動所發生影響的問題與男子服務有關係之問題不相同，但是男子與女子在他們的營中所做的工作對國家之價值實不可計算。這個學校可以使這一代的青年由於他們所享受的密切的合作而將個人的仇恨及不協和之點均將要免除了。這種共同的工作能夠幫助在這些青年之間帶來一種互相瞭解的精神。這樣來則國家的政治訓練方能引導着去遵循正路而做。

這種訓練使我們的青年人向人民向全族及國家而盡義務，這是勞作服務的最大目標。附在勞作服務下面的觀念最近也曾深深地灌輸到別的國家。但是鼓舞這種勞作運動及實施的形式的原則則因那些國家現行的情形而改變。上千上

萬的外國參觀的人曾到我們的勞作營去參觀並且與我們的以鐵鍬爲旗幟的青年們相認識。這些參觀者曾看到這種實際方法的實例，用這種方法，我們這一代青年人曾將那個威脅我們要將我們整個文化生活中斷的罅隙給銜接在一起了。

『自大戰以來，』希爾孫 (Norman Hillson) 在他的「我談談德意志」 (I speak of Germany) 一書中說道，『我們似乎發生出來一種觀念以爲紀律永遠不能成爲自由的真實的僕人。大概是由於這個原因，德國的強迫勞作服務營曾受到一些批評家們的刻酷的詛責，而這些批評家們却從未費點工夫去看看勞作營工作的情形。我曾聽見有人說勞作營形同奴隸場：牠們是一些不能提說的罪惡地：在帶刺鈎的鐵絲網當中的圍地之上，竭精盡慮地將德意志青年的人格給褫奪了，以使他能夠成爲編入正式軍隊的適宜的材料。

這一類的批評過於文不對題。強迫勞作服務現在已經被認爲是德意志青年生活之一部分。由於六個月的辛苦工作——苦工並不一定是奴隸——十九歲的孩子變成強壯堅實——在身體方面已經裝備妥切，足以應付生命之前途中那些一天比一天增多的困難。』(二)

毛提斯通爵士 (Lord Mottistone) 在德國發行一書名爲：Auf der Suche nach der Wahrheit (對於真理之探索) 他在這部書中寫道：

『這些規則與英國公共學校營 (Public schools camps) 所列舉的規則十分相同。其中有許多條與所有的童子軍營中所鐫刻的是一樣的，特別是關於清潔與健康那些條。

將所有各等各級的人們集在一起共同服務六個月或者更多，這種特殊見解的奮發性是太大了，全體人民不論老幼都受牠的感染了。他們實在感覺到這是一個偉大的試驗，一個十分新穎的東西——不是一個五年計劃，而是一個五百年計劃。這個制度並不是以沒收已往的積蓄爲基礎，而是一種計劃牠保證每個家庭依然保存其曾經有的東西並且還鼓勵牠們用很光明的方法以增加其財富。所有

(二) Norman Hillson-I speak of Germany, Routledge, London 1937。

的小孩們一達成熟年齡便將要經驗到這一段生活，在爲國服務之時完全平等的生
活。

這個實在是一個極端特殊的試驗。 任何人如未曾親眼看過牠及研究過
牠，像我在德國許多不同地方所曾經作的那樣，便不能切實感到這個運動的重
要。』(三)

(三) Lord Mottistone-Auf der Suche nach der Wahrhei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und Berlin 1937。

評“分類字彙”

顧 華

Franz Dornseiff: Der Deutsche Wortschatz nach Sachgruppen

道恩塞著，一九四〇年第二版，柏林 Walter de Gruyter & Co.

出版，共五五六頁，平裝一冊。

前年曾譯過道恩塞所著的論文一篇，登在『研究與進步』第一卷第三期上，就是論他所著的這部『分類字彙』的；當時我尙未見過原書，最近學會已將原書由德國購來，現在再把看過以後所見，略述於後。

這樣體裁的分類字彙是創於英國人羅傑特(Peter Mark Roget)的。羅傑特在一八〇五年他還在做學童的時候就開始用一個小冊子，『把世界和英文寫在裏面』(hat als Boy im Jahre 1805 ein Heft angefangen, um die Welt und die englische Sprache hineinzuschreiben)。這就是他的分類字彙的基礎；但是因為職務繁忙，一直沒有能把牠完成。後來到一八五二年，那時候他已經把英國皇家學會秘書和物理學教授的職務辭去退休了，纔把原編的分類表和字彙整理擴充，編成他的『英語分類廣字彙』(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classified and arranged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to assist in literary composition)，出版問世。據他在引言裏所說，他編此書的用意是在『對英文補起一種在任何語言裏面尙未經補起的缺陷；即是把牠(英文)所包含的字和特有的成語蒐集在一起，但不像在普通字典裏按照字母的順序排列，而是按照牠們所表示的意思排列。一個普通字典的目的祇在解釋字的意義，牠所要解答的問題可以說是這樣的：——字已經有了，去尋找牠的命義或是牠所要傳達的意思。本書的用意是正和這個相反的：即是——意思已經有了，去尋找最適合於表示這個意思的字。為欲達到這個目的，一切的字和成語在本書裏是沒有按照牠們的發音或寫法，而是按照牠們的命義排列了。』羅傑特的辦法是把

一切的『意思』分爲六大類（1.抽象關係 Abstract Relations，2.空間 Space，3.物質 Matter，4.理智 Intellect，5.志願 Volition，6.情感 Affections），每類之下又分二至八小類，共有一千個細目。法文和匈牙利文也有按照他的分類表編的字典。德文有一種，也是完全按照他的體裁編的（Schlessing-Wehrle, Deutscher Wortschatz, 原名 Der passende Ausdruck）。

德文中最早的分類字彙是珊德斯（Daniel Sanders）的一八七三至七七年在漢堡出版的“Deutscher Wortschatz, geordnet nach Begriffen zur leichten Auffindung und Auswahl des passenden Ausdrucks”。此書的編制和上面所說的 Schlessing-Wehrle 的書不同，不是用的羅傑特的分類法，但是由他的序裏看來，也是以羅傑特的書爲出發點的，那時羅傑特的書已出到了三十餘版。他所用的分類法是自定的，他把羅傑特的一千個細目歸納成六百八十七個。

德文中較新的一種分類字彙就是道恩塞的這部『Der Deutsche Wortschatz nach Sachgruppen』。他編纂此書的時候當然也參考了羅傑特和珊德斯的書，但是他所用的分類法確是自己經過長時期的研究定出的，和前面兩人所定的頗有不同之處。他的分類法是把所有的字分爲二十大類（此處可參看『研究與進步』第一卷第三期），又各分十二至一百二十一小類。作者從事於此書的編纂前後不下二十年，參考書籍達千餘種，可以說是精心之作；所以此書也是所有研究德國語文的人，尤其是時常用德文寫作的人，所應人手一篇的。

這種『分類字彙』的用途，除了可供研究德文者的參考以外，對於寫作或翻譯往往能有很大的幫助，因爲就是在日常說話的時候，也時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個字就在嘴邊』（das “Wort auf der Zunge”）而一時想不起來，這當然能藉『分類字彙』的幫助找到。詩人魏蘭（Wieland）曾經有一次因爲想找一個適當的字，竟耽擱了兩天半之久，這種例子當然是很多的。不過這種字彙外國人來應用的時候也有牠的危險，因爲這裏在每個『意思』或『觀念』之下排列了許多意義極相近，相差甚微的字，如果不能把這些微細的差別分辨得很清楚就來選用

這些字，其結果是難免錯誤的。

前面已經說過，著者在編本書的時候參考過許多種其他的書，其中各種文字的書均有，關於中文的也有四種，這些書名也都經著者舉出，這個詳細的參考書目，對於語學有興趣的人應當是很有價值的。

此外還有可以附帶提出的一點，就是本書在第七類植物之下列舉了許多各科植物的俗名，很可供植物學家的參考。

評“明清畫家印鑑”(一)

羅 越 (Max Loehr) (二) 評

胡 雋 吟 譯

Maler-und Sammler-Stempel aus der Ming- und Ch'ing-Zeit.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Victoria Contag und Wang
Chi-ch'üan.

孔 達 王季銓合編

民國二十九年，長沙商務印書館發行。洋裝一冊，六三一頁。國幣三十元。

德人孔達博士(Dr. Victoria Contag)曾將關於中國繪畫史與繪畫方法的兩部中國著作譯成德文。這兩部著作都是很重要的，一是畫其昌的畫禪室隨筆及莫是龍的畫說，一是芥子園畫傳中的人物部。因為有這兩種翻譯，她的盛名乃得聞於那些愛好中國藝術者及研究中國藝術者們之間了。於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間她曾參與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學術審查會，所以她得有一特殊的機會去接近中國的古畫，並得作仔細的觀摩。從那個時候起，她同着中國的專家們一齊去研究昔日皇室所收集的古畫之真贋。因此她對於如何研究中國之印章的學問乃得窺其門徑。她相信印章學對於考核古畫之真贋極有幫助，所以她想：如果將無疑問的印章之真跡收集在一處，將牠出版，一定是很有用的。因此她乃與王

(一) 譯者註：本文係譯自評者特為本雜誌所撰之文

(二) 譯者註：評者係德明興民族學博物院東方部主任兼中德學會研究員，為青年漢學家之一，請參看中德學誌第三卷第一期第九十頁。

季銓先生合作，去實現這件工作。王先生是一位畫家兼收藏家，也是故宮博物院書畫審查會中研究畫的專家之一。恰好他也有意想將繪畫與字畫上的印章照下像來，再系統的收集在一處。孔王二人旨趣相同，乃起始合作。這部著作乃於友好的空氣中完成了。他們承認在印章上之難認字體的闡解方面，王福庵先生曾給他們極可寶貴的幫助。在其他一般的方面，葉遐庵先生和吳湖帆先生也給了極有價值的幫忙。並且葉吳二位每人還給該書寫了一篇序文。

這部書共包括六千多幅印章的像片，在這些像片之前有二位著者自己所寫的弁言和凡例介紹，此後還有孔達博士寫的幾頁關於刻印者的技術及印章格式的文字。這些印章都是從印章的真跡照下像來，並用紅色印刷出來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承認這種複印的顏色和排列兩方面都不能和中國印章書上的那樣可愛的用手蓋的印章相比並。固然因為實際上的原因，不得不節省篇幅，不能隨意排列，可是該書上的印章所選用的淺黃紅色是必需的嗎？那種顏色和中國印章上美麗的硃砂紅或美麗的珊瑚紅是迥不相同的。一位讀者如果對於這些事情（即指印色而言——譯者）知道的不多，而且假若他又不能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對這本書內所供給的東西早已都很熟悉，那麼他將要把著者對於印章所述及的，就認為是藝術品了。這點不滿意處想著者也能見到，竊想著者也是不喜歡將完美的東西表現的竟不完美的。不過他們並非本着美學立場來處理這個題材，所以本書之用處並不因為技術之缺點而有所減色。

這本書主要目的是：將印章的可靠的標本從原作品上用攝影照下來，收集在一起，並且用準確的照像印刷將牠們複印下來。牠們排列的次序如下：

- （一）主要部分是由三百四十個明清的畫家之印鑑組成（由第一頁到第五一二頁），平均每個名字下大約有十二個印章。
- （二）宋元時期二十三位畫家印鑑之附錄（由五一三頁到五二八頁）。
- （三）明清時期收藏家印鑑之目錄，載入本書中的有六十五人，各位收藏家的印鑑都被登出來，其中最多的一位有一百九十五個（第五二九頁到六三〇

頁)，即清高宗的。

在這些章節內，印章之排列完全以「姓」的筆畫之簡繁為先後，還登載些短的傳記史料，如：畫家的「字」「號」；籍貫；時代；畫科；著述；和些雜記等。這種史料雖然簡短，但是，因為有牠才能使這本書——在牠原來的目的之外——又可當作極有用的參考書用。並且更可取的是姓名索引及字號索引都按着字母之先後排列，有一索即得之便。這些個印章都是按照牠們原來形體之大小印出來的，是接連的排印下來的。每個人的印章下面都印着正楷字及歐文羅馬拼音字，其字義與印章上的是一樣的。每個印章從什麼畫上或畫卷上取下來的，那畫或畫卷的名稱及該畫現在的私人或公共機關之保有者的姓名也都印在該楷字的後面。凡畫家在畫上記有年月，均用現行之西曆標出來。所有這些都是用中德兩國文字印刷的。

本書不十分完全，這是必然的。因為，不是不能得到的畫家或另外些人的印章竟付缺如，未能登錄，這或者是環境不允許著者去得到他們的像片所致。那些畫家小傳也像是從現存的字典或參考書中抄用來的，只要看過一眼之後，就可判斷那一點應當補充，那一點應當改正，在細節上還有些地方不甚正確。

總之，這本書對於學術研究上之價值是：牠將一大堆材料用相當的系統表現出來。如果沒有這本書，我們也許不會如此容易的得到牠們，或者甚至於簡直就得不到這些材料。牠在收藏家及研究者的圖書室中是將要佔一席地位的。同時，對於知道如何利用科學成績，以使他們去作令人討厭之工業的現代的贗造者們，也增加了一份有力的武器。

評“德國詩中所表現的中國”^(一)

霍福民 (Alfred Hoffmann)^(二) 評

胡雋吟譯

E. H. von Tscharnner: 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常安爾著，一九三九年，明興 Verlag Ernst Reinhardt 出版，共一二六頁，平裝一冊定價馬克四元八角，精裝一冊定價馬克六元五角。

本書是瑞士漢學家常安爾氏(E. H. von Tscharnner)的博士論文的增廣本。常氏曾在德國從事漢學研究，並且爲了對中國文化生活獲有直接的透視又來到中國住有多年。關於中德文化的關係雖然有很多書籍和文章論述到，但是具有批評和學術態度的，却寥寥無幾。著者在本書所作的是一種歷史的研究，研究的範圍是由最早時期（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數十年間——就是直到歌德生活之最末幾年——在德國文學中所表現的中國和對中國事物之描寫。常氏在此部著作中係依據三個觀點，第一：在德國文學中中國是怎樣的被表現出來，第二：與德國十分隔膜的那塊中國天地中，最引起德國的作家和詩人注意的是些什麼事物呢？是國家？是人民？是他們的舉止？是他們的文化？是他們的精神生活？第

(一)譯者註：本文譯自評者特爲本雜誌所撰之文。

(二)譯者註：評者係中德學會研究員，爲德國青年漢學家之一，請參看中德學誌三卷一期八五頁至八六頁。

三：德國的詩人們是如何的把這些中國味的東西利用或運用於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呢？當然，對這三個問題答案是不能一致的。並且很有趣味的是：從這些作品裏可以看出來各個作家是如何的按照他們各時代的特別趨向及他們個人的特別趣味去表現中國。他們所表現的中國自然不能是一個模樣的。爲了使這全部的發展更能給人一個較準確而清楚的瞭解，著者不僅從德國小說與詩中去提取他所要的材料，並且還研究和利用哲學和人種學的文章，及一些曾在中國旅行過的人們之有價值的報告與描寫。著者指示出來：在一起首，那就是說在十四、十五及十六世紀，德國所得的都是一些間接的智識，大部是從意大利，葡萄牙和其他外國作品中翻譯來的，並且首先受到中國影響的是德國哲學的，國家的和宗教的思想。德國的詩祇是在十七世紀的後半葉才受到較強的影響。因爲此時德國自己已有較豐富的原料，不必再借重翻譯別國間接材料了。在十八世紀時，中國的東西在德國已普遍的流行。有許多當時的文件都有這種記載，現在在德國各地都可見到。本書的結尾是一篇德國偉大的古典派詩人及他們與中國之關係的研究，並且指示出來，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是如何的熟知中國詩詞的思想與感情，是如何的用他自己的方法首創出來一種「世界文學」的觀念，並以卓越的方法把「東方」「西方」溶化於他的詩的創作之中。在這些情形之下，這本書乃成爲一篇真實的影象足以表現出德國人對中國事物及中國的智識的歷史了。並且對中國讀者更重要的是：該書同時也反映出來與中國同時代的那幾世紀間德國人生活的整個的文化背景。再加這本書描寫生動，及從著者所讀過的德國老著作中取出很多原文及繪畫置於此書中，所以不僅極能吸引和啓迪德國讀者們，並且特別對中國研究德國文化生活和歷史的人亦有極大之趣味和幫助。

德國學術消息

一：萊比錫大學退職教授名哲學家杜里舒 (Hans Driesch) 於四月十七日逝世，享年七十三歲。杜氏為在國外最有名德國學者之一，其哲學與同時其他哲學家相同，多係以自然科學為出發點，而後尋求哲學上之究竟。杜氏早年在弗萊堡，明興，耶拿等地研究生物學，後在意國拿坡利地方動物學研究所 (Zoologische Station in Neapel) 任研究家以各種生物學實驗聞名於世。氏早年即曾數度到亞洲旅行，後復數度被聘在國外講學，且曾來中國，有講演集等譯為華文出版。

二：蒙斯特 (Münster) 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薛訥 (Hermann Schöno) 在柏林罹疾未久，即行逝世。薛訥教授以其對於希臘最古代醫藥之研究最為知名。

三：以編輯希臘詩人荷馬 (Homer) 及羅馬詩人維吉爾 (Virgil) 詩集著名之考古學家及文學史家特蘭德倫堡 (Adolf Trendelenburg) 教授以九十六歲之高齡死於柏林。

四：法蘭德人 (Flamen) 於四月間在比利時首見“初本浮世德” (Urfanast) 之公演，此事之所以注意者即“初本浮世德”由一法蘭德斯人譯為荷蘭文尙屬創見，此次公演，亦為首次也。

五：瓦賀勒 (Ernst Wachler) 在二月間慶其七十誕辰，氏為當代提倡赫德 (Herder) 所倡“家鄉思想” (Heimatgedanken) 之一人，曾於一九〇三年創辦德國第一所露天劇院。

六：醫師兼著作家翁額爾 (Hellmuth Unger) 於本年二月間滿五十歲。其所著小說“考贊” (Robert Koch) 已售至十萬冊以上，並經排為電影，由詹寧士 (Emil Jannings) 主演。（請參看本期會務報告）

七：以主演“考贊”及其他影片久已知名之德國國家藝人 (Staatsschauspieler) 詹寧士 近經德國宣傳部長歌柏斯 (Dr. Goebbels) 贈以“德國電影榮譽指環” (Ehrenring des deutschen Films)，以表彰其演“克魯格” (Ohm Krüger) 一片之功績，此項指環嗣後並將贈與對德國電影藝術有特殊功勳之人。按“克魯格”一片之內容係描寫南非洲布爾人 (Buren) 在英人治下之生活。

八：名種族研究家袁特爾 (Hans F. K. Günther) 近亦慶其五十誕辰。其著作行銷總數已達四十五萬冊以上。

九：散德柏格教授 (Adolf Sandberger) 從事於古音樂家海頓 (Haydn) 之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結果發見前人未知之作品甚夥，交響曲竟達十種之多。此項作品近在維也納公演。

十：德國島嶼印書局 (Inselverlag) 現編德國詩文選一種，書名為“Das Buch deutscher Dichtung”，係將德文作品中之最有價值者，加以審慎選擇而編成，全書分六卷，已出二卷。

十一： 著作家及戲劇家秦 (Adalbert Alexander Zinn) 以六十一歲在史圖加特 (Stuttgart) 逝世。 秦於一八八〇年三月十八日生於科堡 (Koburg)，曾在漢堡服官多年。 除小說外，秦曾著有劇本若干種，為作品最常被上演作家之一。

十二： 本年四月初考古學家在柏林開會，由主要考古學家分別講演，由此等講演中可見時至今日希臘羅馬於德國精神文化尚有甚大影響也。

十三： 德騷 (Dessau) 血清研究所 (Serum-Institut) 近出有一種確實有效之百日咳注射劑，其中並附加一種脾臟製劑，因據現代科學研究之結果，脾臟往往有預防傳染之效用也。

十四： 波森地方新成立德國國立大學一所。 此事亦可為德國在戰時文化學術工作仍照常進行之證明。

十五： 德國東部工作研究所 (Institut für deutsche Ostarbeit) 成立一週年時由行政長官佛朗克部長 (Reichsminister Dr. Frank) 在該所設立哥白尼獎金 (Nikolaus-Copernikus-Preis) 一種，金額為每年二萬五千馬克，其目的在促進對於德國東部各種問題及其歷史之研究。

十六： 籌備一年之科拉考國立圖書館 (Staatsbibliothek in Krakau) 現已開幕，供衆閱覽。 該館藏書總數已達一百五十萬冊以上，其中大多為研究德國東部之書籍。

會 務 報 告

一 編譯新籍 本期內開始翻譯之書計有兩種，一爲杜克海 (Graf Dürckheim) 所著之論文三篇：德國精神與西方精神 (Der deutsche Geist und der westliche Geist)、威權與自由 (Autorität und Freiheit)、國社主義意義下的文化和文化政治 (Kultur und Kultur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inn.) 已由本會會員關琪桐先生譯出擬共刊特刊一冊。其他一種爲耶格爾 (Werner Jaeger) 所著之 Paideia，現由本會會員程宗翰先生著手翻譯，全書共約二十餘萬字，約一年內可以譯畢，書名暫定爲“範育”。

二 新增圖書 本期內新增書籍除普通書報雜誌外，有較要者一種，爲普魯士學術研究院之報告論文集 (Sitzungsberichte und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此項刊物在德國學術界佔有極重要地位，最近該院已將自一九〇〇年起至最近之全份報告及論文集寄贈本會。

三 論文比賽 本會本年度亦按照上年成例舉辦論文比賽，惟獎金額數稍有變更，本屆暫定獎五十馬克者一名，四十馬克者二名，三十馬克者三名，二十馬克者四名，得獎學生均可由本會代訂各種德文書籍。本屆截止日期爲十月十日。

四 德文獎金 本會例於每年提出經費一部分送贈有德文班各學校，發給德文成績優良之學生，作爲獎金。本年亦當照例辦理，至辦理詳情，當於下期再行報告。

五 德文夜校 本會德文夜校本校及分校各班本期內無何變更；至暑期則已定於在本校分別爲已習德文一年及二年者各設一班；至初學者則在暑假後始能設立新班。

六 暑 假 除本會夜校暑期班外，本會事務方面現已定於七月七日至八月九日休假五星期。

七 古籍展覽 本會德國古籍展覽會係自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四日舉行，展覽書籍均係西曆一八〇〇年以前刊行之古本，共約二百種，其中一大部份爲北堂圖書館所藏，八日間參觀者共爲四百餘人。

八 電 影 考賀 (Robert Koch) 爲德國醫學史上有數人物，對於多種傳染病有深刻之研究及貢獻，併於一八八一年發現結核菌；其一生事蹟經德國烏發 (Ufa) 電影公司演爲影片，由明星詹寧士 (Emil Jannings) 主演。該影片於本年二月底運華，本會因其係教育性質之影片，遂商得德國大使館之同意，於三月十一及十二日開映兩次，除本會會員外，輔仁大學及醫學院教師及學生均經被邀參觀。

九 講 演 本會於五月二十三日請本會研究員霍福民博士用華語講演，講題爲“中國在德國文學上之地位”，當日有會員及來賓多人來會聽講，演詞大意如下，「中國在德國文學上之地位有雙重興趣，

一方可見德人對於中國智識之演進，另一方可見各時代德國詩人對中國觀念之特點。德國最早提及中國者，爲十及十一世紀間之作家諾特克爾 (Notker)，其次數百年間祇有關於中國之零星材料，直到十六世紀東印度海道發現以後，德人對中國所知始漸多，對中國之哲學（以孔子學說爲最）及文學尤感興趣。德國十八世紀啓明時期之哲學及文學受中國影響最大，萊勃尼茲 (Leibniz) 之哲學爲最有名之例。對於中國真正之了解直至歌德時代始有之，此名詩人之詩有多首頗富中國風味。介紹四書五經成績最大者爲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查賀 (Erwin von Zach) 則將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之詩全部譯爲德文，並將昭明文選譯出三分之二。介紹中國戲劇最著者爲洪濤生 (Vincenz Hundhausen)，曾譯有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等劇。孔博士 (Franz Kuhn) 則專譯中國之長篇小說，已譯成者有紅樓夢，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等，因孔博士亦係小說作家，故譯筆甚爲流暢。霍福民本人亦曾將中國新文學作品若干篇譯爲德文。介紹中國文學亦即中國之本來精神於歐美，德國人係居首位，中國文學作品之譯爲外國文者亦以德文爲最多，凡此均爲中德兩國文化關係密切之證明。」

本誌第三卷第一期目錄

論著

- 處世箴言(叔本華小傳, 序, 引)..... A. Schopenhauer
關琪桐譯
- 格耐色璣傳..... H. Gackenholz
曾 新譯
- 歷史主義的前驅..... 張貴永著
- 文化形態學的研究..... E. Spranger
王錦第譯
- 德國青年漢學家..... W. Franke
胡雋吟譯
- 幽默家的詩人——步史..... H. Winkelmann
崔 亮譯

“研究與進步”

- 一九三三年以來的德國的法律兼政治哲學..... K. Larenz
關琪桐譯
- 百年來之幼稚園..... E. Spranger
王錦第譯
- 國家及地境形成..... H. Hassinger
張星煊譯
- 一九三三年以來德國之統計..... F. Zahn
江 梁譯
- 吸煙對於人類血液循環之影響..... E. Hassencamp
葛秉仁譯

書評與介紹

- 德意志大聯邦教育之主動者與統制者..... 王錦第評

德國學術消息

會務報告

研究與進步

第一卷 目錄

第一期目錄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 | |
|-----------------|----------------------------|
| 本會為本刊敬告讀者 | 張 東 蓀 |
| 康特哲學之專門名詞 | E. Zechlin 張 星 煊 譯 |
| 葡萄牙人初抵中國 | H. v. Glasenapp 楊 丙 辰 譯 |
| 佛教救世教義之根源 | M. Planck 王 錦 第 譯 |
| 物理科學與世界觀 | 方 志 滂 |
| 佛爾克教授與其名著中國哲學史 | O. Franke 朱 炳 蓀 譯 |
| 中國歷史學的要質 | W. Stepp 鮑 鑑 清 譯 |
| 關於咖啡及咖啡精之管見 | J. Eggert 陳 光 熙 譯 |
| 阿克發彩色照像新法 | L. Bergmann 高 嬰 齊 譯 |
| 高頻率振動及超聲 | D. Beischer 程 京 譯 |
| 研究膠體的新工具——電子顯微鏡 | |

第二期目錄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 | |
|----------------------|--------------------------|
| 現下在德國之中國學 | O. Franke 楊 丙 辰 譯 |
| 論吐火羅語存在之真實性 | E. Sieg 王 靜 如 譯 |
| 文化形態學的問題 | E. Spranger 王 錦 第 譯 |
| 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劉歆改竄左傳說的證確) | W. Eberhard 方 志 滂 譯 |
| 百年前德意志的學術和國家 | A. O. Meyer 胡 雋 吟 譯 |
| 貨幣在經濟制度中的地位 | E. Wiskemann 陳 國 慶 譯 |
| 白喉之傳染徑路及其預防 | E. v. Bormann 鮑 鑑 清 譯 |
| 司麥卡——瑞曼效應的性質及其化學上的應用 | A. Simon 高 嬰 齊 譯 |
| 水之異常性質 | G. Tammann 朱 爾 苗 譯 |

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 | |
|------------------|--------------------------------------|
| 現下在德國之中國學(續前) | O. Franke 楊 丙 辰 譯 |
| 分類字彙 | F. Dornseiff 顧 華 譯 |
| 近代德國「政治的教育」之發展 | 王 錦 第 |
| 珀托勒邁沃斯地圖上的亞細亞東南部 | A. Herrmann 朱 蓉 江 譯 |
| 佛曾以靈魂不滅之說救世麼 | H. v. Glasenapp 王 森 田 譯 |
| 刺戟素對於竹節蟲生活過程中之作用 | O. Pflugfelder 鮑 鑑 清 譯 |
| 新創彩色片製法「阿克發全色法」 | J. Eggert u. G. Heymer 陳 光 熙 譯 |
| 星宿內部化學元素之變化 | F. Erh v. Weizsäcker 王 晨 譯 |
| 原子物理學最新分支在德國之發展 | W. Heisenberg 蘇 盛 甫 譯 |

第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 | |
|-------------------------------------|--------------------------------------|
| 知識社會學與哲學 | 張 東 蓀 |
| 擬編一德華辭典之感想 | 顧 華 |
| 黑格兒的政治倫理學 | Karl Larenz 王 錦 第 譯 |
| 衛禮賢教授及其著作 | 方 志 滂 |
| 十六世紀中國之理想鬭爭 | O. Franke 程 明 洲 譯 |
| 最近生理新陳代謝研究之進步 | E. Abderhalden 薩 本 鐵 譯 |
| 蝶類之蛹化刺戟 | E. Plagge 鮑 鑑 清 譯 |
| 腦電現象研究之生物學及心理學的結果 | H. Rohracher 丁 廷 祈 譯 |
| 爪哇猿人之新發現 | O. H.R. v. Koenigswald 金 舞 侯 譯 |
| 第二次多蘭考察隊在中國西部西康青海西藏間所獲得的數種學術上的結果之探討 | E. Schäfer 劉 詒 綱 譯 |

定價每冊國幣貳角五分

中德學誌 第二卷 目錄

第一期目錄

| | |
|--------------------------|-----------------------------------|
| 謝禮士博士事略 卷頭語 | |
| 來勃尼茲與中國 | Otto Franke 關琪桐譯 |
| 士榜格的教育與文化思想 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 | 王錦第著 張德潤譯 |
| 獵人家中的一宿 | Friedrich Hebbel 楊丙辰譯 |
| 保爾最堪紀念之夜 | Friedrich Hebbel 楊丙辰譯 |
| 頭紗 | Emil Strauss 顧華譯 |
| 洪保德逝世百年紀念 | Eduard Spranger 關琪桐譯 |
| 因果關係的問題 | Bruno Bauch 韓鏡清譯 |
| 尼布楚訂約研究提要 | Walter Fuchs 張星煇譯 |
| 克倫威爾 | Hermann Oncken 胡雋吟譯 |
| 印度的安全 | Hermann Oncken 張貴永譯 |
| 國民經濟學 | F. v. Gottl-Ottlilienfeld 江梁節譯 |
|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 德國古生物學研究 | Karl Beurlen 金舞侯節譯 |

第二期目錄

| | |
|---|-------------------------|
| 忠告德意志民族(序文, 導言,第一次講演) | J. G. Fichte 楊丙辰譯 |
| 斐迪南·李希霍芬傳 | Georg Wegener 孫方錫譯 |
| 德國現代哲學之特性 | John Bourke 胡雋吟譯 |
| 士榜格論歐洲文化 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續) | 王錦第著 張德潤譯 |
| 本性可移 | Gottfried Keller 崔亮譯 |
| 盛夏之夜 | Max Mell 顧華譯 |
| 形成世界的哲學所在地—— 柏林 | Eduard Spranger 關琪桐譯 |
| 中國治外法權史 | Otto Franke 胡雋吟譯 |
| 魏繼晉司鐸首創德語字典 | Walter Fuchs 郭傳道譯 |
| 日爾曼人作戰之戰術與戰略 | H. G. Gundel 項子蘇譯 |
|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德 國之海外地理考察工作一。 亞洲澳洲及海洋諸島 | Norbert Krebs 孫方錫節譯 |
| 近代日晷乃德國之發明 | Ernst Zinner 董遂曾譯 |
| 軍士給養中之維生素 | 葛秉仁譯 |

第三期目錄

| | |
|--------------------------------------|--------------------------|
| 忠告德意志民族(導言二, 第二次講演) | J. G. Fichte 楊丙辰譯 |
| 一六三〇年至一六四〇年間 滿洲境內淡巴菰煙草之早 期高麗史料 | W. Fuchs 張星煇譯 |
| 釋勒與歌德通信選集(續) | 張德潤譯 |
| 高貴之血質 | E. v. Wildenbruch 謝庚譯 |
| 幽默家的詩人——莫根史登 | F. Koch 崔亮譯 |
| 秋 | W. v. Molo 顧華譯 |
| 德語在歐美之分佈 | F. Thierfelder 祝鐘譯 |
| 雷凱特的哲學 | A. Faust 關琪桐譯 |
| 俾斯麥拉攏法國最精彩的一 幕 | W. Windelband 曾一新譯 |
| 十一世紀中國文官職務的改 革 | O. Franke 李相顯譯 |
| 以政治人格為教育目的 | E. Spranger 曹京實譯 |
| 個人生長及衰老過程中心理 形態發展的正規狀態 | W. Hellpach 胡雋吟譯 |
| 中歐之德國生活區域圖 | N. Krebs 孫方錫譯 |
| 介紹德意志學院之十五週年 | 董遂曾述 |

第四期目錄

| | |
|-------------------------|---------------------------|
| 忠告德意志民族(續) | J. G. Fichte 楊丙辰譯 |
| 國民性與文化 | E. Spranger 王錦第譯 |
| 霍拉斯和奧古士都 | Chr. M. Wieland 崔亮譯 |
| 德國小說之藝術 | E. G. Kolbenheyer 曹京實譯 |
| 鴻溝 | H. Leip 崔亮譯 |
| 瑪蒂爾德 | H. Leip 崔亮譯 |
| 「宛如」哲學的意義魏興華作 品的一個紀念 | G. Stammer 關琪桐譯 |
| 亨利·特雷特克百年誕辰紀 念 | J. Lulvès 張立方譯 |
| 中國傳說中之東羅馬 | H. H. Schaeder 王靜如譯 |
| 關於老年心理之結局問題 | J. H. Schultz 胡雋吟譯 |
| 經濟法的出現 | J. W. Hedemann 曾一新譯 |
| 各時代各不同民族所恃以養 生之食物 | K. Hintze 胡雋吟譯 |

每册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每期末附書評及會務報告

中德學會編

中德文化叢書

| | | | | |
|----|-------------|--------|------------------------------------|-------|
| 一 | 魏蘭之介紹 | 賀麟等譯著 | 一冊 | .40 |
| 二 | 陰謀與愛情 | 張富歲譯 | 一冊 | .70 |
| 三 | 工作學校要義 | 劉鈞譯 | 一冊 | .45 |
| 四 | 德國史綱 | 魏以新譯 | 一冊 | 1.30 |
| 五 | 女青年心理 | 劉鈞譯 | 一冊 | .45 |
| 六 | 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 | 中德學會編譯 | 第一冊 2.00 第二冊 1.40 第三、四冊各1.00 | |
| 七 |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 馮至譯 | 一冊 | .40 |
| 八 | 論德國民族性 | 楊丙辰譯 | 一冊 | .70 |
| 九 | 斯托姆小說集 | 魏以新譯 | 一冊 | 1.80 |
| 十 | 德國史略 | 魏以新譯 | 一冊 | .70 |
| 十一 | 快樂的智識 | 梵澄譯 | 一冊 | 1.80 |
| 十二 | 湯若望傳 | 楊丙辰譯 | | (印刷中) |
| 十三 | 葛德論自著之淨土德 | 梵澄譯 | 一冊 | .50 |
| 十四 | 論優美感覺與崇高感覺 | 關琪桐譯 | 一冊 | .40 |
| 十五 | 赫貝爾短篇小說集 | 楊丙辰譯 | | (印刷中) |
| 十六 | 親和力 | 楊丙辰譯 | | (印刷中) |
| 十七 | 歷史之地理基礎 | 張星烺譯 | | (印刷中) |
| 十八 | 哲學論叢 | 關琪桐譯 | | (印刷中) |

商務印書館發行

特刊

| | | | | |
|-------------|---------|-------|----|-----|
| 一 | 德國留學指導書 | 張天麟編譯 | 一冊 | .40 |
| 二 | 今日德國教育 | 王錦第譯 | 一冊 | .30 |
| (此書商務印書館代售) | | | | |
| 三 | 統一國家之德國 | 弗立克著 | 一冊 | .15 |

補助德語教材刊本

| | | | | |
|---|---------|-------|----|------|
| 一 | 德華常用小字彙 | 孫用震編輯 | 一冊 | 1.00 |
|---|---------|-------|----|------|

中德學誌編輯簡章 二十九年十月第一次重訂

- 1 本誌原名「研究與進步」，自第二卷起，擴充範圍，改用今名。
- 2 本誌錄稿，以由德文譯為中文者為主；除本會會員稿件外，並酌收外稿，但須將原文出處詳細註明，其原文不易見者，並須與譯稿一併寄來。
- 3 來稿本會有刪改之權。
- 4 來稿中有中文人名書名等譯為德文後，重行譯為中文時，應請譯者援用原來字樣，幸勿另譯新名；其由德文譯為中文者，除有慣用者外，以本會所定為準。
- 5 來稿逕寄「中德學誌編輯委員會」，請勿寄交編者個人。
- 6 來稿經本誌決定採用者，酌給現金或本誌為酬。
- 7 來稿經本誌給酬後，其版權即為本會所有，原作人不得以其一部或全部在他處另行發表；在本誌發表後，他人亦不得轉載。
- 8 來稿不為本誌選用者，均可退還，但須由原作人附寄郵費，如欲掛號寄還者，並須加附掛號郵費；郵遞如有遺失，本誌概不負責。
- 9 本誌除譯稿外，兼收介紹德國學術文化之著作，但以經本誌特約者為限。
- 10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

編輯者 中德學誌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德學會
(北平地安門內黃化門大街西妞妞房二十號)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北平和平門外虎坊橋)

| 定價表 | | 每季一册(郵費外加) | | 每年四册(郵費在內) | |
|-----|-----|------------|------|------------|------|
| 國 | 內 | 國幣 | 1.40 | 國幣 | 5.00 |
| 德 | 國 | 馬克 | 1.00 | 馬克 | 4.00 |
| 其 | 他各國 | 美金 | .50 | 美金 | 2.00 |

| Bezugsbedingungen: | Einzelheft (Porto extra) | Ein Jahrgang, vier Hefte (einschliesslich Porto) |
|------------------------|-----------------------------|---|
| Innerhalb Chinas | Ch. \$ 1.40 | Ch. \$ 5.— |
| Innerhalb Deutschlands | R.M. 1.— | R.M. 4.— |
| In anderen Ländern | US. \$ 1.50 | US. \$ 2.— |

Zu beziehen durch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Peiping.
In Deutschland durch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Berlin NW7, Unter den Linden 8.

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

Herausgegeben

vom

DEUTSCHLAND-INSTITUT, PEIPING

durch

Dseng I-sin Achilles Fang Wolfgang Franke Walter Fuchs

Gu Hua Yang Bing-dschen Yang Dsung-han

In Verbindung mit

Dr. Karl Kerkhof, Berlin

3. Jahrgang, Nr. 2

Juni 1941

Abhandlungen

Andrew Dickson White: Stein. Übersetzt von Tsao Ging-schi 169-233

Alfred Stern: Biographie von H.E.K. Freiherr vom Stein. Übersetzt von Yang
Bing-dschen 234-261

Freiherr vom Stein: Politische Leitsätze. (Deutsch und Chinesisch) Übersetzt von
Guan Ki-tang 262-277

Arthur Schopenhauer: 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Kapitel III-IV 1-3)
Übersetzt von Guan Ki-tang 278-293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Willy Hellpach, Notwendige Erforschung der Grosstadt. Übersetzt von
Hu Dsün-yin 294-300

Ernst von Hippel: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Übersetzt von
Dseng I-sin 301-306

Friedrich Burgdörfer: Übervölkerung oder Volksschwund? Übersetzt von
Dr. Wuhou W. King 307-309

Conrad Matschoss: 50 Jahre Kraftwagen. Übersetzt von Dung Sai-dseng 310-312

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Übersetzt von Tsao Ging-schi 313-318

Zeitgeschichtliches

Fritz Edel: Der deutsche Arbeitsdienst. Übersetzt von Tsao Ging-schi 319-335

Buchbesprechungen

Franz Dornseiff: Der deutsche Wortschatz nach Sachgruppen. Besprochen
von Gu Hua 336-338

Victoria Contag-Wang Chi-ch'uan: Maler- und Sammler-Stempel aus der Ming- und
Ch'ing-Zeit. Besprochen von Max Loehr, übersetzt von Hu Dsün-yin 339-341

Ed. Horst von Tscharner: 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Be-
sprochen von Alfred Hoffman, übersetzt von Hu Dsün-yin 342-343

Nachrichten aus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344-345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land-Institutes 346-347

Anschrift der Redaktion: Deutschland-Institut, Peiping (China), Huang-hua

Men nei, Hsi Niu-niu Fang 20